

★第一篇★





中共党史中的枝江印记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本人把学习中共党史与中共地方史结合起来,对枝江党史进行了梳理和浓缩,选择了从1921年至1949年间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形成了简明的枝江党史,让身为枝江人知晓枝江事,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一、传播新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激发了枝江人民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情。5月下旬,枝江县立高等小学及江口、董市、白洋等各地学校师生举行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枝江青年学生先后有陈希实、张继熙、罗桂岑等人以回乡办学的方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百里洲的张子明投身枝江等地的学生运动,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以及街头演讲。

1922年,百里洲人刘韞章留学归来,邀集百里洲的乡贤有识之士,在刘巷集镇办起平民学校,以刘氏宗祠为校址,收纳贫寒子弟入学,利用农闲时间授课,入学者近百人,维持了四年之久。

在新文化运动中,在枝江首先革新的是百里洲的堤政。百里洲大劣绅樊靖甫把持堤防大权,任堤防“册证”,下设“九总”,总首由当



地大地主担任。由于“总役”费(即堤防费)是以支定额,“册证”总首们吃玩贪污分赃都可作“总役”费任意列支;由于费用是轮流负担,许多贫苦老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在宜昌三师参加学生运动的百里洲学生刘韞章、张子明、向云汝等人通过反复酝酿发动,在刘家祠堂举行革新堤政大会,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赞同,也得到富农小地主的支持。由刘韞章主笔起草状词,痛陈“总役”制度的弊端,提出取消“总役”开支,实行预算开支。主张“按调捐资,合理负担”,取消轮流负担法;主张设堤政议事会,由议事会挑选修防处主任。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和广大民众的参与下,时任县长孙宸采纳了这一革新方案。

从1926年开始。最早在枝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罗光翟、季正金、张宜松等人。

罗光翟,1903年出生于顾家店罗家河。1925年,罗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罗是枝江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1926年夏回到家乡,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赠送亲友学习,以尚实中学为活动地点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罗同共产党员胡敌、江崇本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共产党员。

季正金,1909年出生于枝江县草埠地区季家坡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靠母亲种田织布养家糊口。1924年,6岁的季正金靠舅父罗章甫资助求学读书,1926年母亲积劳成疾去世。季正金辍学回家,租借民房,办起私学,教授24名儿童。1926年7月由曹壮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以教学为掩护,向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组织农会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当地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导者。

张宜松,枝江县草埠街人,生于1905年,受过10年私塾教育。

1926年11月,经李子卿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向乡亲们宣传党的主张和精神。季正金和张宜松是最早在问安和草埠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的人。

1928年7月,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化名“易窮”来到安福寺准备农民暴动。周逸群深入徐家嘴、蔡家嘴、陈家垸子等农户家中,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宣传窮和富是可以转变的。说着,拿起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写下“窮”“富”两字后,说道:“你们看,窮富都有宝盖头,我们‘窮’是因为被土豪劣绅压得弓起了身子。富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宝盖下面多了一口田,我们穷人只要直起身子起来闹革命,推翻压在头上的土豪劣绅,把田从富人手中夺回来,不就由‘窮’变富了吗!我的名字‘易窮’,就是根据这个意思取的。”一席话说得农友眉开眼笑,茅塞顿开。

在枝江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还有七星台和百里洲的青年学子。七星台人阮瑞麟、阮德斋和祖山竹(中共党员),是董必武委派到三师任教。祖山竹利用课堂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枝江地方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建党组织

1926年冬,百里洲青年胡伯温、张子明等回到家乡,联络刘韞章等四五十名学生广泛宣传新思想,在百里洲开办平民学校,成立刘巷农民协会。

1927年1月,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建立。中共党员曹壮父受中共湖北省委的委派,任宜昌特支书记。宜昌特支是党在宜昌地区的指导中心。1927年春,湖北省浠水县人、中共党员柴燾在县城及洋溪



镇近郊率先创建了十多个农民协会,培养了一批农民骨干。4月,柴燾在县立国民小学介绍杨平章(枝江顾家店人)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日,柴燾在县城孔庙后殿,首先发展码头工人薛开发、吴先孔、肖宝苍等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了中共枝江县小组(枝城)最早的党小组,柴燾任组长。

1927年春夏之交,共产党员杨平章受组织派遣,以职务作掩护,到高殿寺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在陈家冲介绍私塾教员梅正芳入党,不久,杨、梅二人又介绍同学谢官清、张家宝等人入党。5月初,杨在高殿寺地区正式创建中共高殿寺支部(枝江最早的党支部),有党员11人,杨平章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梅正芳、覃子芹、谢官清、谢杰臣、杨先炳,党员有彭先茂、刘光元、张家保、覃子明和梅光明。

中共高殿寺支部、中共龚家闸支部、枝江县小组等组织的诞生,是枝江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枝江有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7年上半年,枝江安福寺、七星台等十多个区乡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农协会会员达3万余人。

1927年8月,省农运特派员,共产党员陈德华回到安福寺陈家垸子,发展共产党员。首先在徐家嘴发展外甥徐国炎、徐保智、徐臣易等人入党;在陈家垸子发展堂兄陈德兰、堂哥陈德贵等亲友入党;在蔡家嘴发展杨安州、车家贵等亲友入党。

到1928年2月,陈德华在安福寺地区发展40余名共产党员,建立中共徐家嘴支部、陈家垸子支部和蔡家嘴小组。徐国炎任徐家嘴党支部书记,陈德华任陈家垸子党支部书记,徐继先任蔡家嘴党小组

组长。同时发展农协会员、共青团员 300 余人,建立部分乡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共青团支部。同月,中共鄂西特委批准成立中共枝江县临时委员会,王天鸿任书记。并在江口、百里洲、三界场等地首次建立了党的基层地下组织。大革命失败后,百里洲张子明、胡伯温等人转入了地下活动,并秘密安置了瓦仓起义失败后潜伏的周济、周小溪、张华权等人。张子明、胡伯温在张家屋子买了一栋房子,开设“协和祥”的土特产收购店;在奎星寺庙里筹办一所学堂栖身。周济又介绍张子明、胡伯温、周小溪、胡茂宜等人入党,创建百里洲的党组织。支部书记周济,张子明、胡伯温分别为宣传和组织委员。为了与外界联络方便,支部化名“鲍文清”驻百里洲奎星寺小学,有党员 11 人(百里洲最早的党支部)。

1928 年 3 月,在凤台地区发展新党员刘大纯、代忠秀等 14 人。同时成立中共凤台区委员会,区委书记阮瑞麟,凤台区委下辖 4 个党支部:菱角湖党支部恢复、龚家闸、党支部蔡桥党支部和肖家湾党支部。凤台区委组织多名铁工打造土枪,建立农民武装队和农民自卫队。1928 年 6 月,安福寺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徐国炎、陈德兰、杨安政等人在瑶家场、董家冲、横溪河、杨家庙等地区发展党员数十人。除原有的徐家嘴陈家垸子党支部外,还建立了蔡家嘴、车路沟、找儿岭、董家冲 4 个党支部,蔡家嘴党支部有党员 17 人,车路沟党支部有党员 12 人,找儿岭党支部有党员 6 人,董家冲党支部有党员 9 人,同月,中共安福寺区委成立,徐国炎任区委书记,姚德藻、董雅轩、章志忠、郭木轩、徐保智、陈德富、郭焕生、陈德传等 9 人为区委委员,共有党员 100 余人。

鄂西特委派遣时任中共当阳县委代理书记傅恒之到百里洲指导



中共“鲍文清”支部，准备举行农民暴动。6月16日，国民党枝江县“清乡”委员会指使百里洲区区长陈楚梁，带区治安保卫团十余人，包围了党支部所在地奎星寺小学，逮捕了傅恒之和周济等人，“鲍文清”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成员分散隐蔽，继续开展发动民众的工作。

1931年1月，成立中共枝宜县委，书记王雨山，委员赵玉阶、徐国炎、胡伯温、张子明，机关驻安福寺农村。1931年3月前，枝江区域党组织恢复重建的还有：徐家嘴支部、陈家垸子支部、蔡家嘴支部、董家冲支部、找儿岭支部、车路沟支部、杨家庙支部、花庙河小组。1931年7月新建的党支部有：问安寺中心支部和张家店子中心支部。

1931年7月下旬，段德昌率两名游击队员，携三支手枪、步枪从公安县来到安福寺，分期分批秘密组织近百名党员和农协会员日夜在玛瑙河上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星期以射击、投弹为主的军事训练。一天，段德昌率领数10名军训队员疾行30余公里，奔袭长江北岸的国民党罗家河水运关税局，缴手枪一支，银元数百元，让队员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

1931年9月，中共宜都县委原书记徐保元在武昌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后叛变，出卖共产党人。中共宜都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县委书记慎家驹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杀害。9月4日，共青团鄂西特委委员张逸凡、共产党员郭复卿、程光炳在宜都被国民党军警逮捕，9月12日在县城东门外被杀害。

中共宜都县委机关虽然遭敌破坏，但江北安福寺地区的党组织仍保存完好。12月，中共鄂西特委在安福寺重建中共宜都县委，徐国炎任县委书记，指导农民在春节期间开展抢分土豪谷米的经济斗

争。同时,安福寺地区的共青团、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团体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建立共青团安福寺区委,徐国伟、徐国享先后任区委书记,下辖徐家嘴、蔡家嘴、陈家垸子、梅家冲4个团支部,共有团员60余人。安福寺区农民协会下辖徐家嘴、郭家畈、蔡家嘴、找儿岭、陈家垸子、董家冲等乡农民协会,农协会员发展到800余人。

三、饥民“吃大户”

1928年12月,中共鄂西特委决定在宜都、枝江、松滋等县发动饥民开展反饥饿斗争。段德昌再次来到安福寺指导。一天晚上,宜都县委、枝江临时县委在安福寺徐家嘴党员徐保常家召开饥民斗争动员会,100多名与会者中,不仅有安福寺党组织、农民协会的代表,还有来自枝江县梅家冲、花庙河,宜昌县鸦鹊岭,当阳县黑土坡等地的党组织。主持会议的徐国炎和枝江临时县委书记王天鸿等党组织负责人在会上进行了动员。同时成立饥民斗争委员会,形成秘密与公开的两套指挥机构,以免暴露党组织。由蔡家嘴农协会员刘正万任主任,公开出面组织饥民“吃大户”,党员、团员、农协会员、妇协会员立即亲串亲,友串友,很快行动起来。穷人家家家户户等米下锅,听“吃大户”,都踊跃响应。同时,宜都县委派农协会员打入安福寺保卫团,侦察团防动向,准备应对团防的破坏活动。

1929年至1930年,草埠、风台地区人民除遭受旱灾外,还遭受暴雨水患。农民感到生活无望,衣食无着,只有向地主借贷,当时到处可看到挖野菜剥树皮的人群。草埠、风台的党组织负责人陈直甫、陈心宽、阮本怀等人领导群众以“吃大户”、抢谷米的形式开展反饥饿斗争。大地主常卫臣公开阻拦破坏饥民斗争,700多人的饥民队伍在



常家台、龚家闸、罗家台、蔡桥等地吃了常卫臣、龚茂红、冯领三等10家地主大户，分得稻谷4万多斤，取得反饥饿斗争的胜利。

同时进行抗租斗争，采用“掀驮子”的方法抗租抢粮。一次，在玛瑙河畔一个西瓜棚边，徐家嘴支部党员徐天德等人拦下粮商两匹驮粮的骡马。正在河边薅草的十几个农民一拥而上，从骡马背上掀下装满粮食的口袋，将粮食装进扎紧袖口、裤口的衣褂、长裤背走。安福寺地主曾耀南雇人赶着六匹马，驮着大米到古老背去出售，还专门准备了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棒装在口袋里，以防备农协会员路上“掀驮子”抢粮。当他们走到刘家么店子时，被当地200多名农协会员拦住“掀驮子”。曾耀南挥舞木棒，企图拦住农协会员反被农协会员夺过木棒打了几棍。曾耀南只得连声求饶，大米全部被农协没收。在横溪河石头坟，共产党员张凡成带领10多个农民拦住粮商29匹驮粮食的牲口，没收大米19石，同时没收了土豪张运秋、张子香准备运往董市出售的驮粮。

对十分贫困的农户采用“捡粮食”的方法进行救济。粮食收割时节，党组织发动困难户的妇女、儿童到地主田里“捡粮食”。地主雇工在前面收割，成群结队的妇女、儿童就在后边捡拾，一块田割完，丢的粮食比收的粮食还多。徐家嘴一个地主上午割完谷，准备下午去收，结果中午就被妇女儿童抱走大部分谷子。地主见势不妙，要长工夜晚割谷。党员、农协会员想了个办法，用步枪子弹壳装上火药，在弹壳底部凿一个小眼，插上引线，填上灰石，等地主组织长工晚上割谷时，点燃引线，火药喷射时声如枪响，吓得长工四散而逃，再也不敢晚上割谷了。这种斗争方式既使贫苦农民度过了饥荒，又提高了他们对反动统治者斗争的信心。

四、两次大暴动

1929年2月至6月,发生了两次饥民暴动。

第一次暴动于1929年2月开始,在安福寺及相邻的枝江、宜昌、当阳边界地区组织了4支饥民队伍,分别在玛瑙河两岸的徐家嘴、郭家畈、蔡家嘴、横溪河、陈家垸子、梅家冲、五家畈和杜家坡区域。确定吃大户的对象是年收租课50石以上的地主。每支饥民队伍均有秘密和公开的领头人。由共青团员担任各个指挥机关之间的通讯联络任务。整个饥民斗争分别由中共宜都县委书记徐国炎和枝江临时县委书记王天鸿任总指挥。

1929年2月25日,4支饥民队伍分别集合出动,每支饥民队伍1000多人,徐国炎秘密指挥徐家嘴片区的饥民队伍。徐大义灭亲,指挥100多饥民首先吃分其族太公、土豪徐秉臣的谷米100多石。还吃分大地主徐臣元、徐臣润300多石谷米。

五家畈片区的饥民队伍在吃分了易铭卿、易卜臣、张朗夫、余秉章等几家土豪的谷米后,又集合1000多人涌进了大土豪余辑五的院子。饥民们把院里院外、屋前屋后挤得水泄不通,呼嚷喊叫,要求分余辑五年收租课600余石。

以安福寺地区为中心的饥民斗争,十余日内由几千人发展到1万多人,抢分了几十家土豪的谷米。豪绅见团防不足以镇压饥民,于3月下旬又数次出钱买通国民党湖北警备军马文德旅两个连及宜都县警备队前来镇压,搜走党组织藏在杜家祠堂的8支步枪,抓捕陈德兰、孟正志、文东乙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余人,关押于安福寺团防据点和宜都县城监狱。用“上压杠”“坐老虎凳”等酷刑,方正北等人被折磨而死。饥民遭到国民党军队、团防的镇压,但斗争情绪仍然



高昂,小规模的反饥饿斗争还在继续。

第二次暴动于6月21日开始。共产党员孟道华率领徐家嘴饥民队伍首先出动,年青力壮的赤卫队员手持大刀、梭镖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数名挎篮子背竹篓的群众,队伍很快扩大到1000余人,到了地主郭湘谷的田边,饥民蜂拥下田,扳收了6亩田的包谷。接着又扳收董香稻等几家地主田里的包谷。随后,鸦鹊岭、蔡家嘴、陈家垵子、梅家冲等几支饥民队伍相继出动,在大刀、梭镖的武装下,冲破地主豪绅的阻拦,扳光了十几家地主田里的包谷。几天时间参加暴动的群众达5000余人。

五、“点验”施残杀

第二次饥民暴动后,团防、豪绅的镇压和反扑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咒骂夜晚活动的“猫子会”,徐家嘴、蔡家嘴、陈家垵子是“赤匪窝”,“要赶尽杀绝”。文家香、徐国享、徐保祯、徐国显等20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敌杀害,100多名群众被捕关押,被迫交纳罚款。徐国炎及其家族居住的徐家花屋20余间房屋被烧毁,徐国炎的父亲被县警备队抓捕关押,妻子带着四个儿女逃往外地,因无法养活四个子女,被迫卖掉两个女儿。保卫团将共产党员杨安州、杨安抚杀害后,又查抄其家,罚家属交纳两支步枪的枪款;悬赏100块银洋捉拿徐国炎,悬赏80块银洋捉拿中共安福寺区委委员姚德藻。

1929年至1932年间,以徐家花屋为中心的玛瑙河畔,数百位革命者遭到屠杀。中共蔡家嘴支部书记章志忠被叛徒出卖时,他为了除掉叛徒,保护党组织,放弃逃生的机会,用仅剩的两颗手枪子弹打死了叛徒。章志忠被捕后,敌保安团总为防止他逃脱,命令团长穿刺



他的锁子骨。因为没有铁丝,必经用尖刀穿引。面对章的凛然正气,团丁陈先丙战战兢兢,颤抖地用尖刀寻找锁子骨。章志忠见他笨手笨脚,一把夺过刺刀骂道“没用的东西,白糟蹋了几年军粮,看老子自己来”。说着举刀穿过锁骨,他的举动让在场的保丁们膛目结舌,不敢正视。被敌人刺破双腿的章志忠昂首挺胸,大步走在路上,腿子淌出鲜血染红了一路的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只字不说。第二天,在安福寺找儿岭英勇就义。

1932年7月,又悬赏1000块银元捉拿中共枝宜县委书记徐国炎,烧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房屋。枝宜县委委员在敌人严密的反革命“清剿”中,苏区领导干部和游击支队只能隐蔽在山地松林中。

1932年7月21日,国民党宜都县政府成立安福寺编联队,下午在何家老屋点验。编联队头目张金斋大开杀戒,随意地将其佃户余培金拉出来杀害。枝宜游击分队长陈光汉和农协骨干林文生、陈文昌、邓学玉、姚典修、蔡家元等因叛徒出卖,在安福寺肖冯冲等地被太和场编联队抓捕,杀害于杨家庙龙丘界。编联队将林文生的头颅悬挂在太和场集镇上示众。从7月21日至24日,4天时间就有40余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敌杀害。

在“点验”中,共点出郭焕生、郭坤生、郭登生、郭树生、郭正诗、郭正良等39名共产党员和农协会会员关进郭家祠堂,由刽子手徐臣槐、郭绍伍、董绍云分三批杀害于三叉河坝。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三叉河水,哀声动地,现场惨不忍睹。郭功伟等刽子手杀了39人后还不遂意,叫要杀个整数,又将在附近捡粪的农民孟正德拉来杀害。

1932年7月下旬,县委委员张子明隐藏在桑树河妇协会员余么姑家里。一天,余么姑去安福寺街上为张子明购买香烟,引起安福寺



保卫团的怀疑,跟踪至余幺姑家将张子明抓捕。对张子明施以酷刑,要其招供投降。张子明毫不屈服,大义凛然。几天后张子明在安福寺被敌杀害。由于叛徒陈明智的告密,枝宜县委委员杨安政被敌人抓捕,押送到宜都县城杀害,枝宜县委委员陈德兰在安福寺菜籽坪被何家老屋编联队逮捕。敌人惧陈逃走,用木棒打断陈的双臂,关押于安福寺团防据点。陈的四个女儿也同时被捕,敌人对陈德兰施以“压杠子”、用香火烧腋窝等酷刑,但陈始终坚贞不屈不暴露党的秘密,并鼓励被捕的家人保持革命气节,与乡妇女协会主席的大女儿陈祖珍、三女儿陈祖秀在玛瑙河畔被敌杀害。

中共安福寺区委委员董雅轩在保安团的围捕中开枪自尽。敌人残忍地将其头颅砍下在安福寺街上示众3天。保卫团抓捕董家冲党支部书记孟正千后,将其押到被游击队处决的安福寺保卫团陈海涛坟前杀害,并强令数百编联队员用梭镖捅戳尸体。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不少革命者全家被杀绝。徐保春一家8兄弟,被杀者6人,其中最小的不足13岁,杨安州4兄弟、徐臣烈一家8人、徐保栋5兄弟被杀绝。在这次大屠杀中,安福寺地区共有300余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遇害。

1932年7月,国民党顾家店乡乡长卞武臣在顾家店长岭岗召集农民开会,摊款买枪,筹组“铲共义勇队”。7月25日,高殿寺农民孟达夫、李得宽两人为争水灌田发生纠纷。设午宴请卞武臣前去调解。中共顾家店支部闻讯,决定趁此机会处决卞武臣。支部书记罗益泰任行动总指挥,派赤卫队员胡仁甲到孟达夫家,以陪卞武臣吃饭为由,掌握卞的动向;派赤卫队员张代昌、罗均全、蒋长胜、刘厚华手拿镰刀,扮成割秧草的农民,埋伏在卞武臣返回的必经之路的芭茅丛



中。下午酒足饭饱的卞武臣与保镖毛大廷一前一后走出孟家爬上牛颈坳时,4名赤卫队员一拥而上,挥刀将卞武臣处决。

中共顾家店支部、罗家河赤卫队处决卞武臣的行动,引起国民党宜都县保卫团更加残酷的报复和镇压。1932年8月5日至7日,国民党宜都县保卫团出动两个团防中队和武魁场等地铲共义勇大队共约100人,分三路进行清剿:一路到高殿寺捕杀共产党员胡仁甲;一路到清水溪捕杀中共顾家店支部书记罗益泰、党员张代昌;一路到檀树溪捕杀共产党员钟世新、余耀廷。胡仁甲当时正在菜田浇水,不幸惨遭枪杀,临终前嘱咐女儿:要记住我的事情,永远不忘共产党!后被团防割其头颅,在宜都县城示众三天。第三路敌军包围檀树溪钟世新家时,中共枝宜县委委员李贞和党员余耀廷、卢昌宴正在钟家开会。李贞由农协会员阎于坤掩护,从林家渡过江,到百里洲隐蔽。余耀廷、卢昌宴被敌军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刘厚林在罗家河江边被敌杀害。中共党员孟宪益、孟宪章和农协会员罗极平、罗圣烺等被敌军在松林坡活埋。在这次清剿中,顾家店地区共有2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顾家店支部罗家河赤卫队停止活动。

1932年9月,李贞在百里洲张子明家隐蔽时,因人告密,被县保卫团逮捕,押送荆州关押,对其刑讯逼供,李贞坚贞不屈,拒绝自首,英勇牺牲。

枝江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全县有党员500人,其中牺牲180人。牺牲党员的分布是:安福寺74人,白洋、顾店14人,百里洲20人,草埠凤台45人,枝城和洋明27人。



六、组建游击队

根据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枝江各级党组织开始组建不脱产的地方赤卫队。全县共有地方赤卫队20余个,赤卫队员2500余人。

1929年6月建立草埠赤卫大队,大队长陈直甫。大队下辖八个支队。赤卫队共有200余人,以草埠为中心,保卫了反饥饿斗争胜利开展。

1930年6月,枝江特支在百里洲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先后到龚家潭处决了保卫团的李明斋、联保主任周体泉以及恶霸地主胡天觉等人。不久又在羊角洲打死正在收租的大恶霸鲍西之兄弟。12月,中共顾家店支部成立后,立即组建罗家河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成立罗家河赤卫队。赤卫队员白天种田生产,夜晚手持镰刀、锄头、梭镖,开展打土豪、袭团防的斗争。

1931年1月,中共枝江特支和百里洲游击队全部成员调往安福寺,组建枝宜游击队,队长张子明。3月,在安福寺组建了鄂西游击第二大队,孟伯平任大队长,全队共有30余人枪,以后发展到百余人枪。以松、枝、宜三县为活动区域。6月中旬,中共宜都县委书记徐国炎率40余名游击队员、赤卫队员袭击太和场保卫团。游击队采取调虎离山计,派共产党员张运纯把太和场保卫团团董张文成等头目请到太和场餐馆吃饭喝酒,游击队员、赤卫队员挑着柴草、松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装扮成赶场的农民进入太和场。队员张天成来到团防局门前,放下柴担,猛地向站岗的团丁打了一耳光,趁团丁被打得晕头转向之际,夺下团丁手中的步枪。其他队员提着手枪、大刀、扁担趁势冲进团防局,高喊“缴枪不杀”。正在团防局打牌作乐的七八个团丁吓得纷纷举手投降。游击队缴获步枪8支,迅速撤离太和场。

1931年7月至1932年4月,赤卫队先后袭击了罗家河汤炼池团队(缴获3支手枪7支步枪等)、罗氏祠堂(俘敌70人,缴获手枪、步枪70余支)、石子岭国民党区长林柏先、杨家祠堂李明仁、安福寺和横店子团防据点(缴枪55余支)。1932年5月,鄂西游击大队、地方赤卫队达到180余名,步枪120支,手枪30支。

七、苏区安福寺

1930年8月,安福寺地区成立了陈家垸子、蔡家嘴、杨家庙、徐家嘴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相应办事机构,陈德兰、徐国志、张天成、徐国先分别任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创建苏区斗争中,一面加强宣传,一面镇压土豪,先后击毙土豪郭康全、徐秉臣等反动分子。

1931年春,中共宜昌特委调枝江百里洲党员张子明、鲍宝臣、鲍西超到枝宜江北地区工作,建立了中共鸦鹊岭区委、陈家垸子中心支部、问安寺中心支部、张家店中心支部,重建和巩固了徐家嘴、蔡家嘴、董家冲、找儿岭、车路沟、杨家庙、顾家店等党支部和花庙河党小组,党员达到100余名。

1932年3月,以安福寺地区为中心,包括枝江、松滋、宜昌、当阳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开辟纵横25公里的红色区域,人口近7万。到1932年春,全县群团组织的发展也达到最高峰,共有农协会员近8万人,妇协会员近5000人,共青团员500余人。

1938年夏,张翮回家乡横溪河广仁桥养病,在青年中发展刘毅慈、张瓚、张东铭、王南山、杨玉山等入党,并与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原中共枝宜县委书记徐国炎取得联系。随后组建中共横溪河支



部,书记张翻,有党员8人。

1938年10月,经徐国炎联络,隐蔽于江陵县徐贞寺的共产党员徐天德从驻地回到枝江。组建了中共陈家港支部。支部下辖3个小组,有党员15人。同时李先兵被派往江口地区开展工作。李先兵发展邹开锋、龚一雄、陈廷猷、孙廷康、董家兰等人入党。成立中共江口支部,书记李先兵,有党员6人。

1938年12月,成立中共安福寺区委,刘铤鉴任区委书记,张翻、徐国炎、周绍汉任委员,下辖横溪河、鸦鹊岭、董市、江口4个党支部和古老背党小组。

在枝江、江口两个党支部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中共董市区委和江口区委;周绍汉任董市区委书记,有党员20余人。李先兵任江口区委书记,有党员20人;在安福寺、董市、江口三个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刘铤鉴任中心区委书记,尹树基、刘毅慈、徐国炎、周绍汉、李先兵、赵肃任中心区委委员,随后又组建了赵家楼、万家土帝、新场、兴隆山、曾家港5个党支部,党员60余名。

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还组织成立了两期“社训队支队”党组织和3所学校党组织。在瑶华场的张家祠堂首期“社训队”中成立中共“社训调队支队”小组,组长刘毅,党员12人。第二期“社训队”成立了中共安福寺社训队支队支部,有党员15人。通过组织整顿,成立了中共百里(新场)区委,书记刘惠馨,委员徐天德、董琪藩。区委下辖陈家港和万家土帝两个支部共有党员20余人。同时,还成立了中共云池区委,书记李三,委员徐国炎、赵肃、张车铭、李敬、陈玉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枝江地方组织得到重建和发展,全县先后建立安福寺中心区委1个、区委5个、党支部7个,党员发展到120多

人。

八、成立“青救团”

1938年2月2日,中国青年救国团宜昌区团部成立,负责人为中共党员苏震。同年6月,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毕业回乡的中共党员吴先琳在县城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吸收李先兵等加入“青救”组织,并建立了中国青年救国团枝江团部。不久,李先兵受“青救团”的派遣,到百里洲、董市等地区发展组织,先后成立了“青救团”刘巷分团、江口分团和董市分团。

正当“青救”刘巷分团在百里洲宣传抗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势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百里洲区长郑斗南的阻抗。李先兵等人了解到郑斗南历来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决定组织发动驱郑运动。李先兵组织从省城、荆沙、宜昌等地回乡的学生100余人,从刘巷赶到枝江县政府大礼堂坐堂请愿,历数郑斗南欺压百姓、破坏抗日的罪行,要求县政府撤换郑斗南。国民党枝江县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最后被迫将郑斗南撤职。

1938年春,“青救团”在新周场李家祠堂正式开办社训队。周绍汉任社训队大队长,周绍鉴任政治教官。社训队共办了两期,每期时间两个月,参加受训青年210多人。第一期在1938年10月开学,受训90多人。第二期于12月开学,受训120多人。受训的科目是军事、政治、文化三门。

社训队的活动引起国民党枝江县党部和三青团团部的疑忌。1939年春,县三青团的头目持枪威胁周绍汉的家人,逼迫周在三天离开枝宜地区。周绍汉被迫离开家乡后,社训队也被县政府强令解



散。

1939年2月,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请张文成出面主办一期社训队。由张文成任名誉队长,刘铨鉴任实际负责人,社训队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中共社训队支部,张翮任书记。学员40余人,枪30余支,还特收张传英等7名女学员。5月,横溪河社训支队引起国民党宜都县政府的怀疑。县政府借口横溪河社训支队有“异党活动”,命令第三区区长杨涛撤销横溪河社训队支队,人员武装并入安福寺社训大队。6月,社训队的人员、武装并入安福寺社训支队。中共安福寺区委将没有烙上火印的10多支步枪埋藏起来,在社训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哲名、尹树基、张纪、杨玉山、王南山等随队进入安福寺社训大队任职,后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难以立足,这些党员先后离开社训队大队。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全区8个乡都成立了民众自卫中队。杨涛安排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自卫中队军事教练员和民训指导员。在成立乡中队基础上,随即成立区大队。区大队除辖8个中队外,还成立了4个直属分队和1个手枪队。分队长分别由张瓚、张楚、刘松传、王华担任,董化任手枪队队长。全大队共有队员1000余人,步枪500余支。

九、日寇滔天罪

1939年12月,日军飞机两次轰炸江口镇,炸死平民4人,重伤2人,炸毁房屋3间。1940年5月29日,日本9架飞机再次轰炸江口,炸死5人,重伤20人,炸毁民房50余栋。6月3日,8架日机轰炸安福寺,炸死38人,伤53人,炸毁民房15栋,震塌34间。6月5日,日军再次轰炸安福寺,炸毁2间店铺。6月6日,数架日机先后轰炸了枝江



县城和董市镇,县城60余人被炸死,60余间民房被炸毁;董市镇16人被炸死,多人受伤,20间房屋被炸毁。6月7日,日机3架轰炸了古老背镇,炸死16人,伤20余人,炸毁一所小学和民房12栋。

1940年6月8日,日军侵占枝江长江以北地区,放火烧毁了安福寺100多户房屋、店铺,造成300多人无家可归。在紫荆岭先后屠杀中国官兵和无辜民众近千人。日军兽性大发,随意强奸妇女。在紫荆岭6个日本兵轮奸一名12岁的幼女致死;安福寺一名68岁的婆婆遭强奸后,被日本兵残忍地用刺刀捅下身而死。

日军在白洋一次就烧毁了镇上全部民房500多栋;在白洋镇、武魁场、宋家塆等地屠杀156名群众;40多名妇女受到日军的凌辱。逃难群众随身携带的粮食、畜禽等被日军洗劫一空,白洋镇寺庙里的珍贵文物也被抢劫。

日军强迫苦力在董市镇后湖挖了3个长3米、宽3米、深1.5米的“杀人坑”,把抓来的民众推到“杀人坑”旁,先放狼狗撕咬,再用刺刀捅肚子、捅咽喉,杀死后抛入坑内。日本兵抓住卖油的陈启松等人,经拷打后,将一条毒蛇放置在陈启松的肛门处,然后剪掉蛇尾,蛇猛钻入陈启松的肚内,陈启松在地上翻滚痛苦地死去。在“杀人坑”旁,先后有十多名妇女被日本兵轮奸后杀害,丢入坑内。在董市后先后有50多名百姓被杀害于“杀人坑”。1942年7月,驻扎在马店熊家窑的日军有两人窜入董市桂花村抢掠,被抗日游击队打死一名,另一个逃回驻地。当晚20多个日本兵来报复,在杨家屋场、田家屋场抓住来不及逃避的9名老人和残疾人,将他们全部活活烧死。日军还沿途烧毁房屋15栋,抢走畜禽数十头(只)。

日军在顾家店抓到13名村民,将村民捆绑关进一农户家,逐个



用刺刀捅伤后反锁在屋内,然后纵火烧屋。一个村民冲出火海即遭日军开枪打死。日军在顾家店抓到一名为江南的中国军队送情报的船工,在一片树林内,扳拢两棵相距丈余的松树,将船工的四肢分别绑在两棵树上,然后猛一松手,回弹的松树将船工活活撕成两半。日军在顾家店地区先后致使350多民众直接伤亡,烧毁房屋1800余间,抢走粮食965石,牲畜360头,土布57.6万匹,农具388件,财产损失总值2.15亿元(1964年法币值)。

1942年一年中,日军在问安集体屠杀抗日游击队员和村民30余人。问安罗场街十多家店铺被烧毁。在老周场地区,日军以收编一股土匪武装为名,将该队伍的35名农民骗进周家场三亩山驻地,仅在几天时间内全部用刺刀捅死。

1943年2月,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一部乘汽艇在百里洲肖家堤拐登陆,偷袭驻地的中国军队。在飞机的掩护下,日军约2500人渡江,侵犯百里洲龚家潭、刘巷、羊角洲、坝洲等地。驻守百里洲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抵抗,机枪排毙伤日军数十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过大而败退。日军在侵占百里洲的七天时间里,杀害居民50多人,强奸、轮奸妇女160多人,烧毁房屋910间,抢掠粮食31万斤、农具515件、服饰397件。百里洲民众财产损失达1100多万元(人民币1951年价)。

日本侵略军在枝江犯下的种种罪行,激起全县人民的反抗。1940年6至7月,猊亭人邹连山在古老背一带组织了近百人抗日游击队,在猊亭、紫荆岭等地频频出击,先后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1943年夏,邹连山因病在高家店一农户家养病,因叛徒告密被日军包围,邹连山宁死不屈,打死日军两人、警士一人后被日军放火活活

烧死。

1944年11月的一天深夜,紫荆岭、鸦鹊岭两大日军据点及下属人马一齐出动,向游击队张缙所部活动区域扫荡。张缙与陈坚又分驻两地。张只带少数人驻太和场。凌晨,张发现附近有几股日军,便率部向新周场陈坚靠拢。中午在新周场偏北的鄢家坊与日军相遇,枪声一响,几路日军围来。张抵抗一阵,即率部队突围,他接过负伤机枪手的机枪上前冲锋,不幸右膝中弹。队员要背张跑,张喝令,快冲,别管我!张向受伤的中队长大喊:“谭英,要有骨气,不做俘虏!”张用手枪自抵心窝连发两枪,谭英也随着举枪自杀。张一心报国,牺牲时年仅27岁。张缙殉难后,陈坚活动一段时间后,率部南渡。

日本在占领枝江期间犯下滔天罪行。为反击日军的暴行,枝江党组织在东部利用“黄学会”开展抗日游击战,在西部建立江北游击大队打击日伪军。这些抗日游击战,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反动势力,为全民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十、枝江换新天

1949年6月1日,中共枝江县委、枝江县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枝江县指挥部在荆门成立。县委书记李先兵,副书记贾平、刘绍文(女),县委委员许超、朱玉衡,陶君彦任县长。县指挥部指挥长林凯成,政委李先兵,政治部主任王青春。6月中旬,县委决定,组建以原第三区区委书记杜万福为队长、以原十三团所属一个排为基本力量、共50余人枪的武工队。6月底,武工队共为解放大军征粮50多万斤,租用船只600余艘。接着在菱角湖和沮漳河分批轮训水手,做好为解放大军摆过的各项准备工作。国民党仙女乡乡长贺方田、保长



傅银安经过武工队宣传启发教育,主动上交了手枪两支和子弹多发,并详细报告了驻老周场敌十五军一个特务排的活动情况及仙女庙特务小组的动向。

1949年7月10日至12日,枝江县凤台、问安、老周场等地已先后解放,中共枝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随即率部赶到问安集中。13日晚,李先兵在问安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县委关于成立中共问安、新场、仙女区委的决定,由王友祥、杜万福和高瑞林分任区委书记。

1949年7月15日,县委副书记刘绍文率队接管江口镇。当日成立江口镇军事管制委员会,刘绍文为主任,万仪为委员。同日下午贾平率南下到枝江工作的干部大队抵达问安。17日上午,县委县政府机关、南下干部大队和县武装部队,在李先兵、陶君彦率领下从问安进驻江口,并在江口旧商会会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成立枝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李先兵任县军管会主任,陶君彦、林凯任副主任。同时宣布成立枝江县新场、问安、仙女、刘巷、冯口、江口、董市、城关、茶园、洋溪共10个区、镇党组织和区人民政府。在区镇党政组织成立的同时,县指挥部在各区、镇建立了民兵中队武装力量,每个中队30余人枪。

随后,枝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各区镇党、政、军组织到各地接管工作,彻底打碎了国民党旧的基层政权,迅速安定了民心。

1949年7月17日,困守百里洲的国民党军枝江县大江部队一营营长率领其残部到江口向县军管会投诚。18日黎明,枝江县指挥部派县武装部队教导员孙玉卿和连长刘玉亭率两个排的武装,分两路强渡长江,进逼百里洲,包围刘巷镇,县“民众救护团”李敬波所部三四十人、枪全部缴械投降。随后,国民党枝江县副县长严西陵也由县

指挥部敌工干部从百里洲带到江口向县军管会投降。

枝江全境解放后,国民党军、政、特骨干人员在枝江滞留很多。以惯匪谢平川、林必儿、郑家良、詹光达为首的土匪 200 余人,在问安、草埠、风台、百里洲、枝城、茶园等边缘交界地伺机破坏。县委根据这种复杂形势,提出以消灭土匪特务、控制国民党残留人员、配合大军西征为主要任务,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1949 年 7 月下旬,县委颁发布告,要求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立即到人民政府登记,并交出文书表册枪支弹药等。如能遵守法令,人民政府予以宽大处理,对少数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捉拿之后严惩不贷。县委在全县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公安司法机关配合检举揭发,形成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反革命分子。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常广宣来县登记后,政府责令其写信给未登记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迅速登记,常先后争取了党部秘书周斌、执监委员、干事及所辖各区党部书记 18 人。国民党政府副县长严西陵,在临近解放时被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做过工作,所以,枝江一解放严即来投诚,另外还通过严写信争取县内的乡镇长前来投诚。在一个月內,除钟华陵(县参议员)、王仲青(国民党县党部执委)等极少数人外,先后自觉登记投诚的有 400 余人。对茶园乡乡长章文波等投诚不诚心人员予以扣押追查。

1949 年 9 月初,原国民党自卫团特务连连长林必藩和共安乡乡长张全民登记以后又外逃当土匪,为此类事件再度发生,遂将国民党县、区党部书记以上、军队连长以上的个别危险分子集中到县里控制起来;其他人员仍由各区镇管理。区镇对所控制的人定期集训。国民党候补执委邓刚、副县长严西陵坦白交待了曾参加军统特务组



织问题。自卫团连长甘以棠重新交出步枪七支,王佐才交出步枪三支,自卫团连长彭泽榜报告黎少华有一支手枪,公安部门据以收缴。集中到县里的前后共55人,审查后陆续遣回的18人,县控参训37人,这些参训人员受训后全部制定立功计划,决心重新做人。

根据详细调查,国民党枝江县属党政军特共有武器1297件,国民党枝江县长朱步贤率自卫团二营、三营一部及警察局等单位西窜时带走近700件,余下的需要收缴归库。百里洲一地主武装头目李敬波,解放后拒不投降,县指挥部用两个排的兵力将李敬波部包围,迫使其放下武器,全数上缴。土匪谢平川,在县指挥部的威压下,共交出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步枪37支,手枪12支。各区镇乡收缴的枪支,仅冯口区就上交141支。到9月底,全县武器收缴工作取得重大胜利。

枝江解放后,中共枝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残余土匪进行清剿。凡恶贯满盈的匪首,在捕获归案后,经宜昌专区批准,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判刑,执行枪决。三个月内先后处决了惯匪詹光大、陈正隆、曹南甫等。对少数不够杀头的判处徒刑。一般匪众则拘押教育,然后交保释放。

解放前夕,南下解放军某部排长岳士芳在行军途中身染重病,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只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手枪路过袁码头时,被当地土匪头子毕祖海知晓。毕祖海纠集7名土匪抢走了岳士芳的枪支,将岳绑架到毕祖南门口的水井旁,剥光衣服,脖子上系一块石磨,倒掷水井活活淹死。解放后,群众举报这伙土匪的罪行,问安区政府逮捕了土匪头子毕祖海及其7个同伙,并责令毕祖海等几个罪犯下水井将岳的全部遗骸摸上来,收验完好,用白布裹着装入棺材。区政



府还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将烈士遗骨安葬于袁码头村,树起了烈士纪念碑。匪首毕祖海被枪决,其余匪徒分别被判处徒刑。

枝江解放后,土匪头子谢平川、林必藩在押送宜昌途中潜逃。枝江县委成立专案侦察组。侦察获悉,谢、林投诚前隐藏了3支手枪和部分子弹,潜伏了4名匪徒。逃脱后,他们取出了枪弹,带领匪徒在长江上先后抢了两条木船,在湖南省南县落籍。侦察组5人立即奔赴南县,经过6天查访将林匪抓捕。得知谢平川还在荷花嘴船上,侦察组4人租船连夜赶去。到荷花嘴后被200多名暴徒围困,两名侦察员受伤,谢匪趁乱逃脱。第二天侦察组赶到柴码头,在船上逮捕了谢平川等六名土匪。经过九个日日夜夜的战斗,谢、林终被捉拿归案。

解放后,枝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清匪措施,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枝江人民过上安宁的生活,社会经济也呈现恢复和发展的态势。枝江晴朗,换了人间。

(杨尚成)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枝江县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枝江县的活动始于1938年6月,中共宜昌地区工委派吴先琳到枝江发展党组织。吴活动到秋天发展了李光宪、李先兵等七人,在枝江江南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吴任书记,组织委员杨国民。八月,中共宜昌中心县委(由工委改建)派刘牲鉴到枝宜一带工作,住周绍汉家(吴先琳曾在周绍汉家联系过刘牲鉴),1938年底吴先琳调往石首,1939年4月因学校的人事变动,特支自行解散。

1938年夏天,张翻从上海回到家乡安福寺张家祠堂,一面养病,一面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张翻受宜昌党组织领导,一是发展党的组织,二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约八月,国民党宜都县政府要安福寺区抽壮丁就地军事训练(简称“社训队”)。张翻抓住时机,请叔父张文成(地方开明绅士)出面主办了宜都“社训队”江北直属支队,支队长张文成。此时,张翻向张文成介绍了一批共产党员到“社训队”工作(社训队地点在张家祠堂)。初次,刘牲鉴到枝江带活动,先到董市帮助建立了党的支部,由周石(即绍汉)负责,不久被王致中(中共宜昌中心县委书记)调到张家祠堂工作,并成为横溪河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经张翻介绍,由张文成公开派往“社训队”任政治教官,从此实际掌握了地方



武装。刘牲鉴当时并未放弃枝江董市的发展工作。他来回于董市和张家祠堂之间,以横溪河为中心,以“社训队”和鸦鹊岭、黑土坡一带的党员为基础,建立了党的区委会,命名为安福寺区委会,书记刘牲鉴,委员有赵肃、张翮、刘哲民等人。1938年8月区委会派张纪到徐家嘴联系大革命时期的幸存者徐国炎。不久,徐国炎参加了区委党组织,并写信联系了隐蔽在江陵县梅槐桥的徐天德(1938年上半年二徐在荆州西门分手徐天德留江陵,徐国炎搬回老屋安福寺分别在荆沙和宜昌一带寻找党组织)。安福寺和董市两地的党组织建立后区委派李先兵在江口小学介绍教员龚人雄、邹开锋、董家兰、陈廷猷等人入党,并建立江口小学党支部。同时还派党员到鸦鹊岭、古老背、云池等地发展党组织,后来由云池小学教员赵肃负责组建了党支部,并负责云池和古老背一带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8年底,江、董两地的党组织有很大发展,建立了党的区委会,董市区委书记周绍汉,江口区委书记李先兵。在三个区委会的基础上,经宜昌中心县委批准,于1939年2月在安福寺张家祠堂正式成立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会,书记刘牲鉴,委员有李先兵周绍汉、刘毅慈、刘哲民、赵肃等人。王致中在中心区委成立大会上指出,区委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准备沙宜沦陷后的武装抗日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由武汉迁宜昌后,湘鄂西区党委于1939年3、4月间在宜昌成立(同时撤销中心县委),并具体领导宜昌各县市的抗日活动。区党委鉴于襄西沦陷迫在眉睫,加之国民党政府施行消极抗日方针,区党委决定允许或派遣共产党员以各种合法形式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争取武装,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心区委的领导下,周绍汉利用父亲周珽卿的关系打入国民党新周场乡任乡队副,掌握了十多条枪



的武装力量。为扩充武装,还在新周场举办“社训队”,吸收就近青年农民参加军事训练,王翰来此检查工作,看到“社训队”办公地点贴有抗大用过的标语口号,曾批评区委工作失策的问题。同时利用周珽卿的关系,还控制了董市自卫中队林必凡几十条枪的武装力量。1939年4、5月间,中心区委在国民党宜都县第三区区长杨涛(中共地下党员)和汉流张文成的支持下,从区公所提出几十条枪,在张家祠堂开办了第二届“社训队”。同时,王素也在杨涛的支持下,立足雅畈举办了“社训队”,当时有枪四十余条,受军训人数达三百多人。各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利用公开的合法的形式从政治、军事等方面为抗日游击战争做了一些准备。

1938年秋天,徐天德在江陵得祯寺收到徐国炎的联系信,不久,徐天德返回大革命失败后曾经隐蔽过的地方——新场陈家港。1938年10月,徐天德根据徐国炎信中的要求,在陈家港建立了党的支部,书记陈家新,党员有蔡子伦(大革命时马山党组织的负责人,后来此地隐蔽)、万竹青等人,根据上级发展组织的要求同年10月徐天德派蔡子伦到马山建立了党的支部(以原隐蔽党员为基础),这两个支部直属安福寺区委的领导,具体由徐国炎联系并布置工作。1938年10月到1939年秋,新场地区共发展了八个党支部。1939年2月,徐国炎到陈家港联系工作,并实际造成新场地下党与江董区委的联系状态,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思想和领导方面的准备。1939年3月,地下党执行上级指示,派邹开锋打入国民党杨新乡任联保主任,并相继打入党员多人,在联保办处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书记邹开锋,地下党实际掌握了这个乡的政治、经济和武装大权。

1939年6月,上级党派刘惠馨(女)从安福寺至江、董直到新场审



查了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刘惠馨在邹开锋家住有二十余天,临走前,她在审查整顿的基础上建立了百里洲区委,书记刘惠馨,委员有董童刚、徐天德二人。1939年8、9月份,上级党派尹树基到新场宣布放弃江、董和新场部分骨干的组织关系,于是邹开锋、李先兵、周绍汉等人因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均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党员群众处于分散和无组织状态中,失去了战斗力。同时,宜昌党组织调回刘牲鉴,安福寺中心区委也实际上解散了。1939年冬天,横溪河一带的党员群众在日军逼近的紧急形势下,急需建立一个临时中心,由于当地无骨干力量(1939年2月张翮病故),原区委成员刘哲民介绍张东铭到云池联系赵肃,并建立一个区委会,书记李鉴三(云池小学教员),组织委员徐国炎,宣传委员赵肃,委员有张东铭等人。区委领导的范围相当于原中心区委所辖地域。可惜的是,区委还没有全面开展活动,日军就逼近安福寺地区了。由于党员失掉联系,党组织自动解散了(1940年6月以后安福寺地区无党的组织活动)。

1939年冬天,中共新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江陵县委,但因县委忙于三湖四湖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直到1940年5月,才派王明昭(裁缝店党支部书记)到新场联系工作。约6月,改百里区为江陵西北区,书记万竹青、组织委员徐天德。1940年下半年,江陵县委先后派王锡珍、彭祥林、王展等人来帮助工作,所建下属组织除原八个支部外,新增裁缝店党支部和西门特小组,共有党员一百七十三人。1940年6月到年底,党在西北区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组织,壮大队伍,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好组织准备。

1940年6月,沙宜沦陷,枝江在外地读书的学生陆续回乡,到处摆开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战场,响亮地提出了“不当亡国顺民”的战斗口



号,新场地下党也派人到荆南中学等地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回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原被放弃组织关系的李先兵、周绍汉、邹开锋等人,除周绍汉于1940牺牲外,其余都先后到襄西参军参干了。

1941年3月,新场地区的国民党联保主任黄庚伯失踪,地方政事无人过问。当时日寇统治力量较强,四面八方的土顽虽未发展成强大的势力,但互相争夺日胜一日,加之日寇频繁扫荡,新场地区形成拉锯之争的险恶局面。地主恶霸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乘机发展其党羽,国民党杨新乡的恶霸绅士许济民、黄先山、娄凤卿、赵子良等人首先发起组织封建的黄学会,并强迫当地年青人全部入会。中共新场地下党组织有六个支部处于黄学会包围之中。黄学会除消灭小股土匪外,还削弱了施昌直匪部的势力,而且势将进一步抗击劲敌郑家良,地下党将此情况汇报襄西地委。地委成员刘真曾以私人名义统战许济民,许济民也曾作过答复,地委指示“凡党员强迫入会时加入之”。后来地下党为搜集情报、除奸抗日曾主动打入多人,为保护人民消灭敌人起了积极作用。这个组织直到1941年8月被郑、赵二匪打垮为止,一直为地下党所利用。

1941年春,中共江陵县委派王锡珍来到枝江新场帮助工作,改西北区委为江陵西北区临时工委,书记万竹青,委员有徐天德、蔡子伦、赵必扬、曾兆荣等九人,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和巩固组织。这一年,因江陵县委迁到岑河口,临时工委与县委联系不便,县委将西北临时工委的组织关系交襄西地委直接管辖。

1942年5月,襄西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向襄河东实行战略转移。同年七月,中共荆南特委书记李纯斋派朱玉衡到枝江新场帮助工作。八月改工委为江枝特区委,书记朱玉衡,副书记有曾兆荣、邹

开锋。特区委所辖包括荆州北门(支部)和西门(小组)。特区委的任务主要有三:①为襄西抗日根据地提供敌伪顽的情报;②向根据地输送人才;③统战赵益之,以赵制郑(家良),减轻襄西的压力。1943年1月,朱玉衡调往岑河口,但特区委的任务不变,并由徐天德等人一直坚持到1945年5月为止。



安福寺地区的武装斗争

安福寺地区位于枝江、宜都、当阳、宜昌交界处,北接汉宜公路,东与江汉平原毗邻,西、南两面紧临长江,玛瑙河纵南北,方圆百余里,以丘陵地为主,森林覆盖面积大,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适合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安福寺地处川鄂湘豫必经要道,更是洪湖苏区通往湘鄂边苏区在江北的可靠走廊。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鄂西特委为贯彻中央精神,实现“秋暴”计划,将武装斗争重点放在荆当远交界——瓦仓。组织过两次“暴动”,都遭失败。此后,特委总结了经验教训,逐步把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安福寺地区。这个地区从1927年冬天开始发展中共党的组织,到1928年年关斗争时,已发展党员79人。在玛瑙河两岸建立了3个党支部1个党小组(有的说建4个支部)。

安福寺党组织在段德昌、徐国炎的领导和推动下,曾组织发动过四次较大规模的饥民斗争。但是没有把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结果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后来特委帮助宜都县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经宜都县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安福寺区委会(书记徐国炎),建立了区农协会。农协会中设有武装执行委员(姚德澡),党的区委会中有专管军事的委员(郭木轩),开始注重了地方武装的研究。



但这时的群众武装斗争,还只是停留在服从于经济斗争的低级阶段。为了加速转向武装斗争,是年段德昌先后两次到安福寺主办红军军事学校,并带来张维高和小老黄作军事教练员,一是训练队列,二是学习步枪射击。人员主要来自各党团支部和农协会的积极分子。训练期间曾攻打过罗家河的官税“厘金局”,袭击过团防的驻地,进行实战训练。特委直接掌握的宜昌特务第二队(有连枪四支)也游击宜都全县。年前上级要求组织百二十人到洪湖开荒生产,后来由王天鸿、刘正万、万子雄带队到江陵沙岗,参加了沙岗举办的军事训练。训练后期攻打了沙岗的反动民团,因战斗失利,除留部分人在洪湖参加游击队外,其余的人分路回安福寺参加了地方赤卫队,为以后游击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9年松枝宜联合县委书记李盛文在褐家老屋召开了三县联合军事会议,到会约六七十人,会上成立了三县联合军事指挥部,并选举了军事干部,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1930年春,宜都县委书记王雨山到枝江百里洲恢复党组织,6月又从公安调来四支短枪到百里洲开展秘密游击活动(即二大队之一部)。10月宜都县委为加强安福寺的武装力量,将游击于百里洲的二大队全部调往安福寺。从这年秋冬开始,枝宜游击队在二大队配合下组织了一系列攻击反动民团的武装斗争。如白洋民团头目汤炼池在顾家店叫喊“坐地筹款,买枪铲共”时,游击队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于古历八月十六夜晚,在罗家河赤卫队的配合下攻打了顾家店。在罗双臣家捉住了汤炼池(后杀于曾家坝),缴了他的枪。冬天,敌人为了镇压罗家河一带的革命运动,调戴洪炳一个营的兵力驻罗家祠堂。游击队在顾家店党支部的帮助下,于深夜乘其不备,围攻了罗家祠堂,打垮了戴洪炳一个营的兵力,缴了他的枪,然后将全部长枪运送给洪湖



根据地。入冬以来,江口民团许直卿派一个大队(大队长熊必丰)的人马坐镇草埠街,血洗草埠湖。为了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一、二大队经三同碑会议后,在草埠地方红军支队的配合下围攻了民团武装,在草埠街上捉住了熊必丰和叶继良,并当场处决了他们,缴枪三十余支。这时安福寺地区的武装力量发展很快,在玛瑙河两岸已初步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安福寺黑头坡、横店子等地虽有反动民团组织,但他们已不敢为所欲为了。

1931年春天,特委决定分大江南北建县。鄂西二大队的兵力大部分留宜都安福寺地区,二大队负责人孟北平、龙平等人带十条短枪随松枝县委到江南建县开辟新区。大队长孟北平去江南后,宜都游击队由县委委员张子明负总责。1931年是安福寺地区武装斗争的高潮,游击队半公开地活动,方圆百余里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1931年12月10日宜昌特委文件说:“宜都江北一带的豪绅,因几次安福寺赤区游击斗争与游击队工作的发展,豪绅多跑到有军队和民团的地方。同时他们的地域观念较强(枝江不来宜都清乡),也因豪绅民团的利益关系(民团下乡清乡即搜刮豪绅地主的谷米),时常发生纵横的明争暗斗。”文件又说:“10月17日拂晓,当宜游击队同群众袭击安福寺和横店子民团,二处被红军共缴枪卅余支。”游击队工作的发展和武装斗争规模的扩大,已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1931年,宜都县委以主要精力在安福寺地区组织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是年秋天,枝宜淹大水,受灾面积“总计约二百里,灾民约五万人左右”。在灾荒年景下,游击队发动群众搞“四抗”,以掀驮子为鼓动口号,继续组织声势浩大的饥民斗争。从策略上讲,县委把经济斗争纳入了武装斗争的总体规划。但到1932年春天,宜都县委就陷入了

单纯的游击军事行动,以游击队工作代替了党群组织的发展和其他群众工作。某些军事行动虽有它的政治影响,但其成果并不显著,相反却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当时为牵制川军进攻洪湖根据地,以二大队兵力为主,动员了安福寺地区七、八百群众,于3月一天拂晓袭击了汉宜公路上的重镇——鸦鹊岭。出发前,由徐国炎作了动员报告,并当众宣布了六条军事纪律。当游击队进街时民团早已跑得一干二净,打了几家商贾。让群众分了日用百货。这年五月份,仍以二大队的兵力为主,动员了五、六百群众攻打横店子的反动民团,由于敌人有七、八十条枪,加之有坚固的阵地,除游击队的主力接近民团外,有的群众走到半途就退回去了。事后宜昌特委在给枝宜县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县委的单纯军事观点。

几年来武装斗争的发展,造成了“以安福寺为中心,在玛瑙河两岸开拓了四、五十里的赤区”。1931年6月成立宜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徐国炎)。同时划分了区乡行政区域,雕刻了大印,形成武装割据局面达一年之久。但由于敌人的镇压,县委忙于武装斗争,赤区始终没有认真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民群众,加之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当1932年秋天整个洪湖根据地撤退时,枝宜地区在敌五县联防和敌正规军配合围攻下,安福寺地区的武装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黎明前的新场地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一直战斗在新场地区,因此,对原荆当县委和江枝宜县委开辟新场地区、建立新区政权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虽已有几十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1948年冬,解放战争频频报捷,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枝江就要天亮了,灾难深重的枝江人民无不为之欣喜。面对人民的胜利,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势力惊恐万状,他们集结兵力,控制地方,欲作垂死挣扎。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年青人从荆当秘密来到新场。来人姓岳名启鸿,是受江枝宜县委城工部部长朱玉衡之命,前来联络原五师突围时回家隐蔽的同志的。

1948年11月的一天深夜,我家突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李耘农、谭志元、许玉山。他们的到来,使我又高兴又生疑。高兴的是我自被敌打散回家隐蔽以来,天天盼望归队的心愿得以实现;可疑的是来人空口无凭。再说,李耘农素无所闻,谭志元虽有所闻却从未见面,至于许玉山本来相识,但现在底细不明。为不失礼节,我热情而审慎地招待了他们。次日告别我示意三位转告刘真、朱玉衡同志再行联络。果然,一个星期后,岳启鸿同志来了。

那是一个下午,岳启鸿带着衡山(朱玉衡)的亲笔信,由谭志元引路来到我家,向我传达了朱玉衡同志的指示:(一)建立秘密组织调查

登记船只,准备支援大军南渡长江;(二)调查地主富农现存粮食情况;(三)通知原新场地下党员和五师突围时回乡隐蔽的同志作归队准备。岳启鸿活动两日后返回荆当。不久,以赵必扬为首秘密组建的支前工作组在新场地区活动起来。

1949年2月初,中共江枝宜县委副书记李先兵率领一个连,过汉宜路南,经双冢祠到达沮漳河岸张家口一带活动,开展开辟新区的工作。

自岳启鸿来新场后,为打开支前工作的局面,我们曾多次商议,要设法与李先兵取得联系。2月3日,赵必扬秘密来到草埠,在张家口找到了李先兵。真是革命方知觅寻苦,相见倍觉组织新。当时,赵必扬详细地汇报了敌情,在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之后,先兵同志作出决定:深入腹地,干掉维新乡公所。

维新乡乡公所位于孙家港(现七星台镇孙家港),乡长赵佩箴,有十余人,十支长枪,两支短枪。当晚,部队由赵必扬引路,从草埠直插孙家港。这时,赵正与一女人鬼混。当李先兵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已狼狈不堪,自知大势已去,便乖乖地叫乡公所十余人全部缴了械(后以投诚相待)。

次日拂晓,李先兵率部转移至龚家堤(现七星台兴隆山村二组)宿营。上午,对乡公所十余人发落后,部队于下午四时左右从杨家渡过沮漳河,到达菱湖(现属江陵)常家台。2月6日,在常家台召开的紧急战地会上,先兵同志代表江枝宜县委宣布,成立新场区人民政府和维新、扬新、官荻三个乡公所。赵佩箴为区长(因贪生怕死,不多天离队回家),赵必扬任副区长,陈全炳、高凤鉴和我分别为三个乡的乡长。同时宣布成立新场区中队,任命李新民为区中队长,并将缴获的十支



长枪、两支短枪全部发给区中队。当日下午,李先兵返回荆当,赵必扬带领区干部和区中队回到新场。

2月7日,新场区人民政府在南湖谢家台召开第一次会议,全区的保长士绅也被通知到会。会议由我主持,赵必扬讲话,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宣布取消国民党乡、保组织,成立新场区、乡人民政府,并公布了领导人员名单。二是宣讲我军即将解放全国的大好形势,勒令乡、保长迅速转变立场,为支援人民解放军多做工作将功赎罪。

自此,新场地区的支前工作在区、乡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日趋活跃起来。

新场区、乡人民政府建立不多天,敌人便开始了疯狂地反扑,新场地区的政治形势又复杂起来。一是驻江口的敌大江部队每日必到新场地区对我们进行所谓“清剿”。二是土匪龚先达也在杨家渡、龚家闸和娄家洲一带加紧了活动。这股土匪有30余人、轻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手枪数支,对我们威胁较大。三是以谭道义为头子的黄庚伯地主武装,拥有一挺轻机枪、20余支步枪,经常活动于新场街、陈家港和宋家巷一带。上述敌对势力对我形成包围状态,使我活动困难。加之我区政府和区中队远离荆当,孤立无援,时有被敌吃掉的危险。

在恶劣的局势面前,如何继续开展活动,区政府决定:“抓住时机,争取龚先达,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第一次争取龚先达未成。

一天晚上,我和赵必扬再次深入匪穴,同龚先达交涉。这次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先到柳港附近找到汉流五哥龚海卿,请他转告龚先达。龚先达听说赵必扬要亲自同他谈判,既心虚胆怯,又气焰嚣张。我们到他那里时,他全副武装,并在驻地周围严密警戒。赵必扬和我



泰然自若,有理有节,柔中见刚,同其开展面对面地斗争。经过一番较量,龚先达终于软了下来,表示受编不受调。我们临走时,他为表示诚意还送了两夹手枪子弹,并派两个匪徒将我俩护送过了沮漳河。接着,赵必扬和我又以同样方式,同谭道义面对面地斗争,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此后,还加强了对江口敌自卫队的政治攻势。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稳定了三股敌对势力,和缓了当时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局面。到1949年3月初,新场区中队的人枪已发展到20有余了。

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经费却陷入困境。当时,上级没拨一分钱,也没发一粒粮,我们只有依靠群众,自筹给养。

一天,区中队正在李家楼活动,忽然得到消息,有十多只资本家的商船正从沙市逆沮漳河而上。这真是一次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区中队闻风而动,疾奔万城对河余家渡,截住了所有的商船,迫使他们缴纳工商税。原来这些资本家的商船运载的全是食盐,无现金缴纳,只好以10多包食盐(约2000斤)抵交。这些食盐运上岸后,很快变成了现金,使我们渡过了难关。这次行动对敌人震慑很大,万城、石套子等地乡公所的人员躲的躲、逃的逃,连荆州西门的城门也关闭起来了。

1949年3月10日,中共江枝宜县委书记李东海带领一个排到草埠,通知新场区政府和区中队领导人到梅剏眼(江陵境内)开会,传达了中共襄西地委关于成立江枝宜县独立营,以及撤销新场区维新、扬新、官荻三个乡政权的指示,要求我们集中力量打击顽固之敌。

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敌对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剧。当时,路南多股土匪各霸一方,国民党便衣特务遍布各地。新场的地霸赵春波也趁机搜刮民财,招兵买马,购枪20余支,并启用赵德伦为武装头目,频



繁活动于赵家渡、肖家桥、娄家洲子和兴隆山等地。地霸黄庚伯、土匪龚先达也与之串通一气,妄图控制新场地区。同时,国民党十五军一部也配合驻江口的大江部队加紧对新场地区的巡察和控制。我们的处境明显地严峻起来。

1949年4月初,我带一战士从草埠回新场,行至栏头堤时,同国民党便衣队的20余人遭遇。开始,我发现堤上有一敌哨兵,便乘其不备,冲上前去,一手持枪对准敌人的胸口,一手抓住敌人的衣领,喝令缴械。当敌哨发现我方仅有两人时,便大声喊叫起来,住在龚家甲家的20余便衣特务闻声蜂拥而上。我急中生智,高喊:“连长,快把部队带上堤!”敌人不明真相,回头乱窜,逃之夭夭了。当我缴获了敌哨兵的枪后才发现随行的那个战士也当了逃兵。

5月初,新场区中队驻扎陶家湖南岸,因消息封锁不严,遭敌大江部队包围,幸好事前有所准备,用渔船驶往北岸而脱险。撤退时,新场区中队战士周松山不幸被捕,次日,在江口镇殉难。

敌人的猖獗不仅不能阻止革命斗争的发展,相反,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大家相信,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但是,考虑当时枝江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一方面,为避免革命力量遭受损失,一方面,为诱敌深入,待大军南下大量歼灭敌人,县委作出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路南各区除保留少数干部坚持工作外,其余随同独立营撤离原地,北上荆当。当时,我和赵必扬、陈全炳等人继续留在新场,其任务:一是掌握敌情;二是宣传我军胜利形势,稳定民心;三是组织支前。我们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七月中旬大军南下,枝江解放。

(李志高)



战斗在顾家店地区的 罗家河赤卫队

罗家河地处长江北岸,位于顾家店东南4公里处。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是中共宜都(枝宜)县委开展地下活动的重要区域。罗家河赤卫队则是当年活跃在这一带的一支颇有影响的革命武装。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赤卫队员出生入死,浴血奋战,配合鄂西游击二大队、枝宜游击支队,为开辟、建立安福寺苏区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粤、赣等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将全省划分为七个暴动区,枝(江)宜(都)属于鄂西暴动区范围。

1927年秋,中共宜都县委委员王天洪、慎家驹秘密来到顾家店罗家河、清水溪一带。在这里,他俩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秘密组建农民协会。王、慎二人首先结识佃户出身的张代昌、江德生和罗益太,并以为之骨干在贫苦农民中串联发动,很快建立了该地的第一个农协小组,罗益太任组长,会员有张代昌、江德生、毛大河、李明顺、尹金辉



等。不久，罗新琅、胡仁甲、罗均全、梅光春、刘厚华也加入农协组织。1928年阴历年关前，农协会员发展到300余人，分布于罗家河、费家店、檀树溪、雅石溪、土地岭和长岭岗一带。为了便于活动，农协又将会员按其所在区域分成10个大组，其中，罗家河一带有4个组，顾家店周围有6个组。二是发展党的组织。在秘密组织农民协会的基础上，经王天洪、慎家驹介绍，罗益太、江德生、张代昌等先后入党。不久，又发展尹金辉，并建立党小组，组长罗益太（1928年12月，杨平章到此建立中共顾家店支部）。三是筹建农民武装。农民协会成立后，活动日趋频繁，妇女协会、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推动经济斗争的开展，农民协会对其委员作了明确分工，决定罗益太分管武装，着手筹建罗家河赤卫队。在党的领导下，顾家店一带的农民运动随着枝宜地区斗争形势的变化，而逐步从经济斗争向武装斗争发展。

（二）

罗家河赤卫队组建以后，虽然枪支很少（主要是大刀、长矛），人也不多，但在顾家店一带的影响不小。特别是三次奇袭反动民团的战斗，干净利落，大快人心。

第一次是活捉汤炼池。汤炼池，白洋雅畈人，系白洋反动民团头目，人唤“汤团总”。多年来，汤依仗其反动武装，四处作威作福，民愤极大，罗家河赤卫队早有铲除这个恶棍的打算。

1930年10月某日，汤又带上贴身保镖来到顾家店，扬言要“坐地筹款，买枪铲共”，反动气焰十分嚣张。7日（古历八月十六）晚，赤卫队得到可靠情报，汤炼池一伙正在街上罗双臣的楼上打牌。

这天晚上，尚实中学院内如往常一样，一片平静，而与以往不同的

是,一个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上级派来的干部小老黄和农协骨干,你一言我一语地研究着袭击团练的方案。会议一结束,罗益太迅速召集赤卫队员和部分农协会员,于半夜时分,悄悄地赶到顾家店。一进街口,队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罗双臣住处,将其房屋包围起来。途中,小老黄还不声不响地解决了设在罗吉科门口的一个暗哨。当小老黄、罗益太、张代昌等人抢先冲进罗的堂屋时,汤炼池一伙顿时乱作一团,到处躲躲藏藏。汤的卫兵欲开枪反抗,却为时已晚。这样,没费一枪一弹,将敌全部俘获。奇怪的是,在清查人员时不见汤的踪影。这时,惊魂稍定的罗双臣赶忙拿出香烟、端出铜钱来敷衍搪塞,企图转移视线。“谁要你的臭钱,给我搜!”小老黄命令道。不一会,一名赤卫队员把汤炼池从罗的神龛背后拖了出来。“你是什么人?”“我是这里的账房先生。”“什么账房先生,明明是团总大人嘛!”这时,从汤身上搜出他的名片更加暴露出他的真实身份。当晚,赤卫队员便将汤炼池押至曾家坝(今马蹄垱水库旁)处决。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长枪7支、短枪3支。

第二次是攻打戴洪炳部。汤炼池被处决后,反动势力如丧考妣,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报复,妄图一举歼灭罗家河赤卫队。1931年5月,他们又调来“剿共”团总戴洪炳部的六七十人枪驻进罗家祠堂。戴自以为比汤高明,趾高气扬地说道:“汤炼池有个屁用,看我来收拾这伙‘夜猫子’。”当时,罗氏族长罗桂岑在祠堂里对戴说:“我这里三面靠山,一面朝河,你在这儿出了问题我可担当不起呀!”戴却耀武扬威,满不在乎。

戴部进驻罗家祠堂,无疑是对革命活动设置的一个严重障碍。罗家河赤卫队决定再次出击,端掉这块绊脚石。事前,地下党组织向家



住罗家祠堂旁的中共党员罗树烺布置了监视敌情的任务。

1931年9月27日夜晩,戴的全部人马在罗家祠堂两边的厢房里睡得正香,几个哨兵也是无精打采,昏昏沉沉。半夜,百余名赤卫队员、农协会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罗家祠堂团团围住。不一会,罗树烺手提双枪,带着4名赤卫队员摸进祠堂,一进门就干掉一个哨兵,打死一名司务长。枪声一响,外面的灯笼火把四起,喊声震天。正在这里,藏在楼上的一名暗哨瞄准罗树烺正要开枪,罗树烺一个鹞子翻身,避开敌人视线,举手一枪,那个家伙应声倒地。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一个个刚从梦中惊醒的团丁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遗憾的是,这天晚上戴洪炳外出赴宴未归,侥幸漏网。

事后,罗树烺、罗清烺等人将缴获的几十条枪用船送往洪湖苏区。

第三次是拦截卞武臣。1932年春,卞武臣当上长岭岗乡乡长。他一上任,即紧步汤炼池的后尘,敌视革命,欺压人民。赤卫队虽然几次谋划除恶,都因机会不好没有下手。

这年夏天,久晴无雨,田地干旱,有人献计:何不以“水”作诱饵,引卞上钩。经过周密筹划决定:在高殿寺,由孟达夫(中共党员)与李德宽假借争水肇事,然后力请乡长卞武臣前来调解,中午,孟家设宴招待,力争挨到天黑,在卞返程途中打个埋伏。计划报送安福寺区委后,县委委员鲍西超专程来顾家店对这次行动作了周密部署。

7月18日(农历六月十一),孟李两家藉水闹起“纠纷”,官司打到乡里。卞武臣不知是计,带上保镖,坐着兜子,悠哉游哉地朝高殿寺方向荡来。

此时,罗益太、胡仁甲、刘厚华、罗均全、蒋长圣、张代昌等人配合区委派来的6位同志依计而行,各就各位。胡仁甲作为孟家的邻居,



负责“陪客”，拖延时间；罗益太潜入孟家内房指挥；其余人员散布周围，假装割草，观察动静。

到了中午，孟家的餐桌上一伙人你斟我酌、觥筹交错。午宴在慢慢吃，时间在慢慢移，一餐饭吃了个大半天。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卞武臣一伙这才腆着肚子摇了出来。一路上，晃晃悠悠，春风满面，不知不觉走到牛颈糠。这时，埋伏在芭芒丛里的罗均全等人一拥而上，将他捉住，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送他上了西天。卞的保镖毛大廷正想动手，一赤卫队员眼疾手快，转身一刀砍去，未料，毛戴的是硬壳斗笠，只栽了一个跟头，滚到坎下，逃之夭夭了。其他人见势不妙，甩下兜子，四处飞跑。

处决卞武臣以后，这一带的土豪劣绅纷纷外逃，并接二连三地前往宜都清乡委员会告状，叫嚣着要替卞武臣报仇。顾家店一带的革命人民面临着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三)

正当枝宜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于1932年6月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国民党正规军大举进攻的同时，松滋、宜昌、宜都、当阳、枝江五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也配合行动，实行“五县联防”，向革命人民开始了血腥镇压。

1932年8月5日（古历七月初四），“五县联防”以三个中队的兵力加上武魁场的“铲共义勇队”共2000余人，分成三路扑向顾家店地区。他们计划：一路到高殿寺捕杀胡仁甲；一路去清水溪追捕罗益太、张代昌；一路到檀树溪搜捕钟世新、余耀廷。初五清早，胡仁甲正在菜园里浇水，不幸惨遭枪杀，后来，敌人还砍下他的头悬挂在宜都南门示



众,将他的尸身砍成八块丢入长江。追捕罗益太时,他正在罗桂岑家的后面堰里捞猪草,幸得敌群中有一副班长是罗的叔伯弟兄,他假装不慎走火,途中放了一枪。听到枪声,罗拔腿就跑,才幸免于难。在罗桂岑门口割谷的张代昌亦闻枪声逃脱。七月初六,敌人的第三中队一到檀树溪,首先封锁笋子沟、梅花桥,然后合围钟世新的家。当时,李贞、董雅先、余耀廷、卢昌宴正在钟家开会。董雅先率先夺门突围,因寡不敌众,当场牺牲。李贞由农协会会员闫于坤掩护从林家渡过江,来到百里洲,隐蔽在张子明的住处,后来因人告密被捕,在荆州英勇就义。余耀廷突围时被敌击伤,血流不止,昏倒在地,敌人以为他已死去,踢了几脚就走开了。晚上,余苏醒过来,潜入深冲隐蔽了几日,每天由农协会会员李正法暗中送饭。不久,也因有人告密,抓去砍头示众。卢昌宴亦相继被捕,被杀害于武魁场。钟世新死里逃生,而钟的父亲钟宜夫却被敌人杀害。高殿寺的孟达夫及其两个儿子孟宪益、孟宪章(中共党员)和顾家店的农协会会员罗极平、罗圣烺、罗极云等均被敌人在松林坑活埋(即原顾家店乡政府宿舍西院墙处)。

此时,敌人上自沙碛坪,下至毛家场,北抵雅石溪、张家店,肆无忌惮地对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农协会会员和无辜群众搜捕、屠杀,并疯狂地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一时间,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被敌人镇压下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罗家河赤卫队,虽然自此停止活动,但革命义举苍松为证,英雄伟业长虹作歌,顾家店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名。

(陈世恩 徐长虹)



中共地方组织在百里洲 早期创建足迹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开篇语）这个幽灵绕过欧洲航行到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在四面环水的百里洲上，同样孕育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运动；这个幽灵的目的是让全体劳苦大众获得解放而夺取政权。

办校传播新思想

起源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热情，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随着“五四”运动的荡涤，兴起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强大浪潮，启迪着广大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接受新事物、感悟新生活、兴办新教育、传播新思想。1922年，百里洲人刘韞章留学归来，邀集乡贤志士，在刘家巷集镇办起贫民学校。以刘氏宗祠为校址，筹购设施教具，专收贫寒子女入学，利用农闲时间授课，采取农民识字本、民众补习班、夜校讲堂等方式，聘任兼职教师或专职教员，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传播进步思想。入学者近百人，维持四年之久。



1925年,百里洲青年学生张子明、向云汝、邹永典等人在湖北省立三师(校址在宜昌东大门文昌宫)读书,受到马列主义影响,中文老师祖山竹(中共党员,是董必武委派到三师任教)利用课堂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宣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洋人为什么敢在中国横行霸道?宣讲改造社会进行革命的道理。在祖山竹的引导下,学生自治成立演讲团,每周举行演讲会,还秘密传看《汉声周报》《国际歌》《向导》《唯物史观》等书刊,在百里洲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封建斗争,组织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讲等学生运动,受到广大平民的拥护和称赞。

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宜昌,百里洲进步青年胡伯温、张子明等回到家乡,联络旧友刘韞章等四五十名学生四处奔走,广泛宣传,在百里洲开办平民学校,成立刘巷农民协会(1927年2月,刘韞章任主席),贴标语,喊口号,组织平民示威游行。土豪劣绅惶恐不安,广大百姓欢欣鼓舞。

革新堤政开先河

乘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枝江首先革新的是百里洲的堤政。百里洲江堤为民垸民堤,把持百里洲堤防大权的是大地主大劣绅樊靖甫,时任堤防“册证”,下设“九总”。总首均由当地大地主担任。

由于“总役费”(即堤防费)是以支定额(即开支多少定收多少),“册证”“总首”们贪污分赃、吃喝玩乐、巧立名目等均可作为“总役费”任意列支。又由于“总役费”是轮流负担,贫困老百姓年年上交总役费,被逼得倾家荡产,怨声载道。



在宜昌三师参加学生运动的百里洲学生刘韞章、张子明、向云汝等人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经过反复酝酿,秘密发动,决定在刘家祠堂(刘巷)举行革新堤政大会,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也得到了一些富农小地主的支持。于是由刘韞章主笔起草状词,痛陈“总役”制度的弊端,提出取消“总役”开支,实行预算开支;主张“每亩捐资、合理负担”,取消轮流负担法;主张堤政议事会,由议事会挑选修防处主任,并将状词和主张呈送县政府。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广大民众参与以及正确主张的情形下,时任县长孙宸采纳了这一革新方案,废除了旧的“总役费”制度。

最早支部“鲍文清”

1927年春,正当革命进入高潮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驻宜昌北伐军14师夏斗寅部叛变投蒋,又勾结川军杨森在宜都制造了“五八惨案”。枝江的反动派闻风而动,也在百里洲以“提田共产、剪发共妻”的罪名,对革命者大下毒手。张子明、胡伯温等被迫出走。直到武汉国民政府派兵西征,农村形势缓和以后,才于1927年秋返回家乡。

1927年底,在宜昌第三师范读书的周景颐(又名周济,当阳人)因参加瓦仓起义失败,无法立足家乡,即邀约其兄周小溪和张华权秘密来到枝江。他们在百里洲找到同学刘韞章、张子明和四中学生胡伯温。经过一段时期交往,张、胡二人共同出资,在张家巷子河边买了一栋房子,开设了一家牌号“协和样”的土特产收购店,让周小溪、张华权二人安身;不久,又在奎星寺办了一所小学,让周景颐在那里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他们志同道合,患难相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8年春,江口小学教员吴先孔(又名吴少明,中共党员)介绍徐保元(当阳县人,宜昌第三师范学生,化名李进,中共党员)到百里洲秘密联络瓦仓起义失败外潜的同志。徐以督学为名,在百里洲边了解情况,宣传外地革命形势;边秘密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不久,吸收胡茂宜、周小溪、周景颐、张子明、胡伯温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百里洲最早的党组织——“鲍文清”支部(为隐蔽取的化名,驻百里洲奎星寺小学,隶属中共枝江临时县委领导)。周景颐担任支部书记,张子明、胡伯温分任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随后党支部又吸收农民张定太、张祯福入党。

这年初夏,鄂西特委派干部傅恒之到奎星寺联络工作,拟在洲上组织民兵队伍。由于上百里的偏洲、坝洲是松枝宜交界之地,且地形复杂,利于攻守。同时,地广人稀,回旋余地较大,即使暴动失利,也易转移。未料,暴动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徐保元调离,后来又在武汉被捕叛变,百里洲党的地下组织被徐出卖。6月底,刘巷民团头子陈楚良派兵包围了奎星寺小学,周景颐被捕入狱,其他成员外潜。“鲍文清”支部停止活动。

1930年,中共地下组织在枝江的活动日趋频繁,敌人的进攻也日甚一日,“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十分激烈。1930年1月,洪湖苏区派来王雨山(监利县人)任中共宜都县委书记,加快了长江南北两岸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这年春天,王雨山到百里洲奎星寺找到胡伯温、张子明,经过一段工作,又在这里组建了中共枝江县特别支部。特支书记张子明,支委胡伯温、张定太,特支受县委直接领导。枝江特支的组建,使百里洲地下党的活动再度活跃。按照县委指示,特支建立后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发展党组织,最先发展鲍西超、鲍保臣、鲍福祥和

坝洲的李先斌入党,在约半年的时间里,发展党员 50 余人。党员分布于张家尾、傅家渡、戴家渡、芦洲子和刘巷等地。二是开展群众工作,成立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员。三是选派共青团员熊大恕、熊大有、胡道经、李绍栋、孔繁质等 6 人到洪湖苏区学习政治和军事,为土地革命准备人才。四是以百里洲为基地组织武装游击活动,打击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

创建武装游击队

1930 年 6 月,王雨山从公安县调来富有游击经验的武装干部,携带数支短枪配合枝江特支在张家尾子一带从事游击活动。他们依靠特支的组织和领导,在百里洲发展游击队员,创建了百里洲游击队。这支队伍在龚家潭先后处决团总李明斋、联保主任周体泉以及恶霸地主胡天觉等人。不久,又在羊角洲小垸子打死正在收租的大恶霸鲍西之兄弟。由于连续惩治土劣恶霸,游击队声威大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地主豪绅惊恐万状,闻风丧胆,贫苦农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1930 年 7 月,国民党独立 14 旅大肆“清乡”,松枝宜三县部分组织遭敌破坏,中共宜昌特委决定重组第二届中共松枝宜县委。1930 年 10 月,为了适应鄂西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中共宜昌中心县委又派松枝宜县委书记王雨山再次到百里洲,拟将枝江特支和百里洲游击队调往安福寺农村,以加强县委武装力量。后来特支过江时,部分隐藏较深的党员没有随队撤离,继续留住百里洲,其任务是搜集情报,配合江北开展游击斗争。1930 年农历腊月间,他们攻击了以黄凤麟为首的反动民团,打死乡长龚指东。腊月三十,黄凤麟带领“铲共义勇队”向革命群众反扑,杀害了中共党员鲍福祥、张子明的叔父张



天坤和鲍保臣的弟弟,还放火烧了胡伯温的房屋。黄凤麟勾结川军赖新辉部推行极其残酷的“清乡”政策,百里洲不少革命家属又被逮捕关押或被勒索钱物。

中共枝江特支和百里洲游击队到达安福寺后,在鄂西特委和县委统一领导下,以百里洲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松枝宜县委领导的比较正规的游击队伍。1931年1月,宜昌特委在江北组建枝宜县委时(此时又撤销松枝宜县委,分设松滋、枝宜县委),同时建立枝宜游击队,张子明任大队长。1931年7月,枝宜游击队被编入鄂西游击二大队。1932年夏,敌人实行更加疯狂的“围剿”,枝宜苏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极端艰难的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县委委员、江北游击支队队长张子明在安福寺桑树河坝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县委委员鲍西超在宜昌被捕附敌。县委委员李贞、鲍保臣准备带领部分游击队员突围寻找红军,结果队伍被打散,鲍保臣在沙市被捕附敌,李贞被捕后坚贞不屈,于1932年在荆州英勇就义。县委委员胡伯温在鲍保臣的诱降下,于1932年10月到沙市投敌叛变,充当了川军142旅谍报员。

轰轰烈烈的枝宜苏区土地革命斗争虽受严重挫折,但是,反动统治者实行血腥镇压激起的阶级仇恨却深深地铭刻在百里洲人民心中。

驱赶区长郑斗南

李先兵,百里洲李家渡人(曾任枝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李先兵本名李承志,在江口小学读五年级(1929年暑假)时,拿着侄儿李先滨(中共党员,被国民党杀害)小学毕业证报名荆州八中,从此用上侄儿的名字,先用“滨”,次用“宾”,后一直用“兵”。抗战初期,李先兵与周



绍汉、吴先林等积极参与抗战斗争,组织青年街头宣传,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10月,李先兵同周绍汉、吴先琳经抗日民族先锋队介绍,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后来周绍汉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李先兵与吴先琳一道返回枝江。通过江口小学校长谈畅轩的帮助,在江口小学任代课教师。

李先兵在江口小学任代课教师期间,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组织了“抗日救国工作团”,在百里洲设立分团部。开展了一次“驱郑”运动。

时任百里洲区区长郑斗南,长期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万般阻止抗日救国运动。李先兵等人先后发动从武汉、荆沙、宜昌等地回乡的学生一百多人的“驱郑”声讨,收集郑的罪行证据,到县政府礼堂坐堂请愿,强烈要求撤销郑斗南区区长职务。最后逼迫国民党下令撤换,任命黄少林任百里洲区区长职务。

两路夹击刘家巷

1948年秋,中共江汉区第四地委决定武装开辟枝宜地区,并调李先兵到江枝宜新区任书记。随后陆续组建了江枝宜县委。1949年6月组建中共枝江县委。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先兵、副书记刘绍文(女)带领县委班子进驻江口,并宣布成立枝江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9年7月17日,困守百里洲的国民党军枝江县大江部队一营营长率其残部到江口向县军管会投诚。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13兵团38军112师挺进枝江。

经过侦察,于18日黎明,中共枝江县军事指挥部派教导员孙玉



卿、连长刘玉亭率两个排的兵力，分两路：一路在百里洲傅家渡上岸向东；一路从百里洲吴家渡登陆向西逼进刘家巷（庚信乡公所驻地），国民党“民众救国团”李敬波所部三四十人闻风丧胆，缴械投降。至此百里洲解放。国民党枝江县副县长严西陵也由指挥部敌工干部从百里洲带到江口向县军管会投降。枝江全境解放。

中共枝江县委随后在百里洲设立刘巷区委和冯口区委。

为得晴朗扫残云

百里洲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地方散匪、恶霸地主勾结作乱，杀人放火，肆意骚乱新政权。原盘踞百里洲的土匪和地主武装谢平川、李敬波等人潜逃。1949年7月下旬，枝江县政府颁布布告，要求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立即到人民政府登记，并交出文书表册、枪支弹药装备等，如能遵守法令，人民政府予以宽大处理，不究既往；对少数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捉拿之后严惩不贷。全县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手，部队、司法机关配合，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常广宣（百里洲人）到县政府登记后，政府责令其写信给未登记的人员速来登记。常先后争取了县党部秘书、执监委员、干事、区党部书记等18人登记投诚。1950年1至5月，刘巷区、冯口区党委、农协会组织民兵配合协助驻枝部队和枝江公安部门抓捕谢平川、李敬波、林必藩、张明山等人，收缴了李敬波的全部武器。土匪谢平川共交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步枪37支，手枪12支。刘巷区、冯口区收缴了土匪和地主武装的全部枪支，仅冯口区就收141支。强有力的清匪反霸斗争如浩荡东风扫残云，新生政权得到巩固，人民得以安宁，恢复生产呈现好态势。



1950年6月,百里洲刘巷区和冯口区根据枝江县委、宜昌地委、湖北省政府关于减租减息的紧急指示和实施细则,开展土地减租减息运动。1950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南局颁布的《中南区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农民所欠地主、富农的租息及债务一律免交和废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正如《共产党宣言》最后阐明的那样: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杨尚成)



烈火淬金的枝江中学

枝江中学(现今的枝江一中),溯源于丹阳书院,脱胎于荆南中学,历史悠久,知名度高,办学成就斐然,对枝江教育影响深远。

1949年前,枝江中学(荆南中学)师生在张春霆(继煦)、时象晋(樾阶)等枝江教育先驱的带领下,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在如磐风雨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枝江教育发展篇章。

1918年3月,荆南中学创立于武昌牙厘局街(现名荆南街)府台衙门旧址,由原荆州府所属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七县旅省同仁筹办,敦请教育界名宿枝江人张春霆任董事长,枝江董市人时象晋任校长,潜江熊口人张本铤(松麓)任训育主任。明清时的荆州府“七属”,春秋时属楚,秦汉时属南郡,向为藏龙卧虎之地。学校以荆南命名,盖有弘扬历史,方便故土赴省学子求学以成其才之意。

学校创建之初,经费仅靠一笔为数不多的荆州府存省学款,百业待兴,困难甚多。学生半数住校,学费亦较当时一般私立学校为低。校长系义务性质的兼职,只由学校付给车马费四十元,后张春霆先生任校长期间,获知学校经费无多,连车马费也拒绝了。那时,张春霆先生正供职教育部任普通教育司司长,大力倡导各地发展教育事业,极其热心家乡教育,自然成为荆南中学建校和发展的强有力支柱。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学校初具规模,课程按教育部规定设置,采用新编教科



书。学生着统一校服,精神抖擞,教师阵容整齐,教学紧张有序。校长时象晋(樾阶)亲自为“荆南中学校歌”作词,词曰:“汉江荡荡,荆山苍苍,三大革命,肇自楚疆(疆)。少年立志,蔚为国光,勛哉多士,矢志勿忘。”“三大革命”系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等,“肇自楚疆(疆)”意即武昌首义。歌词阐明了荆南中学的培养目标,号召广大学生继承发扬湖北的革命传统。荆南中学学生积极参加了以“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为两次高潮的长达数十年的武汉地区学生爱国运动,自始至终,实践了“蔚为国光”的宏愿。

1919年5月初,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5月10日,在恽代英、林育南的领导下,荆南中学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与共约十五校的学生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5月14日,各校代表成立学生联合会,恽代英起草宣言,揭露巴黎和会分赃骗局,呼吁反帝、反“曹”“陆”“章”三大卖国贼,拒绝签署合约。5月18日,荆南中学学生与各校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宣传“外抗强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把自己生活用品中的仇货悉数烧毁。5月20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扬言学生再胡闹就下令格杀勿论,对学生进行恐吓和威胁,这激起了学生更大怒火。6月1日,在校门被武装军警严密监视的情况下,荆南中学学生机智地避开军警越出学校,分成五人一组奔赴街头,与各校学生紧密配合,散发传单,开展演讲,与前来阻扰的武装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冲突中学生受伤数十人,被捕20人,其中荆南中学学生被捕4人,在各校被捕学生人数中居第二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武汉地区“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学生义愤填膺。6月2日,学联向省长何佩溶提出“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治伤道歉……废除二十一条”等三项要求,未得结果。6月3日,荆南中学学生



在省长公署门前(司门口)参加了有五千之众、长达两天一夜的静坐请愿,迫使鄂督王占元释放被捕学生。6月20日,荆南中学学生又聚集在汉口球场街广场参加了万人追悼李鸿儒同学(中华大学学生,因被军警打伤腿部,悲愤投江自杀)大会,聆听恽代英、施洋的演讲,反帝反军阀的热情更为高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8日,宜都驻军勾结土豪劣绅发动叛变,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五八”惨案,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枝江、宜都等地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5月13日,在武汉农讲所学习的陈希实(枝江安福寺陈家垸子人)联络在汉学习、工作、避难的宜昌籍人士程光炳、廖耕山、姚百川、黄古衡等,在荆南中学筹备成立“宜都惨案后援会”。6月12日,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宜都惨案后援会”在荆南中学正式成立。“后援会”一面从事宣传活动,一面探听各避难同志的近况,并募集经费,支援避难同志。

1935年,何功伟领导了武汉地区“一二·九”运动。荆南中学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及以后武汉学联和武汉学生救国团的一切活动。1936年6月初,广西李宗仁和福建蒋光鼐的十九路军旧部联合起来,反蒋抗日,蒋介石派出重兵镇压,武汉学生救国团决定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内战,并恢复学联。荆南中学由姚树森(省高学联负责人之一)负责联络。何功伟起草的省高反战宣言均已铅印发出,但由于姚树森被捕,何功伟紧急出走,抗议活动未能按计划进行。荆南中学教师思想进步,一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一方面重视教育质量,对学生学习要求严格。1936年,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前十名就有两名是荆南中学毕业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武汉迭遭日机轰炸。这时期,张春霆先生任湖北省通志馆主编,已正式兼任荆南中学校长。为了学生学习安全,是年寒假,荆南中学运出全部图书、仪器、化学药品和部分教具,将校址迁至枝江县城(现宜都市枝城街道办事处),借原枝江县城中心小学部分住房和城隍庙为校舍。1938年2月学校开学,招生复课,并打破荆南中学只招收男生的惯例,新生男女兼收,混合编班,学生300多人,编为七班上课,开设公民、国文、英语、算学、理化、植物、动物、历史、地理、卫生、体育、劳作、图画、音乐、童子军等课程。教职员基本上为武昌全部人马,教务主任王渭北(又名文瀛,武师大毕业),训育主任张本崧(武师大毕业),事务主任张佑父(枝江县城人),教员有朱心水(教英语),王功品(教英语,汉阳人),陈启鄂(教数学,同济大学毕业),陈志纯(教历史,曾任武师大教师),聂相衡(宜都人,教语文,留日学生),熊继龙(教体育,松滋人)……职员有肖实之(教务员),赵华(宜都人,事务员)等。是年7月,学生毕业一班。暑假,其余6班全部转入省立联合中学,下期招收一上新生一班。至此,教学已完全走入正轨。

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荆沙吃紧,时局日趋恶化。1939年上期,枝江县城亦遭日机轰炸,春霆校长住宅被毁,县政府西迁石门坎。是年暑假,荆南中学不得不忍痛丢下苦心重建年余之学习环境,再迁至县城西农村架锅山,租用曹樊城民房和土地20亩,赶建土墙茅盖简易校舍。下期如期开学,师生临难不惊,在艰苦条件下照常上课,做理化实验,全校学生自觉遵守张校长提出的要求,筑起“精神院墙”(因学校无院墙与外界隔离),从不轻易进入附近民房,教学秩序井然。

1939年9月,在战训班学习结束时参加共产党的吴先涛回到荆南



中学学习,在校发展党员。1940年,荆南中学成立中共支部,吴先涛任书记,党员有李春荣、朱亚民、黄昌庆、黎泽寿、孙世宽(以上均为学生)等。是年12月,经松枝宜中心县委批准,建立中共茶园寺特别支部,李明时任书记,荆南中学支部属茶园寺特支领导。

学校经过每学期连续招生,至1940年下期,已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五个班次,学生又增加到200余人,政治空气活跃,校内抗日歌声飘扬,各种墙报纷呈异彩,使古老僻静的山村,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也随之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学校奉令增设军训课,先后有中央军校毕业生陈福群、董韦受、董家纯等来校任军训教官,进步学生受到监视,学生纷纷出走,三年级学生更是所留无几。以致1941年上期仅有4名男女生毕业。

1941年下期开学时,湖北省实施计划教育,每县设立中学一所,荆南中学因此改名枝江县立中学,仍以张春霖为校长,王渭北为教务主任。开设8班,学生400多人,约在年初先后有陈际之(即陈以文烈士)、卞静生、淡畅先等来校工作。本期将运动场扩大为6亩,农场扩大为4亩,并建有储花室,以美化学校环境。寒假,枝江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1942年,开设6班,学生300多人。7月,第二届学生毕业。暑假,由于省令中学实行公费制度,枝江县经费困难,曾一度合并于松滋中学,改名松滋中学分部,后因经费纠纷未得解决,复名枝江县立中学。是年11月21日,枝江县政府发来快邮代电称:“据密报共匪今年五、六月间在各地策动工潮及专科学潮失败后,现正拟转向全国各省市公私立中学,再度鼓动学潮”,希“严加防范,以杜奸宄”。进步学生再度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2月,第三届学生毕业。

1943年5月初,日军从监利渡江,公安、石首、松滋相继失守。5月

12日,日军由江北沙积坪下堆坞滩渡江,经三里桥南犯枝江县城。形势危急,时张春霆校长年已六十有七,为保存抗日后备力量,当机立断,遣散附近学生,使之安全撤离,留下录事肖实之护校,亲率师生百余人,避开敌人锋芒,走僻径、耐饥寒,辗转西行,一路上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历经20余日,行程700余里,安全抵达省府临时驻地恩施。师生西上后,学校厄于战火,校舍、教具、图书、仪器均遭浩劫。录事肖实之系荆中老职工,由武汉随校来枝江县城,再由县城随校至架锅山,单身一人,以校为家,遇寇不屈,卒死于难。6月寇退。7月1日,师生由鄂西归来,一面维修校舍,一面复课。本月,第四届学生毕业。8月,春霆校长因通志馆事留恩施,暂时去职,王渭北接任校长,鲁枝生为教务主任,各年级课程作了较大调整。10月,日军再度南犯,学生就地疏散避难,学校再遭日军破坏,损失较前次更为惨重,断垣残壁,满目废墟,学校已不复成其为学校了。计清查,全部损失折款171.116万元,其中仅仪器损失就高达147万元。11月,日军溃撤江北,学校在更艰难的条件下复学。12月,第五届学生41人毕业。

1944年上期,破败校舍经过20余日的紧张修缮,师生已可避风雨。又添置了一批教具,学校得以因陋就简地按时开学,学生200余人,共设4班。3月17日,枝江县政府训令枝江中学,将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誓词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祝词塞进国文教材。7月,第六届学生60人毕业。12月,在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下,有30多名学生参加青年军。一部分教师也因生活困难去职。临放寒假时,全校教职员仅12人,其中任课教师少至7人,学生数、班级数均已锐减。

日军第二次撤退以后,无力再次南犯,学校得以安全。元气有所恢复,教学逐步走上正轨。1945年开学后,学校强调各科必须按教学



计划完成教学进度;学生作业必须全批全改,数学作业还应课堂订正,每次作业批改后都要注明年月日,以备考核,不准于作业后加含混笼统之批语或签字盖章了事;要求各班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掌握学生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及时给予指导,组织学生消费合作社,设立膳食部,利用劳作课和课余时间,指导学生种蔬菜,以加强民主管理,改善学生生活;严禁摊贩入校摆摊或叫卖,保持安谧的学习环境。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3月17日,县长彭永源送来《学生礼节》200册,令学习遵行。5月25日,又训令教方切实注意防范进步人士担任教员,以利用教师地位接近家长、乡保长、绅士和农民群众。7月,第七届学生31人毕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师生欢欣鼓舞。但复校任务艰巨,又引以为忧,喜得春霆老人赶来枝江,复任枝江中学校长。张校长利用自己声望,鼎力周旋,赢得县政府重视,决定利用迁复契机,在县城中心小学旧址重建校舍。经过紧张筹备,1946年1月动工,暑假全部竣工,主建筑为一楼一底、上有木栏走廊的新式教学楼和一栋女生宿舍楼,后来又拨来城隍庙,改建凹字形平房宿舍三栋,为迁城复校打下了物质基础。

1945年下期,枝江中学仍在架锅山茅舍开学。招收新生两班,开设5班,学生不足200人。本期适应国际形势之发展,将英语周课时改为6课时,由选修课改为必修课。1946年2月,师生自架锅山返回县城。3月4日,借文昌宫丹阳中心学校(今枝城小学)校舍开课,共开7班,学生300多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停止公费,国民党军队频频进攻解放区,学潮迭生,县长肖伯勤亲自来学校调查处理。时张校长因另有公事赴省,代校长鲁枝生迫于权势,于6月27日,以“鼓动学潮”的罪名,宣布开除朱尊大、张大才、李伯阶、杨必记、张柯、丁任铃、向从宜等



7名学生,并追缴业已享受的公费待遇。7月,第八届学生28人毕业。

1946年9月,全校师生搬入新校舍,本期增设简易师范一班,学生中建有读书会、新生活促进会、艺术研究会、运足会、枝中路修建会、园圃筹建会等组织,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校内政治空气活跃,弦歌之声不绝。由张校长之女张叙芳领导的晴空壁报社和张铭常领导的枝中剧团,深受师生和市民欢迎。约10月,张校长由汉返校,规定上课不准戴帽,平时不准上街,亲自带领学生清除校内砖块瓦砾,对校风校纪要求严格,对改善学校环境十分关心,对枝中重建竭尽了全力,在师生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师生住宿拥挤,11月6日,杨德福、杨达人等将女生宿舍楼后之杨家祠堂献给学校作宿舍。

1947年2月,张校长因年老多病,体力不支,呈准卸职,由教务主任鲁枝生继任校长。七月,第九届学生42人毕业。9月招收一上新生两班,简师一上新生一班,共设9班,学生400余人。

1948年2月,初中部改学年制为学期制,合并学生一班,招收初中部新生一班,将原三下两班学生,按成绩分为三上、三下两班,原二上两班,分为二上、二下两班。共设9班。4月12日,淡畅先接替鲁枝生为校长,周国荃任教务主任,付恒任训导主任,赵明坤任事务主任。7月,第十届学生45人毕业。9月,招收一上新生两班,简师一上新生两班,共设11班,学生500余人,班次增加,宿舍不够,公产武庙交学校改建教职员宿舍。12月,第十一届学生16人毕业。

1949年1月,淡校长去职,李绶玺任校长,李光县任教务主任,陈汉丹任训导主任,赵仲甫任事务主任,教职员48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和肄业生仅7人,受中等学校教员检定合格者仅8人,教师力量明显减弱。2月,为接受江北众多失学青年,扩大招生名额,破例录取初一新生四班,共设14班,学生628人(初中部529人,简师99人)。当时,



校舍尚不够11班学生学习住宿之用,两栋教学楼又被驻城国民党军强占一栋(6间),不得已,乃将另一栋楼房六间教室,白天摆桌上课,晚上开铺睡觉,学生露天开饭,严重影响教学。又值国民党流通货币金圆券急剧贬值,商品一日一价,县政府下拨经费不足,教师薪给、公费生(简师生)膳食费和特别办公费其数更微,办学步履维艰。时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5月,沙市、宜昌相继解放。6月,县长郑行之下令提前进行毕业考试,由督学薛爱周监试,初中部第十二届学生47人毕业,简师第一届学生28人毕业。解放临近,曙光已现,师生心情振奋。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疯狂挣扎,肆意摧残教育,镇压师生进步活动。国民党第2军、15军、79军,先后强住学校,任意烧毁教具,抢走图书仪器药品,并设置督导区,印发联坐保证书,强令教师5人联保、学生10人联保限制师生行动,以加强控制,叫嚣“如被保人有违反三民主义,参加奸匪组织及奸匪活动或泄露机密行为者,应受到最严重之连坐处分”。国民党驻军遍布全城,岗哨林立,荷枪实弹的士兵如狼似虎,随时闯入学校,进行所谓清查搜捕,答问稍有疏漏,便被横加罪名,捆绑带走,学生吴忠训曾被捕监禁,工友邓志元曾被抓去审讯,两人均系少年,亦难幸免。

1949年7月17日,枝江县城解放。人民政权迅速建立,在陶君彦县长的主持下,枝江中学以崭新的风貌,于9月1日隆重开学,在激越云天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中,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历经千辛万苦、倍受摧残蹂躏的辛酸建校史,揭开了谱写人民教育的新篇章。

(根据傅纯修、张叙芳回忆录整理)

★第二篇★





枝江地区党组织早期领导人

贺龙 1926年8月,贺龙就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这年底,贺龙率部进驻洋溪、董市、江口等地。

周逸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8年至1931年多次到安福寺苏区指导工作,是安福寺等苏区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段德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8年至1930年多次到枝宜地区指导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苏维埃政权,他是安福寺等苏区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李先兵 1949年5月首任中共枝江县委书记。1937年毕业于武汉育杰中学后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接着派到枝江组织了青年抗日救国团发动了驱逐百里洲区反动区长郑斗南的运动。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江口建立中共江口支部。1939年春又组建了中共江口区委。1940年7月,他被中共百里区委送往襄西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李先兵任路南县委书记,并率部进驻应家巷、双宗祠、草埠和问安地区。1948年秋,中共荆钟宜县委成立,他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他又任中共江(陵)枝(江)宜(都)县委副书记(1949年3月至5月任书记),兼县长。

陶君彦 1949年5月首任枝江县人民政府县长。1928年9月考



入江苏省东海师范学校,入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他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1937年冬,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1938年春,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斗争。1948年2月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江汉平原。1949年5月任中共枝江县委委员、枝江县县长。1950年10月调离。

陈德华 号希实,安福寺镇人。中共安福寺地方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3月进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到宜都县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因“五八”惨案而遭破坏的县农民协会,并任农协会主任。同年8月,到安福寺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并先后建立了中共徐家嘴、陈家垸子两个支部,有党员28人,他兼任陈家垸子支部书记。1928年春,党组织将他转移到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他在武昌削发为僧,法名弘妙。

徐天德 又名天祯,化名孙继从,安福寺徐家嘴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新场地方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初参加革命,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0年,任中共安福寺区委交通员,积极参加了创建安福寺苏区的活动,并参与领导了安福寺地区党组织发动的以“吃大户”为主要形式的著名反饥饿经济斗争。1931年,他任该地党的基层支部书记兼地方赤卫队队长。1932年8月革命受挫后,反动派悬赏100吊(死的50吊)钱捉拿他。敌人抓走了他的妻子徐杜氏,烧了他的住房,并胁迫其父劝降,他均没有屈服。1933年下半年,他以中共陈家港支部为基础,先后创建了赵家楼等4个党支部,共发展党员40余人。1942年8月任中共江(陵)枝(江)特区委委员,1943年为区委负责人。1949年,他积极参加了支前工作,任船只大队长,共租民船100余只,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

陈德兰 瑶华乡陈家垸子人,是安福寺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任安福寺地区农民赤卫队队长。1928年和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安福寺人民开展的著名的反饥饿经济斗争。1930年至1932年,他积极参与领导了创建和保卫安福寺苏区的斗争,并任陈家垸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初,他参与领导发动了安福寺七八百农民配合鄂西游击二大队攻打横店子、安福寺和鸦鹊岭团防据点的战斗,并处决了大土豪陈海涛。1932年7月,陈德兰在安福寺的菜子坪不幸被敌“清乡队”逮捕,敌人用木棒打断他的双臂,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也同时被捕。在关押期间,他遭受了压杠、香烧等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彻底革命精神。当月,他与其大姑娘、三姑娘3人同时在安福寺玛瑙河畔英勇牺牲,时年49岁。

张子明 又名祯聪,百里洲羊角洲人。1926年在百里洲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奎星寺支部宣传委员。1930年春,他任中共枝江县特别支部书记,开展武装斗争,先后镇压了李明斋等4个大土豪。1931年1月,枝宜游击队正式成立时,他任队长,又任枝宜县委委员。1931年至1932年春,他率领游击队在枝宜地区打游击,先后攻打了安福寺、白洋等国民党团防据点,袭击了这一地区的“清乡委员会”和编联队等反动武装,为创建巩固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春,他在安福寺桑树河坝不幸被当地编联队逮捕,随后在安福寺英勇牺牲,时年26岁。

杨平章 又名中游、况明,枝江县顾家店乡人。中共枝江地方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春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初,他创建枝江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高殿寺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28年底,到顾家店地区恢复重建因宜都“五八”惨案而停止活动的中



共高殿寺支部,组建了中共顾家店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31年1月,到枝江县城创建了中共枝城支部,任支部书记。1932年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饱受酷刑,但始终未向敌人屈服。1933年4月,他在荆州城英勇就义。

周绍汉 又名石,枝江县董市镇周家湖人。1937年考入武昌育杰中学。在校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0月,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同年秋回到家乡董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10月,任中共董市支部书记。1939年春,任中共董市区委书记,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委员兼军事委员。并以自己的公开职务——国民党新周乡自卫队副队长的身份,在新周场开办了“社训队”,轮训董市附近的青年农民。1939年8月,县三青团头目谢东藩持枪威胁周家,强迫周绍汉在三天之内离开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周绍汉被迫离家后西行四川,考入成都华西大学外语系学习。1940年6月,日军侵占枝宜地区后,周绍汉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8月,不幸在宝筏寺被日军逮捕,当日被惨杀于长江边,年仅23岁。

刘惠馨 1939年任中共百里(新场)区委书记,是枝江县最早的女书记。

枝江第一个党小组——中共枝江县小组:1927年5月1日,柴燊(中共党员)在县城孔庙后殿发展吴先孔、萧宝苍和薛开选3人加入共产党,并组建了枝江县第一个党小组,柴任组长,有党员4人,隶属中共宜昌特支。

枝江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高殿寺支部委员会:1927年4月,柴



燔在县城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期间,在县立国民小学校介绍杨平章入党。5月初,杨在高殿寺地区正式创建了枝江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高殿寺支部,隶属中共宜昌特支,有党员11人,杨平章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梅正芳(分管组织)、覃子芹(分管宣传)、谢官清(分管青年工作)、谢杰臣(分管经济)、杨先炳(分管监察),党员有彭先茂、刘光元、张家保、覃子明和梅光明,由于支部的主要成员多数加入了国民党,且在县属国民党区分部任职,故该支部对外称为“国民党枝江县江北独立区分部”。

中共枝江小组和高殿寺支部的诞生,是枝江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枝江有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枝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



段德昌点燃枝江烽火岁月

段德昌(1904年—1933年),湖南南县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青年时期即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指导下,转入鄂西一带农村,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率游击队初创洪湖根据地,后与周逸群、贺龙一道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鄂西游击总队代总队长。红独一师成立后,任独立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成立后任副军长、军长。新6军组建后任军长。1933年在“肃反”中遭诬陷被错杀。

1927年至1931年,段德昌多次到湖北枝江安福寺一带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组织,组织农民暴动,建立武装割据政权。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段德昌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恢复和发展中共枝江地方组织

192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时间革命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1927年5月,受蒋介石策动的反动军官、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与驻川东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杨森相互勾结,先后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后,驻宜昌的鲁涤平部也发动叛变。叛军和土豪劣绅在鄂西地区进行“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枝江各地农民协会纷纷举行集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组织各种形式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达数万人,示威群众高呼“打到新军阀蒋介石”“农工兵联合万岁”等口号。枝江县城、洋溪、江口、董市等集镇工会、商会在举行集会游行后,专门办了墙报,大街小巷张贴漫画,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反革命嘴脸。其中,在漫画“暴风雨中的蒋介石”中,蒋介石龟缩在一把破伞中,望着暴风骤雨瑟瑟发抖,以示蒋介石叛变革命不得人心。在风雨如磐的情势下,为了更有效地组织革命群众开展对反动派的斗争,枝江地区早期共产党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1927年5月1日,共产党员柴燮在枝江县城孔庙后殿发展码头工人薛开选、国民党枝江县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先孔、国民党枝江县党部委员兼工商部长肖宝苍等组建中共枝江县小组,柴燮任组长,隶属中共宜昌特支。随后成立了枝江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高殿寺支部委员会(为方便开展工作,对外称“国民党枝江县江北独立区分部”),隶属中共宜昌特支,有党员11人,杨平章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梅正芳(分管组织)、覃子芹(分管宣传)、谢官清(分管青年工作)、谢杰臣(分管经济)、杨先



炳(分管监察),党员有彭先茂、刘光元、张家保、覃子明和梅光明等。同一时期成立的中共党组织还有中共龚家闸支部(亦称中共菱角湖支部),阮瑞麟为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阮晏如(分管宣传)、戴守益(分管组织),共有党员8人,隶属中共江陵县特别支部。这些中共地方组织成立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领导得到加强。

5月11日前后,枝江县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被杨森叛军和土豪劣绅摧毁,罗光翟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受逮捕和杀害,中共枝江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枝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跌至低潮。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陈希实、周逸群、段德昌等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先后来到枝江安福寺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和恢复发展党组织工作。段德昌深入枝江玛瑙河沿岸实地了解斗争形势,指导党组织建设,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段德昌组织领导下,从1927年秋天开始,枝江安福寺及周边地区随着共产党组织的壮大发展,赤卫队、农会等其他群团组织也相继建立并得到发展。到次年春,陈家垸子、蔡家嘴、徐家嘴、杨家庙妇女协会相继建立,这些群众组织在安福寺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8年2月中旬,中共鄂西特委委员、中共公安县委书记段德昌,遵照特委指示,专程到安福寺一带指导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段德昌重新沟通了安福寺党组织与中共鄂西特委、宜都县委的联系,安福寺一带的党组织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经中共鄂西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枝江县临时委员会,委派中共宜都县委委员王天鸿



任书记。3月,陈希实在徐家花屋等地先后发展徐国炎、陈德兰、刘正万等40多人入党,建立了徐家花屋党支部。继徐家嘴(徐家花屋)之后,又先后建立了蔡家嘴、董家冲、找儿岭、车剷沟、杨家庙、陈家垸子等六个支部。1928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加剧,共产党的群团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5月份刚就任中共鄂西临时特委书记的周逸群从沙市赴宜昌途经安福寺时,同枝江临时县委书记王天鸿等专题研究了在安福寺发展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等问题。在鄂西特委和枝江县委、宜都县委的指导下,中共安福寺区委成立,区委下辖十多个党支部,有党员100余名。同时成立了以徐家花屋为中心的周边四个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陈德兰、徐国志、张天成和徐国炎,分别担任陈家院子、蔡家嘴、杨家庙和徐家嘴革命委员会主任。组建了安福寺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会员达到500余人。同时在青少年中发展共青团员40余人,建立了徐家嘴、陈家垸子、梅家冲三个团支部,团员为外来干部带路、送信,为党的会议担任放哨警卫。1928年9月,设在宜都县城的中共宜都县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县委主要领导人遇难,但安福寺共产党组织尚存。12月,中共鄂西特委在安福寺重组宜都县委,徐国炎任县委书记,安福寺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宜都和枝江、松滋一带的活动中心。

1929年5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地缘情势,决定将中共宜都县委、枝江临时县委、松滋特支合并组建松(滋)枝(江)宜(都)县委,县委机关设在安福寺,下辖4个区委、13个支部,统一领导松滋、枝江、宜都三县的革命斗争。1930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斗争形势发展和党组织建设的需要,撤消了松枝宜县委,建立宜都县委和中共枝江县特别支部,统一领导枝宜两县的党群工作,县委机关驻安福寺徐



家花屋,隶属于中共鄂西特委,开展革命工作。7月,党组织由于敌人的“清乡”,遭到严重的破坏。11月份,中共宜昌分特委为了整顿恢复松枝宜三县党的组织,决定重组松枝宜县委,机关驻徐家花屋,恢复以安福寺地区为中心的宜都、枝江、宜昌、当阳四县边界地区的党组织。通过寻找失散的同志,秘密恢复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武装斗争,开辟苏区。

1927年至1932年,在枝江革命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段德昌同志数次来到枝江,他以安福寺地区的徐家花屋为中心,发展党组织,沿着玛瑙河流域发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徐家花屋几度成为松滋、枝江、宜都革命的中心和指挥部所在地,发展、扩大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组织、发展枝江地方武装力量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9月初,中共鄂西区特别委员会成立,并组建了领导秋收暴动的指挥机关——鄂西革命委员会。中共鄂西特委认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特委和指挥部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全面分析了整个鄂西区的革命形势后,决定由条件较好的县首先暴动,并制订了《鄂西区暴动计划》,对各地武装暴动提出了指导原则。1928年6月16日,中共鄂西特委在松滋县老城附近芦洲子一艘小渔船上召开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三县武装暴动问题,决定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三县同



时进行暴动,夺取反动派枪支装备工农武装,胜利后向湘鄂边之鹤峰、桑植等县转移,与贺龙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因暴动计划遭泄密,松滋西斋保卫团到九岭岗搜捕革命人士,九岭岗起义被迫在6月18日提前举行,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而失败。6月16日,国民党枝江县“清乡”委员会指示枝江百里洲区治安保卫团包围了中共“鲍文清”支部所在地奎星寺小学,逮捕了部分共产党员,因“鲍文清”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成员分散隐蔽,枝江农民暴动未能如期举行,三县联合起义未能按计划实现。7月初,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大规模农民暴动,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化名“易窮”来到枝江安福寺等地区,深入到徐家嘴、蔡家嘴、陈家垸子等农户家中,与农民促膝谈心,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为了加强安福寺的革命领导力量、武装骨干,周逸群将当阳瓦仓暴动、松滋九岭岗暴动失败后转移出来的一批共产党员调到安福寺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发动工作,选派安福寺地区一部分共产党员前往湘鄂边参加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以加强根据地各片区的联系。7月下旬,段德昌率两名游击队员,携三支手枪、步枪从公安县来到安福寺。这期间,段德昌在安福寺先后两次创办军事学校,并从外地调来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和一定军事本领的同志当军事教官。白天,段德昌带领党员走家串户发动群众,晚上组织近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协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利用月夜分期分批在玛瑙河河滩上开展以队列、射击、搏斗、投弹等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培训农民武装骨干力量。夜间视线不好,段德昌就用油灯作为队员练习目标。为了检验训练水平,一天深夜,段德昌亲率数十名军训队员疾行30余公里,奔袭长江北岸的国民党罗家河水运



关税厘金局,缴获手枪一支、银元数百块,让队员受到一次实战训练。不久,段德昌再次率队袭击国民党安福寺团防,缴获部分枪支和银元。受到段德昌军事训练并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真枪实弹战斗的军训队员,成为安福寺农民运动骨干,他们带领广大贫苦农民在玛瑙河沿岸同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团防开展斗争。

1929年3月,县委根据段德昌的指示,决定暂停饥民斗争,总结经验,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据此,松枝宜联合县委在揭家老屋召开三县联合军事会议,会上选举了军事干部,成立了三县联合军事指挥部。不久,安福寺饥民斗争中的青壮年骨干,组建了一支120多人的赤卫队,由王天鸿和刘正万率领,先到江陵白鹭湖进行军事训练。1929年4月,安福寺赤卫队参加了鄂西游击总队(红六军前身)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沙岗苏区的战斗。后来赤卫队一部分加入鄂西游击总队,一部分返回安福寺成为以后武装暴动的骨干。

1930年6月,从公安县调来一部武装力量到枝江百里洲开展秘密游击活动。10月,为加强安福寺的武装力量,游击于枝江百里洲地区的武装力量全部开往安福寺。接着,中共宜昌分特委在安福寺成立枝宜游击队,枝宜游击队在以安福寺为中心的枝(江)松(滋)宜(都)当(阳)地区配合各地赤卫队开展游击活动。1931年3月,中共宜昌分特委为了在松枝宜地区创建苏区,汇集松滋、枝江、宜都三县的革命武装力量,组建了鄂西游击第二大队。鄂西游击第二大队以松、枝、宜三县为活动区域,在各地游击队、赤卫队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1930年至1931年间,枝宜游击队在鄂西游击二大队、草埠地方



红军支队及各地赤卫队的配合下,组织了一系列攻击反动民团的武装斗争,接连取得了一些胜利,打击了安福寺、顾家店、鸦鹊岭、横店子、黑土坡、草埠湖等地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团防头目和欺压民众的土豪劣绅,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运送到洪湖根据地。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让安福寺一带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惶惶不安,有的逃到县城或宜昌等地,有的躲进团防据点,团防也不敢像往常那样下乡“清乡”和骚扰了。几年武装斗争的发展,形成了“以安福寺为中心,在玛瑙河两岸开拓了四、五十里的赤区”。1931年6月,成立了以徐家花屋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划分了区乡行政区域,雕刻了大印,玛瑙河两岸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当1932年秋季整个洪湖根据地撤退时,枝(江)宜(都)地区在敌五县联防和敌正规军配合围攻下,安福寺地区的武装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组织、领导饥民暴动

1927年至1928年,枝江、宜都等地连续两年大旱,粮食歉收,可地主的租课照收不误,广大农民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1928年12月,中共鄂西特委决定在枝江、宜都、松滋等县发动饥民开展反饥饿斗争。段德昌受鄂西特委派遣再次来到安福寺,领导枝江、宜都两县开展反饥饿斗争。他在安福寺徐家嘴召开的两县反饥饿斗争动员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解读了与洪湖、白鹭湖游击战相呼应的计划,阐明了开展反饥饿斗争的意义。他说:“没有种田汉,大户人家的粮食哪里来?穷人受剥削,没有饭吃,要从大户手中夺回来!”他要求首先把大户人家的存粮摸清楚,每个党团员、农协会员、妇协会员至少要串连发动五至六个农友参加饥民斗争,串连的人越多越



好。这次动员会后,段德昌又对反饥饿斗争作了精心部署,饥民斗争由中共宜都县委、枝江临时县委秘密指挥,同时成立饥民斗争委员会,由蔡家嘴农协会员刘正万任主任,公开组织饥民“吃大户”,形成秘密与公开的两套指挥系统,以避免暴露党组织。饥民斗争委员会主任刘正万没有文化,管不好分粮账目,段德昌特地安排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程度的共产党员汪先勤担任助手。根据段德昌的要求,两县县委又分别秘密召开了几次小型的饥民斗争动员会,组织饥民斗争的骨干学习“保守秘密,严守纪律”等12条斗争方法和纪律规定,布置串连饥民的任务,统计豪绅大户存粮情况。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党员、团员、农协会员、妇协会员立即亲串亲、友串友,很快行动起来。穷人家家家户户等米下锅,一听“吃大户”,都踊跃响应,先后发起了多起饥民暴动。

规模较大的暴动主要发生在1929年2月和6月。

1929年2月,经过中共枝江临时县委、宜都县委的组织发动,在安福寺及相邻的枝江、宜昌、当阳边界地区组织了四支饥民队伍,分别在玛瑙河两岸的徐家嘴和郭家畈、蔡家嘴和横溪河、陈家垸子和梅家冲、五家畈和杜家坡四块区域“吃大户”。确定“吃大户”的对象是年收入课租50石以上的地主。每支饥民队伍均有秘密和公开的领头人,由共青团员担任与指挥组织的通讯联络任务。2月25日,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在党组织和农协会的发动下,四支饥民队伍分别集合出动,每支饥民队伍1000多人,在负责人带领下向土豪院子进军。行进途中,饥民互相呼叫邀约,人数越来越多,男女老少挑着锅碗瓢勺、破衣烂被,像一股洪流涌向土豪大院。到了土豪家,饥民们有的开仓分谷,推碓整米;有的砌灶安锅,烧火煮饭;有的在土豪屋檐下垫

草开铺,吃住几天。吃住几天后又涌向另一土豪家。为了避免饥民在斗争中受乡土人情的制约和以后遭到土豪劣绅的报复,各个片区的饥民队伍一般都不在本地“吃大户”,采取跨区域到外地“吃大户”的斗争方式。在“吃大户”的过程中,反动地方武装对饥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饥民们没有被其吓倒,他们团结一心围攻团防武装,男的缴团丁的枪,妇女脱下裹脚布捆住团丁。这一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广大饥民,参加饥民斗争的人数越来越多,区域也不断扩大。

1929年6月,松枝宜县委在安福寺揭家屋场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饥民暴动的经验,决定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饥民暴动。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掰收地主田里的包谷,用大刀、梭镖武装掰包谷的群众,遇到土豪反抗和反动武装的阻拦就进行坚决斗争。会议明确提出:由掰包谷转入武装暴动,夺取团防枪支,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成立了由李盛文为总指挥的松枝宜三县联合军事指挥部,暴动区域以安福寺地区为中心。6月21日,暴动开始,共产党员孟德华率领的徐家嘴饥民队伍首先出动,年轻力壮的赤卫队员手持大刀、梭镖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几百名挎着竹篮、背着背篓的群众。他们边走边喊,沿途邀约,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千人,分散到地主田地里掰包谷。随后,鸦鹊岭、蔡家嘴、陈家垸子、梅家冲等几支饥民队伍相继出动,仅几天时间,参加暴动的群众就达到了5000余人,收获了大量的地主田里的包谷,同时处决了一些阻拦暴动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团丁。这次饥民暴动的声势使国民党枝宜地方当局大为震惊,紧急调集张发奎第四师、宜都县警备队和安福寺、宜昌鸦鹊岭、太和场等地保安团对饥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他们在玛瑙河沿岸逮捕数百饥民,并烧毁了参加暴动的党团员和斗争骨干的住宅,仅徐家嘴一



处,一次就烧毁了30多户,杀害党团员20多人。敌人的血腥镇压并没有摧毁安福寺地区的革命基础,反而更加激发了农民群众对团防和豪绅的仇恨。共产党员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一部分党员转移到外地,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隐蔽下来继续开展斗争。

在中共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在段德昌直接指导下,以安福寺为中心的饥民暴动,是中共松枝宜县委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把发动民众与农民切身利益相结合,把经济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典型形式,农民得到广泛的发动,斗争取得鼓舞人心的成果。饥民暴动虽然遭到反动武装的残酷镇压,但为松枝宜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具体经验,为以徐家花屋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安福寺苏区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播撒革命火种的陈德华

陈德华(1898年—1968年),号希实,安福寺陈家垵子人,安福寺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家有耕地数亩,父亲陈筱香兼营稻米买卖。他年幼读私塾,后到宜都高等小学就读,学校校长李丹青经常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介绍列强欺凌、国家落后、政治腐败、人民困苦的现实惨状,在陈德华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陈德华小学毕业后,回家乡教私塾两年。1916年秋,陈德华考入武昌文华中学,1919年毕业后考入汉阳兵工专科学校学习机械。在汉期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陈德华深受革命思潮影响。1920年秋,陈德华去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准备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正当他准备赴法之际,家中突遇变故,无法供给旅费,加之要回家处理讼事,只好被迫放弃留学而返乡。1922年至1926年夏,陈德华先后在杨家庙、郭家畈等地教私塾。他曾走出过封闭的丘陵山洼,见多识广,又很健谈,经常在亲朋好友、乡邻及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道理,深受大家的敬佩和爱戴。

1926年秋,陈德华再赴武汉。此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革命中心由广州北移,武汉革命运动蓬勃高涨,他深受影响,决心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3月初,他报名参加农讲所学习,他的思想基础好、文



化程度较高,积极上进,受到学校器重,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与周逸群、段德昌关系密切,三人合影留念。周逸群、段德昌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友谊,为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洪湖苏区枝江游击区奠定了基础。他学习尚未结业,就参加革命政府组织的学生军随军队到鄂北平定反动叛乱。回来后,即被党组织以农运特派员身份派往京山县开展农民运动,兼任京山县农民协会主任。不久,因驻扎京山的夏斗寅部叛变,镇压共产党人,陈德华冲破敌人的围捕返回武汉。1927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省农民协会决定由他任省委通信员兼省农协派驻枝江、松滋、宜都三县特派员,到松枝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恢复了因“五·八”惨案而遭破坏的宜都县农民协会,任农协主任,以宜都县农民协会的名义发布革命布告。1927年8月,湖北省农运特派员、宜都县农协主任委员陈德华受中共宜都县委的派遣,以中共宜都县委通讯员的身份到家乡安福寺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徐家花屋、陈家垸子等地,组织农村革命斗争队伍,在九龙观、灵芝山、云台山、杨家庙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他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徐家嘴、陈家垸子、蔡家嘴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小组,先后建立了中共徐家嘴、陈家垸子两个支部,有党员28名。他兼任陈家垸子支部书记,先后发展徐继先、徐国炎等人入党。同时也建立了农民协会(反动团防蔑称为“猫子会”)、共青团、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公开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他领导的革命行动声势日益壮大,引起国民党安福寺团防的注意。团防派人到陈家垸子捉拿陈希实,危急中,他翻墙脱险。9月初,他找到党组织,得知“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并听罗亦龙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底,他受命再次返回家乡发展中共党组织,完成中共湖北省委交给他的秋收暴动计划。他利用亲友、同学、乡邻等关系,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恢复和建立陈家垸子、蔡家嘴、郭家畈、杨家庙等地的党支部,打出苏维埃政府的旗号,利用教农民红色民歌、民谣等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春节,他用给农户写对联的民俗来鼓舞民众,鞭挞敌人。他在原枝江、宜都、当阳三县交界处的三界场附近的九龙观题写:“笑真军阀戴假面具,看小百姓登大舞台”;在土地庙前题写:“土豪胜似土匪,地主刮尽地皮”;在群众门前写到:“受压迫由退让起,得平等从奋斗来”,横批“工农团结”。

陈德华在安福寺一带广泛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活动,引起当地反动土豪劣绅的仇恨和恐慌,他们纷纷向反动派告密。1928年春节刚过,“安福寺保卫团”就到安福寺一带抓捕陈德华。在当地共产党员、农协会会员及进步农民的帮助下,陈德华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抓捕。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枝江、宜都地区施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第43军大肆镇压革命人民。中共湘鄂边特委周逸群来安福寺指导工作,在杨家庙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布置后段工作,动员有名声的骨干党员转移。由于陈德华在该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影响较大,为保存革命力量,陈德华根据中共湘鄂边特委指示,将当地工作交给徐国炎代理,从董市乘船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德华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浙江分会理事、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理事、浙江省佛教协会主任,还先后当选为浙江省、杭州市、武康县三级人民代表。

(黄道华)



抗日民族英雄张缙

张缙(1917年—1944年),枝江市安福寺镇唐家楼人。少年时期在宜昌读书时,张缙就立下革命志向。

1938年春,国民政府在各区、乡组办社训队,抽调青年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张缙被宜都县第三区指派为社训队分队长。是年秋,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活动在枝江、宜都、当阳三县交界处三界场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翮利用组建社训队的机遇,动员叔父张文成(张缙之父)出面,向地方政府建议将安福寺偏东北地区几个保甲的壮丁就近集中,在张家祠堂训练。宜都县第三区(今枝江市安福寺镇)区长杨涛(进步青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这一建议,并向上申请获得批准。于是,“宜都社训队江北支队”在瑶华场张家祠堂组办,张文成挂名支队长,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书记张鉴铨实际负责,并通过组织关系先后从外地调来一批共产党员任政治、军事教官,张翮安排张纪、张楚、张缙(三人入队后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等当地进步青年加入社训队并充当骨干,其中张缙任分队长。是年冬,宜都县第三区(今枝江市安福寺镇)社训队改办民众自卫队,杨涛(中共地下党员)任大队长,张缙任大队直辖分队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区民众自卫队即筹集各种枪支500多支,在玛瑙河与横溪河交汇处附近开展武装训练。区署订阅《新华日报》作为政治教材,以提高队员文化思想素质,了解全

国抗日斗争形势与任务。

1939年秋,自卫大队因涉嫌赤化被宜都县国民政府借故强令解散,张缙由此失去中共党组织关系。1940年春,他到中央军校湖南武岗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恩施驻军中工作。

1940年6月,日军侵入枝江。枝江地区出现一些打着“抗日游击队”招牌的匪众,这些匪众与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横行乡里,加之汉奸为虎作伥,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1943年秋,张缙潜回家乡探亲,目睹日寇罪行与百姓受难,极其愤慨,决心留下来抗日救亡。张缙到宜昌分乡国民党驻军中弄来10多支枪,与当地小股武装联合抗日。1944年1月,活动于当枝宜地区的汉流大哥、游击队头目刘筱岳为张缙提供了30多条步枪和两挺机枪,并委任其为特务中队长。1944年3月,张缙通过同学曾筑珊(宜都战地工作团团长)与宜都县政府取得联系,县长陈中荣派军事科长陈坚率部带长短枪约60支、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一支,渡江与张缙会合,组建宜都江北游击大队,陈坚任大队长,张缙任副大队长。本地百姓仍然习惯称作“张部”。张部(江北游击大队)约有两百余人,为枝江、宜都长江北岸主要的抗日武装之一。1944年8月下旬,江南国民党江防某部又派连长朱自锋率部渡江协助张部联合行动,听从张缙统一指挥,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增强。

由于这支江北抗日武装组成人员身份复杂,张缙在组建之初,即约法三章以严明军纪。他告诫每一位队员,队伍以抗日救国保护家乡为宗旨,除向地方筹集必要的生活给养外,坚决不允许部队像土匪那样骚扰百姓,对违反军纪军令者严惩不贷。如对强奸农民之妻的中队长邓某、班长曾某,抢夺农民财物的某中队事务长等坚决执行枪决。张缙强调队伍出发前,一定要给房东上好门板,做好清洁,不留痕迹,



这样做既能防止因走漏消息而被日寇借此加害百姓，又密切了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

枝江长江以北地区在沦陷期间，土匪武装活动猖獗，有的甚至与日寇勾结，常神出鬼没地到处祸害百姓，剿匪成了张缙游击队保护乡里的大事。张缙有个族侄张世孝，在胡美山部为匪，经常到横溪河一带危害百姓。1944年4月初，张世孝和李某又来作乱，张缙在瑶华场附近的广仁桥设伏将二人抓捕并执行枪决，老百姓拍手称快，称赞“为我们除了大害”。接着，张缙率部对盘踞在枝江江北一带的施昌直、汪国良、李伯阶、苏奉先、胡美山等多股匪众进行清剿，从此，土匪汉奸再也不敢涉足太和场、横溪河、瑶华场以及董市泰洲、老周场横店子一带。

张缙部队在其活动区域内威震众匪，驻扎在紫荆岭和鸦鹊岭两个军事据点的日寇，分别派人来诱降张部，企图将张缙部队收编为伪保安队，遭到张缙严词拒绝。

1944年8月下旬，张缙率部先后攻入安福寺、横店子等日军据点，夺取日寇搜刮来的军粮，除留一小部分作部队给养外，其余大部分分给当地群众。张部连续攻入多个日寇据点，且全胜而归，令日寇十分恼怒和惊慌。日寇派遣汉奸杨华英（张缙继母的前夫之子）到张部根据地横溪河一带刺探军情，张缙得到群众密报后，将其捕获并处决。

1944年11月24日（农历十月九日）深夜，紫荆岭和鸦鹊岭两大日寇据点及其下属各据点的日军，开始合围张部。此时江南国民党江防某部所派连长朱自锋已率部南渡归队，张缙和陈坚又分驻两地，张缙只带了少数战士驻太和场东侧乡下。25日凌晨，张缙发现附近出现多股日军，便带队向新周场转移，准备到那里会合他派驻在该地活动的



一个中队。中午，在鄢家坊（今枝江市董市镇黄金村）与日寇遭遇，被几路日寇包围。张缙抵抗一阵之后，即率部突围。战斗中，张缙接受受伤机枪手的机枪冲锋，不幸右膝盖被击中，不能站立。他拒绝战士背负，命令战士“快冲，不要管我！”英勇地抱着机枪向敌扫射，掩护众战友突围。不久，张缙身边只剩下一名中队长谭英，多路日军仍不断逼近缩小包围圈。午时后，日军从四面八方涌了上来，张缙对中队长谭英大声命令说：“谭英，要有骨气！不做俘虏！”说完用手枪自抵心窝，连发两枪，谭英亦举枪自戕，二人壮烈殉国。张缙牺牲时年仅27岁。

（黄道华）



满门英烈陈德兰

陈德兰(1883年—1932年),安福寺陈家垵子人,安福寺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有一子四女,靠种自耕田数亩以求生计,后因负债被迫出卖祖传自耕田。1927年,搬到梅家冲(今仙女镇青狮村)种佃田养家糊口。他为人坦率耿直,喜爱武术。

1924年至1928年,枝江、宜都一带连年发生干旱,饥荒严重。1927年秋,陈德兰的堂弟陈希实(陈德华)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乡,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在陈希实的影响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农民革命斗争。1928年初,经陈希实、徐国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月至3月,担任中共陈家垵子党支部书记。他以陈家垵子为中心,组织、发动“经济日食斗争”,领导饥民向地主主要粮吃,俗称“吃大户运动”。4月间,当他领导2000多农民在伍家畈吃大户时,遭到国民党安福寺团防的镇压,不幸被捕,关押于宜都县城。后来他越狱逃回,继续领导农民斗争。

12月初,中共鄂西特委决定在枝江、宜都、松滋等县发动饥民开展反饥饿斗争。段德昌受鄂西特委派遣再次来到安福寺,领导枝江、宜都两县开展反饥饿斗争,陈德兰参与具体部署指挥。12月底,发动“年关暴动”,开展第二次饥民斗争,达到预期目的。他继续参与组织反饥饿斗争,参加了1929年3月20日发动的第三次饥民“吃大户运动”和6



月21日发动的“红五月斗争”第四次饥民“吃大户运动”。据1929年5月16日周逸群《鄂西政治经济形势、群众斗争、军事问题》记载：“发动时仅有群众100余人，以后每天逐渐增加，参加的群众达3万左右，纵横蔓延五六十里，两县豪绅地主大起恐慌。”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反饥饿斗争被迫停止。

1929年4月，根据中共鄂西特委的指示，安福寺地区的农民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入军事斗争，党组织挑选在经济斗争中涌现的农民骨干组建安福寺农民赤卫队，陈德兰被委任为赤卫队队长。在王天鸿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剧对陈德兰的迫害和捕捉。1929年大年三十夜晚，驻横店子的枝江保安队到陈家捉人，此时恰逢德兰不在家中。保安队抓人不着，便放火烧毁他的房子。后来他在毛家冲搭窝棚暂住，又被敌人发觉烧毁，他的住房先后被烧毁5次。面对敌人的疯狂迫害和追捕，他革命意志愈加坚定，不仅自己献身革命斗争，还教育子女加入革命事业，他有一子四女，儿子陈祖正和三个女儿都参加革命斗争。大女儿和二女儿成了妇女协会骨干，三女儿担任了共青团梅家冲支部负责人。1930年11月，中共分特委书记张忠理率鄂西特委及所属各县代表约30人，在陈德兰家召开党代会，作出开展游击战争、支援苏区、调整组织的重要决定，会上陈德兰当选为中共松(滋)、枝(江)、宜(都)联县第二届县委委员。

1932年2月，枝江、宜都、松滋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在陈德兰家中召开，会议对松枝宜三县当前革命斗争进行了研究与部署，陈德兰根据部署在安福寺一带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各地反动派纷纷成立清乡委员会，对革命势力进行清剿。陈德兰担任陈家垸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



领导发动安福寺约800名农民配合鄂西游击二大队,攻打横店子、安福寺和鸦鹊岭团防据点的战斗,处决了大土豪陈海涛。1932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此“清乡”的何家老屋地区编练队队长张金斋率人前往陈家垵子、菜籽坪一带搜捕。陈德兰因病缠身未能远避,只好隐藏在菜籽坪附近稻田里。由于叛徒陈德伦的出卖,他不幸被捕。张金斋害怕他会武术,挣脱逃走,残酷地用木棒打断他的双臂,随即押往安福寺保安队。在被敌关押期间,他不畏反动派的压扛、香烧等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在牢房中,他见到被抓来的四个女儿和妻子,在生死离别的关头,他不为儿女私情所动摇,鼓励妻女“要坚强,要有骨气”;三女儿彻夜高唱革命歌谣,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使在押同志及看守人员无不为之感动。第二天,陈德兰和他的大女儿、三女儿被敌人惨杀于安福寺玛瑙河畔,鲜血染红了玛瑙河水。在押赴刑场的途中,陈德兰父女三人一路昂首高唱革命歌曲,其视死忽如归的革命精神,鼓舞玛瑙河沿岸人民继续革命。

(黄道华)



先兵同志的一生

我的丈夫李先兵,原名李承志,湖北省枝江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多次参加和领导荆沙一带的学生运动,入党后,在襄西、襄南一带从事革命工作和武装斗争。1949年7月枝江县解放,李先兵为中共枝江县委第一任书记兼县军事指挥部政治委员,后调中共宜昌地委工作。1952年10月调北京,先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组组长、文化部民族文化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病逝。

出身贫苦求学艰辛

1910年农历4月,李先兵出生于湖北省枝江县百里洲同意村。父亲李克勤、母亲李胡氏都是农民。家有兄弟姐妹八人,先兵排行老四。家有耕地十亩,主要种植棉、麦、西瓜等作物。父亲日日辛勤耕耘,母亲夜夜纺纱织布,全家人才得以勉强度日。先兵从父母身上,继承了劳动人民坚忍不拔、勤劳刻苦的品质,从小就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在田间劳作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从十五岁开始,先兵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念私塾。四年之后,因生活困难,父亲让他停学回家学裁缝,以补家用。但私塾先生李子修认为他聪明好学,颇有才华,将来必有大用,建议让他继续念书。于是,



他又在私塾读了两年。

这时,先兵已不满足于私塾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渴望多学一些新知识、新思想,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于是,在1929年,他瞒着家里考入江口小学上五年级。一年后,又瞒着家人考取荆州第八中学。当喜报送到家里时,因无钱支付报子,家里人反而大哭了一场。不得已,父亲把田里青苗作抵押,向沙市西瓜行预借了一百元,供先兵继续念书。为了求学,先兵省吃俭用。学校规定每月4元伙食费,他只能交2元,不得不在厨房里吃点冷饭、咸菜,有时一瓶辣酱也要吃上半个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先兵勉强读完了初中,他成绩优秀,甚得同学的钦慕和老师的赞许。

1932年,先兵初中毕业后,再也无钱升入高中了,经人介绍到江口初级小学担任了训教指导。同学们认为他不升学实在可惜,于是派人到江口小学告诉他,大家愿意凑钱给他交学费。同学们的情意感动了江口小学校长谈畅先,谈校长提前付给一部分教学薪金,先兵这才得以回江陵中学就读高中。

从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时的李先兵,目睹广大农民在地主的苛重盘剥下过着悲惨生活,看到日寇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忧国忧民之心日益强烈。在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下,他迅速成长为一个进步的爱国青年。在江陵中学读书时,他主编的《拂晓文艺》积极宣传进步思想,鼓吹社会改革,唤起民众抗日。后来,这个刊物成为《新沙市时报》的文艺副刊,在荆州、沙市一带学生中很有影响。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空前的爱国学生运动立即在荆州、沙市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荆、沙学生随即组织“荆沙学生联合会”,先兵被选为学联合会主席。学联合会决定举行游行,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对此,混入学生队伍的特务分子怕得要命,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对学联合会主席李先兵,更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是,先兵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然亲自率领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同学们团结抗日,挽救危亡,在学生界震动很大。

1936年1月,江陵中学学生又在学生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亲日派头子杨永泰任湖北省主席的罢课斗争。一些特务从武汉专程跑到沙市对付这次学潮,特务头子彭凤昭指着李先兵叫道:“你带头罢课,就得带头复课,否则对你不客气。”同学们为先兵的安全担心,问他还罢不罢课,先兵毫不犹豫地说:“罢!”一声令下,大批学生将课桌课椅塞满楼道,谁也不能进去上课。在全省人民和广大学生的抗议下,“拒杨”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经过“一二九”运动和罢课斗争的锻炼,先兵更加成熟,影响也更大了。右派分子对他又恨又怕,于是,常以各种借口对他进行排挤和打击。1936年3月,校方终以“破坏教学”为由,将他开除。

离开江陵中学后,先兵又先后在上海正风中学、武汉育杰中学读书。在育杰中学,他认识了同乡吴先琳、周绍汉等进步同学。吴、周都是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成员,先兵和他们一起,继续参加救亡运动。他们组织歌咏队,从武昌沿长江到黄石,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就在这一年,先兵也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底,先兵从育杰中学高中毕业。“民先”介绍他和吴先琳到



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当时,山西“民大”集中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授,向学生讲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授抗日理论,组织学生参加临汾附近八路军炮兵团的成立大会,参观列宁室。在这里,先兵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政治教育。1938年5月,先兵在“民大”结业,与吴先琳一起回到家乡。

回家乡不久,先兵又来到董市小学任教。国民党枝江县党部书记长王南屏说他是从西北回来的共产党,指示手下对他严加监视。但是,先兵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宣传抗日,还组织了轰动一时的“驱郑”运动。当时,百里洲区区长郑斗南横行乡里,敲诈百姓,企图阻止抗日运动的发展。先兵回乡后,发动了从省里、荆州、宜昌等地回来的学生一百多人,乘木船从刘巷到县政府礼堂,坐堂请愿,要求撤换郑斗南,最后迫使郑斗南下台。

早在吴先琳和先兵从山西回湖北的路上,吴就问过先兵对共产党的认识,当时,吴先琳已经是中共党员。先兵对共产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表示愿意加入党的组织。1938年夏的一天,吴先琳约先兵到县城郊外,拿出一本带有列宁画像的书放在树枝上,先兵举起右手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生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李先兵由吴先琳介绍入党后不久,同学周绍汉(中共党员)也从延安抗大毕业回到董市。这时,江口、董市一带党的工作由吴先琳领导。不久,中心县委又派刘明望来主持这一带工作。当时,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发展党员,动员群众,利用社会关系组织革命武装。



根据党的指示,先兵发展了邹开锋、董家兰等进步青年入党,又在刘巷、江口、董市和县城,设立了四个宣传点,每个点组织了四五个青年学生负责开展宣传。先兵是刘巷点的负责人,他们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学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通过各种形式唤起民众,投身抗日。

他们一边宣传群众,一边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动员青年农民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开展游击战。为争取国民党区乡武装,周绍汉、邹开锋还打入乡自卫队,担任了乡队副。

1939年上半年,先兵的公开身份是董市小学教导主任。这年6月,董市小学校长张慎先去世,国民党特务分子乘机在校内安插亲信,排挤共产党人。他们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董市、江口小学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李先兵是共产党首要分子。县政府还通令全县对李先兵停止录用,并将其赶出枝江县境。在敌人的迫害下,先兵只好暂离枝江去重庆,在中华大学读书。

在重庆,先兵遇到了宜昌县委负责人王致中。1939年冬,王致中找李先兵、周绍汉谈话,要求他们还是回湖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这样,未等学期结束,先兵、绍汉又返回枝江。

1940年夏,日寇侵占沙宜。先兵、绍汉决定拉起武装过江打击日寇。但是,当时长江北岸被日寇封锁,南岸被国民党封锁,渡江困难。一天深夜,绍汉找到一只运棉花的木船,偷渡过江。行前,他和先兵约定,待找到组织,打通关系后,再同往江北抗日。周、李二人在长江江畔洒泪告别,不想这一别竟成永诀,周绍汉过江不久,因汉奸告密,被日寇抓捕。1940年8月,在宝筏寺惨遭日寇杀害。

敌人的残暴,不仅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反而激起他们对日寇的更



大仇恨。1940年底,在邹开锋的帮助下,先兵渡过江北,经地下党员王明鼎和党的地下交通人员的帮助和护送,辗转来到钟祥县石牌地区,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襄西独立团,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南征北战出生入死

李先兵到襄西独立团后,先任独立团团团长曹玉清的秘书,后调任团政治处宣传科副科长。1942年调十四旅政治部任宣传科长。

1943年3月,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奉命率队挺进襄南敌后,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5月,日伪暂编第六师师长金亦吾所部第三旅第七团团长李正乾在我方人员策动下,毅然率部投奔我军,反正抗日。6月,该部被改编为军分区第一纵队,李正乾为司令员,徐达三为政治委员,李先兵为政治部主任。开始,徐达三尚未到任,部队成分又极其复杂。一些人过不惯艰苦生活,不愿受共产党严格的纪律约束,甚至对先兵采取敌视态度。在这艰险之际,先兵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作李部的教育改造工作,晓以抗日大义,动以民族感情。终于使李正乾及其所属官兵受到感动。从而,这支八百余人枪的部队得以顺利地改编和整训。以后,又经徐达三、李先兵等人的大量工作,加上李正乾本人坚决革命,积极配合,这支旧军队不仅成为一支政治上可靠的人民军队,而且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贡献。

1943年秋,李先兵调往第三军分区直属教导大队任大队政委。1944年春,襄南地委决定先兵任路南县委书记,率襄南三团(原属襄河纵队)和三十三团进驻殷家巷、双冢祠、凤台、草埠、问安一带,控制土匪郑家良放弃的地区,配合荆当县委开展对赵益之、施昌直等土顽的



统战工作。后来,边区党代表郑位三同志提出收缩方针,先兵又奉命撤出路南,回到教导大队。1945年初,军分区为适应形势发展,将教导大队扩充为教导团,除原设的班、排、连级干部队外,又增加了地方干部队,先兵任教导团副政委。他同副团长张广图一起,精心制订教学计划,强化军事训练,呕心沥血办教育。教导团从开始到撤销,共办学七期,为我军培养和轮训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和地方干部。

1946年6月,我中原解放军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重重封锁包围下,采取分路突围的办法,实行战略转移。此刻,先兵已调到中原军区干部大队。突围前,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到干部大队传达中央精神和中原局的决定:干部大队的同志部分随队突围,部分化装转移。先兵坚决要求留在干部大队,跟着王树声所率第一纵队,冒着敌人飞机、坦克的猛烈炮火,在王家店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转移到鄂西北。之后,先兵调十五旅,随部队在武当山一带活动,旋奉命转移到陕南第五军分区,创建秦岭中部根据地。

1947年2月,先兵奉命到山西晋城,在中原局党校任教育科长,是年6月党校工作结束,调十二纵队三十八团任政治处主任。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8月,刘邓大军横越陇海铁路疾速南下,挺进大别山。十二纵队作为第二批南下部队,在开封与郑州之间渡过黄河,于12月初在黄安县与中原独立旅会合,组成江汉军区。1947年底先兵随部队重返襄西支队,做开辟根据地工作。

1948年1月,襄西支队在荆门城北盐池庙地区控制了盐池、仙居、刘侯三个乡公所,击溃了荆门来援的一个县中队,从而控制了荆门以北百余里地区,成立了荆(门)钟(祥)工委,先兵任荆钟工委书记。



1948年秋,又成立了荆钟宜县委,先兵任县委副书记兼两个指挥部的政委。不久,上级派蒋占义任荆钟宜县委书记,调先兵开辟江、枝、宜地区,任江枝宜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兼荆当县委副书记。

此时,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连续取得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他们妄图依靠长江天堑保住南岸地盘,故拼命强化对长江一线的统治,对先兵他们来说,这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是,先兵和同志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不屈不挠地斗争。1948年冬,县委城工部长朱玉衡带领一个排首先到殷家巷、穿心店、双冢祠一带活动,建立了江枝宜县第一区;接着,县委又在沮漳河沿岸的风台、草埠一带建立第二区;在半月山一带建立第三区;以新场地区为主建立第四区。在此期间,国民党枝江县自卫总队中队长谈功颖也率部起义。后来,因敌人继续在长江沿岸加派重兵,情况日趋恶化,我军奉命有计划地撤向汉宜路北。在安福寺一带活动时,先兵他们又同隐蔽在这里教书的邹开锋接上了关系,并通过徐国炎、张瑶、邹开锋等人的工作,争取了安福寺自卫连连长梅斗南、副连长杨佩三等几十人枪起义。至此,江枝宜地区基本上被我军所控制,为大军渡江奠定了基础。

1949年5月,江枝宜分开建县,枝江单独设立县委,先兵任县委书记。7月17日,人民解放军四野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从白洋南渡长江,解放枝江县城。7月18日,国民党枝江县副县长严西陵从百里洲到达江口,向军管会缴械投降,枝江全境解放。

为民族文化事业倾注心血

1951年,李先兵调任宜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宜昌日报》社社



长。1952年调北京,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宣传组组长、文化教育组组长。1959年任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副馆长。1960年任文化部民族文化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从进北京开始,先兵就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投入到民族文化事业之中,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期间,先兵的主要工作是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检查、指导各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还很落后。为帮助少数民族确认和改进民族文字,国家组织了七百多人参加的七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决心用两年时间对全国十六个省、自治区的三十三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一次科学普查,先兵一到民委就参加了这项调查工作。在实践中,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普查结束时,不仅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而且,从一个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门外汉变成这方面工作的行家。

1958年7月,先兵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考察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时期,云南这个多民族省份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砸锅炼铁,大办食堂,大放“卫星”。“左”的政策引起一些边民离乡外逃。先兵在写给云南省委《关于西双版纳地区的考察报告》中严肃指出,我们执行民族政策失当,是边民外逃的原因之一。对此,某些人十分恼火,指责先兵思想“右倾”,并要他作深刻检查。但是先兵坚持自己的观点,认定自己反映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

1959年,民族文化宫落成,先兵调到民族文化宫任博物馆副馆长。在这里,他参加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举办的《十年来民族工作展览》的全部筹备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领导,1960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文化部共同领导成立了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先兵任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在担任副主任的几年时间里,他几乎跑遍全国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竭尽心力。1963年,他作为中央慰问团的成员,赴西藏慰问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作战部队。1964年,又赴新疆考察,途中,飞机轮胎爆炸,险遭不测。在我国的内蒙古、延边、广西、甘肃等边远地区,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足迹。每次少数民族艺术团体进京演出时,先兵总是带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日夜工作,确保演出的成功。1962年2月,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藏族表演班的首批学员结业,来北京演出大型历史剧《文成公主》。同年11月,内蒙古歌舞团进京演出歌舞。这两次活动,从演出前的准备到演出后国家领导人接见,从召开记者招待会到组织专家学者座谈,他都亲自安排,有条不紊。

1964年,文化部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召开了“少数民族群众艺术工作座谈会”。全国十八个省、自治区的五十三个少数民族的七百多名代表进京汇演,一共演出了一百多个音乐、舞蹈、曲艺和戏剧节目。郭沫若、陆定一、沈雁冰等出席了开幕式,周恩来、乌兰夫等出席了闭幕式。12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先兵是这次大规模文艺汇演的组织人之一,他与这次汇演组织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安排了这次大规模演出的全部行政事务,组织并参加了全部节目的审查工作。这次文艺汇演,对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加强民族地区群众业余文化工作,交流和总结民族文化工作的经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汇演之后,我国民族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兵被文化部的造反派打成“坚持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干将”,被专政、迫害达两年之久。1968年,又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四年,还屡遭批判、斗争,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先兵欢欣鼓舞,和几位老战友一起饮酒作诗,欢庆第二次解放。

早在1974年12月,先兵在体检时发现已患癌症。1978年文化部恢复民族文化司,请他去给工作人员介绍民族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文革”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情况时,他拖着病体,欣然前往,如数家珍般地讲了整整一天。1980年1月,先兵病重住院,我和孩子们日夜守护在他身边。在病床上,他对我说:“那么多战友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比起他们,我多活了这么多年。”他鼓励五个子女好好读书,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1980年2月25日,李先兵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岁。

(李宗毓)



枝江第一位共产党员——罗光翟

罗光翟(1903年—1928年),又名耀煌、含章,枝江市顾家店镇罗家河村人。6岁入初级小学,3年初小毕业后,先后入高等小学、中学就读。在尚实中学毕业后,即赴上海考入大同大学,专修数理。1925年,罗光翟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枝江第一位共产党员。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罗光翟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在斗争中不断成长。1926年秋,罗光翟奉命返乡进行革命活动。10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他毅然投笔从戎,去湖南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部,不久,潜回故里,携妻子陈氏、子女迁居宜都县城,与胡敌、江崇本等共产党员一起秘密发动工农群众迎接北伐军西征。他遵照党的指示,参与发展国民党员,秘密筹建国民党宜都县党部。11月,北伐军进占宜都县城,周立廷部不战而逃,县知事朱兆垣亦随军逃走,宜都即为革命军所控制。在中共宜都县支部书记胡敌的领导下,他一面组织各界群众慰问北伐军,一面从事工人运动,并担任县工人纠察队队长。

1927年2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宜都县党部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城关区党部常务委员。宜都县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创办了党务干部训练班,他担任军事教官。他严于身教,组织160名男女学员习刀练枪,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为培育一支武装力量呕心沥血。3月,在中共鄂西特派员曹壮父的指导下,

建立了以罗克强为书记的中共宜都县委员会,他当选为县委委员。正当革命进入高潮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川军阀杨森所部也伺机东窜,当地土豪劣绅亦蠢蠢欲动,暗地收买流氓地痞,准备向革命势力反扑,消息传来,宜都人民同仇敌忾。县委鉴于时局骤变,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他根据县委会议决定,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干训所学员军组织起来,准备配合宜都驻军迎击来犯之敌。5月1日,宜都军民在县城举行万人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愤怒声讨蒋介石,号召广大军民团结起来保卫革命。会后,他组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5月8日,夏斗寅秘密指使他手下的宜都驻军(一个连),与反动豪绅勾结起来,纠集流氓地痞包围了国民党宜都县党部和中共宜都县委机关,逮捕党员,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宜都“五八惨案”。他闻讯后迅速赶来,准备组织武装反击,群众纷纷劝他赶快离开,他见同志们均未冲出,毅然赶赴现场,奋力开枪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逮捕。被捕后,敌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敌人对他施以“坐洋蜡”(将蜡烛点然后强行从肛门塞入),其状惨不忍睹。他虽然体无完肤,但仍坚贞不屈,顽强地坚持斗争。1927年6月,敌人将他与罗克强、胡敌、江崇本、熊慕弼等中共宜都县委负责人交给川军杨森部,押入四川,在重庆附近的木洞子监押年余。1928年7月15日惨遭敌人杀害,时年25岁。



血染济南张鸿渐

张鸿渐(1896年4月28日—1928年5月3日)字遼程,原名先烛,后名鸿渐,枝江董市镇人。张鸿渐排行第七。其父为董市镇后乡的私塾先生,母亲早逝,家境清贫。幼时读书勤奋,在枝江县小学毕业后,先入武昌牙厘局街创办的私立荆南中学。婚后,夫人何桂青住娘家,纺棉纱赚钱以供张鸿渐作学费。1915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学地质。1920年毕业后,相继任教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荆南中学。1921年张鸿渐考取英国牛津大学,将夫人何桂青送至汉口六码头圣公会学校,带着大女儿读书。1922年以官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继又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获博士学位。1925年4月12日,英国伦敦旅英华人举行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张鸿渐为之写了挽联:“我公饥溺为怀,实能扶危定倾安民国;吾辈兴亡有责,当以继志续事报先生。”1927年回国,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一司第一科科长。后遭排挤,闲居家中,家住南京丹凤街54号3进。

1928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北和满蒙的特殊利益,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向国民党炫耀军事力量,出兵山东侵占济南。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组建山东交涉员公署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



署联系交涉。蔡公时数次到张鸿渐家,聘请张鸿渐任交涉署参议科长,并许诺事毕后,让张鸿渐回南京到海关工作。此时,张子高也要张鸿渐到清华或者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张鸿渐亦未答应。

1928年5月3日上午9时许,日军突然向国民北伐军发起攻击,北伐军损失惨重。5月3日8时,山东交涉员公署开始办公。9时,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正要与日军交涉,但交涉署已被日军包围,日军聚集到公署门口。下午4时,日兵挑衅,借进院为名,欲在公署三楼设置大炮,对国民革命军射击,被蔡公时严词拒绝。晚上10时,交涉署大门被日军枪托撞开,20多个日本兵闯了进来,借口交涉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交涉署,不容分说,抢夺公署及私人财物,剪断电灯、电话线,交涉署顿时陷入黑暗之中。除蔡公时外,其他工作人员全部被绑了起来。日军抢走五大包文件。日本兵将中国人绑在柱子上肆意毒打,起下刺刀拿在手中随意敲打砍刺,使交涉署内中国人体无完肤,肢体残缺,血流遍地。蔡公时大声怒骂日本强盗。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科长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怒斥强盗。日军先将张麟书残杀,又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剥掉衣服,分批乱拽拖出屋外,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鸿渐等17名外交人员惨遭杀害,烈士遗体一起被焚尸灭迹,张鸿渐时年32岁。济南惨案的发生及其善后的处理,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地民众、团体纷纷举行抗议示威,主张废除外交上的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华侨为济南惨案踊跃捐款,华人青年学生恳请回国参加对日斗争,采用各种形式讨伐日本军国主义,要求严惩肇事者,赔偿损失,声援国内正义的斗争。全国成立



了以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为主席的济南五三殉难烈士纪念会,1928年5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签发证书,对蔡公时等17人员明令褒扬。济南惨案也使得中日双方互信合作的希望破灭,中方最终放弃联日外交,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促使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希望,开启抗战时代。

张鸿渐之妻何桂青,用社会捐款、留学时政府未寄出的学费余款和抚恤金在南京狮子桥30号建房,以房屋租金养活遗孤。有遗腹女张济贞,取名中的“济”即济南市,“贞”即忠贞之意,以纪念国恨家仇。

张鸿渐在“济南惨案”中遇害后,遗骨下落不明,他的同仁为悼念他,在南京城外原仁孝殡仪馆旧址修建白石衣冠墓,墓前石碑刻有碑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29年5月3日,山东省政府为纪念“济南惨案”一周年,在泰山岱庙遥参亭坊前立“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1937年日寇侵占泰安前夕,地方维持会汉奸将其推倒。1983年将此碑复立原址。

193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和内政部长薛笃弼呈报国民政府批准:“援照国民革命军战时抚恤暂行条例”,张鸿渐等“参议科长照上校例给治丧费各六百元”。

蔡公时、张鸿渐等17名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后又被焚尸,其遗骨不知下落,国人一直十分关切。1931年6月,由蔡公时夫人郭景鸾主持寻找烈士遗骨,在英烈们殉难的济南交涉署后花园,“掘出指骨、排骨、手腕骨、四肢骨、骨盆骨之一部,骨均焦黑,系日人烧后埋葬”;“烧焦之肉炭,亦发现不少,且犹有余臭”;“并有衣服、炸弹皮、皮带、刺刀、行军地图等(行军地图上有通泰安、通东昌路程)”,由此证明系“五三”殉难烈士遗骨无疑。



1932年8月,山东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在济南交涉署旧址前,建成“五三纪念碑”。碑面刻有张苇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书记)所书“五三纪念碑”和何思源(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所撰碑文;碑身四面分别刻有韩复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所书“浩气长存”,张苇村所书“五月三日”,蒋百诚所书“为国捐躯”,王芳亭(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实业厅厅长)所书“永勿矢忘”。12月11日上午10时,举行落成典礼。1932年在中山公园附近建有“五三”惨案纪念亭,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拆除,1998年5月2日利用8根“五三”惨案纪念亭原石柱,于西护城河西岸按原样重建。趵突泉公园内建有济南惨案纪念堂。

每年的五月三日十点,济南市鸣放防空警报,纪念“五三惨案”,勿忘国耻。1995年9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在济南西护城河河东岸竖立“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2007年5月,在趵突泉公园内建成济南“五三”惨案纪念园。



抗日地方武装的组织者张翮

张翮(1910年—1939年),原名传宝,号辛耘,枝江市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委员、中共宜昌中心县委委员。

张翮出身于富有家庭,1927年考入宜昌湖北省立第四中学。1931年春,考入武昌湖北省立高中,在校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进步团体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学生运动领导人张执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底一天深夜,省立局中和武汉大学等学校遭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搜查,张翮翻墙逃出。1932年初,张翮以求学为名前往上海,几经周折找到党的组织,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员会委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春,张翮在医院医治肺病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于苏州军人监狱。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出狱。1938年春,上级党组织根据张翮的身体状况,决定调他回沙市、宜昌地区工作,并参加中共宜昌中心县委。是年农历七月,张翮回到家乡,着手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时逢国民党政府在各区组织社训队进行军事训练。他抓住这个机会,劝说叔父、开明绅士张文成出面,向国民党宜都县政府申请,将安福寺区偏北几个保的壮丁就近集中在张家祠堂训练,并通过安福寺区长杨涛向县政府建议促成在张家祠堂办起宜都社训队江北支队。他把当地进步青年安排到支队当骨干,还



通过党组织从外地调来共产党员任支队的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1938年冬,支队在社训队的基础上转为民众自卫队,拥有长短枪四五十支。张翮掌握着这支合法的地方武装,准备作为日军入侵本地区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力量。同时,发展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员会。但在苏州监狱的几年折磨,使他的肺病日益恶化,在宜昌中心县委机关工作时,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张翮自知时日不多,更加抓紧时间,努力工作,经常带着一把藤靠椅奔波于宜昌、沙市之间,指导其分管的党组织的工作。1939年3月,因病去世,时年29岁。



“烂腿乞丐”卢文祝

1949年7月中旬,仙女地区喜获解放,人民政权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建立起来。不久,又相继建立了区中队、区农会等组织。担任农会主任职务的是个中等身材,身穿灰色土布制服,面黄肌瘦,但眼神炯炯的中年人。对他,这里的乡、村干部以至平民百姓都不陌生,人们小声议论着:他不就是那个挎着口袋到处讨米要饭的烂腿叫花子吗?不错,他正是曾经化装成“烂腿乞丐”,在敌人眼皮底下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人员卢文祝同志。

卢文祝原籍河南,出身于贫苦农家。为人忠厚朴实。四十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春,他奉命潜入老周场(今仙女镇)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任务是掌握敌情,递送情报。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敌特抓获杀害的危险。为避敌耳目,卢文祝化装成一个烂腿叫花子,将发酵后的豆渣绑在右小腿上,让人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恶臭而不敢拢身。

当年,他以老周场为中心,活动在北起石子岭(今仙女镇石岭村),南至屈家店,东接问安寺,西临安福寺的方圆百余公里的范围内,成年累月地住破庙,宿屋檐,滚柜台,睡牛圈,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凭着一颗赤胆忠心,仗着一身大智大勇,巧妙地与敌人周旋,默默地为革命献身。

一天深夜，卢文祝在石子岭山上开完会后，背着一捆藏有枪支的枯柴朝着老周场方向走去。刚走到鲁家港附近，忽然看见三个乡公所的警士，扛着枪，醉熏熏地迎面闯来。开始，警士们看到路旁有个跛腿乞丐并没在意。谁知没走几步，其中一个突然吼道：“嘿！你一个叫花子，不早早投宿，夜半三更还在赶路，我看一定不是好人。”说着，向同伙一挥手，“快给我搜！”三个警士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在卢文祝身上乱摸乱捏，结果，什么也没搜到。这伙家伙火了，“扑通”一声，一脚将身旁的那捆枯柴踢下了土坎。“老畜牲，还不快滚，小心老子敲了你的脑袋。”三条恶狗无可奈何，只得骂骂咧咧，晃晃悠悠地走开了。此时，卢文祝装出一副战战兢兢、可怜巴巴的样子伫立在路旁，待三个警士走远，他跳下坎去，又捆紧枯柴。他心里暗自庆幸，那藏在柴中的枪支没有掉出来，否则，定会惹出大祸。

一天夜晚，卢文祝蜷缩在何宜兵家店铺的柜台上。半夜，忽听门外闯进一个人来。来人名叫何宜同，是何宜兵的同胞兄弟，沦陷时期当过土匪，眼下在乡公所当差，是个作恶多端的家伙，他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吼道：“哥，外面柜台上的那个叫花子，怎么常在我们这里投宿呀？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一定是个‘探子’。现在保甲连坐这么严，听说常有‘老共’的‘探子’去来，要是出了事谁负责？”过了一会，又听到他小声说道：“今天，我们把他捆起来问问，不对头的话，就把他送到乡公所干掉算了……”话音未落，只听到何宜兵冷笑了一声，反驳道：“亏得你还在外面公干，在一个讨米要饭的叫花子面前讲狠，算个什么‘好汉’！我劝你做人还要多留几条后路，干事不要太干绝了。”一席话说得何宜同哑口无言。何氏兄弟的对话卢文祝听得一清二楚，他手里摸着身上的短枪，脑子里准备着对策，看上去还是睡得那么熟，那么香，



还不时发出深沉的鼾声。第二天,他故意迟迟起身,以避免他人猜疑。

还有一次,卢文祝讨米来到保长贺昌义的家门口时,碰上十多个乡丁在这里提款。他们看到卢文祝后有意地盘问了几句,听他是外乡口音,便咬定这讨米佬一定是个化了装的“探子”。他们如狼似虎地冲上来,将卢文祝五花大绑,然后吊在禾场边的一棵大树上。几个乡丁拣来树枝,一边抽打,一边逼问:“是谁派你来的?来这里干什么的?”卢文祝忍着剧痛,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是一外地来的流浪叫花子,没有哪个派我来。”乡丁们见问不出名堂,火气更大了,他们将卢文祝从树上放下来,按倒在地,然后,用板凳压在卢的膝弯上,将两臂绑在一根碗口粗的木杠上,又在板凳上站人,一个、二个,一边加压,一边逼供,最后,四个乡丁踩上去了。卢文祝被折磨得昏死几次,但他仍然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对卢文祝的为人,贺昌义也心里有谱,他估计这叫花子非同一般,他想,如果让乡丁们把这叫花子在他家门口整死,恐怕以后难脱干系。于是,他走上前去对众乡丁说:“弟兄们,你们也够累的,快来歇歇,一个烂叫花子,我谅他干不成什么大事。你们暂且放了他,万一有什么不测,我可以身家性命担保。”见保长出面说情,一个个汗流满面的恶鬼才住了手。卢文祝又一次遇难脱险。

1949年7月仙女区解放后,卢文祝虽然当上了区委委员,以后,又担任了区委副书记,但是他仍然保持着艰苦的作风,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贪图安逸享受,即使后来胃病加剧,疼痛难忍,还是废寝忘食地工作,不要特殊照顾。他发胃病时,就在厨房后面用土砖搭个地灶煮点粥度日。

1959年,卢文祝因胃痛加剧进食都困难了。年底,他决定回到离别十三年的河南老家去探望一下年迈的父亲和家乡父老。1960年元



旦后,组织上派人送他回到了河南林县。他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在1960年1月25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为革命而战斗的一生,终年47岁。

在卢文祝的遗体上,人们发现,左臂部上方,因短枪长期摩擦,留下了一道厚茧,那条曾化装烂腿的胫部肌肉也因多年的束缚,明显萎缩。这两处伤痕是卢文祝饱受磨难的见证,它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棉花奶奶李文英

李文英(1933年3月—2017年7月)女,枝江市农业局退休高级农艺师,湖北省枝江市农业局退休职工。棉花奶奶李文英1933年3月出生于武汉市南京路,上高中时因受前苏联电影《米丘林》影响,立志做生物学家米丘林这样有作为的人。1953年,李文英参加了高考,在第一志愿填报了华中农学院农学系。1957年7月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先后在湖北宜昌地区农业局、宜昌农校和枝江市棉花良种场、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33年,一直在基层从事农技推广。

1972年,李文英被派到枝江百里洲县棉花粮种场从事技术工作,她在这里扎根14年。百里洲是万里长江上最大的江心洲,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她每天凌晨起床,上工铃响前就已下田,和棉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棉农培育良种,进行实验、研究。当时农业科技常识尚未普及,棉农掌握的农业科技十分有限,棉田枯萎病爆发时,棉农差不多束手无策,重病的棉田几乎绝收,轻的每亩减产三到五成。李文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1977年开始,李文英就在良种场重病田里进行棉种的有性杂交实验,1978年又远赴海南进行抗菌棉种的加代繁育。通过10年的艰辛努力,培育出抗枯萎病的棉花新品种“鄂枝03”,并在湖北省11个县示范种植20余万亩,每亩增



收30%以上,成千上万的棉农因此受惠。此后她被授予“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被评为高级农艺师。20世纪80年代,李文英在县良种场工作时,曾在棉田里发现一种未见过的害虫。为了弄清防治该害虫的时间规律,她收集了一堆虫卵,在家中专心致志地养起了害虫,前后20多天,最终摸清这种螨类害虫的羽化和产卵高峰期,精确掌握了防治这种螨类害虫的时间规律。棉田的病害,李文英当作自己的事情,记在心里,不解决不罢休。

1990年,李文英从枝江市农业局退休。当年,她便到枝江市城区附近的白家岗村,担任无私奉献的“棉农义工”,免费为当地棉农传授农作物栽培技术,并引进棉花和果树新品种。她为两户棉农周宜福和游韵军传技,小面积推广“中棉12”“89~15”,20年过去了,虽然白家岗村早已改棉为菜,当年的棉农游韵军还记得,两个品种抗病性好,棉桃大,便于拣花,他当年收入过了1万元。李文英还自掏腰包,买来种子、化肥和农药给该村七组一周姓困难户送去,这种完全出自个人的“农业补贴”,此后竟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看到村里还有其他困难户也面临同样困境,她干脆找到枝江县植保站,由她担保,将站里的肥料先赊给棉农,待棉农们在棉花和果树收获后再付钱。为了让棉农们抓住时节抗病抗虫,她又自费编印农业病虫害情报,每个月打印出一到二期,每期两页纸,然后复印数百、上千份,分发给棉农指导植棉。21年来,她总计发放有6万多张农业情报。

李文英退休后走村串户22年,她唯恐给棉农增添任何负担。每年6月到9月是棉花生长的关键期,这三个月也是酷暑季节,可李文英在酷暑炎夏期间,每个月下乡指导的天数也在18天。这三个月李文英都要很早出门,随身带上两瓶水和几个馒头、一双胶靴,还有记



事本和捎带给乡亲的农药、微型肥料。每次下乡,她先坐公交到长途客运站,然后坐小巴到村里,最后步行几公里到农田。她下乡时,上午10点前没吃过早饭,下午两点前没吃过午饭。她自带干粮,乡亲们请她吃饭、喝水,一次也没有请动过。她只说:“饭菜不吃不要紧,你们增收我就高兴。”

李文英是枝江市老年科协的会员,董市镇洪治村是枝江市老年科协的联系点。李文英退休后驻点的洪治村,她熟悉村里508户人家每户的责任田位置。她为棉农热心推荐棉花良种,但习惯于墨守成规的农户并不一定愿意接受。1996年,李文英在《中国棉花》杂志上看到石家庄农科院研究员赵敬霞培育的一种抗虫棉良种“标杂棉A~1”,她立即自费邮购回2袋种子,让棉农李家才试种。那时,抗虫棉还是新鲜东西,谁愿意拿一年的辛苦开玩笑啊?李家才不愿意种新棉种,李文英理直气壮地保证:“两亩田就是一朵棉花也不收,顶多损失千把元。我有退休工资,赚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李家才这才答应下来。播下种子后,李文英三天两头往李家才的田里跑,计算出苗率,记录用肥用药量与效果,跟踪记载苗期、蕾期、铃期、桃期表现及虫害情况,适时进行指导。到了收获季节,李家才的两亩棉花,平均单株结桃超出60个,而其他棉田仅有30来个。单产皮棉210多斤,比其他田高出30%。李家才高兴地跟李文英开玩笑说:“我当初不光怕没得收成,还怕砸锅了毁了您高级农艺师的牌子!”“毁牌子我倒不怕。搞试验就是为了消除棉农的风险啊。”李文英也开心地一笑。李文英从棉苗种下后,就三天两头地到田里记录棉花生长情况,然后形成一份观察总结报告,还给石家庄农科院的赵敬霞寄了过去。为此,赵敬霞多次给她发来邀请函,请她到石家庄参加科讨论

会。

2000年,李文英又从武汉引进美棉抗王1号、2号,安排在原洪治村八组棉农张祥林的田里种植,面积2亩,张祥林家有棉田4.5亩,当年总收入6800余元,亩产值1511元,在八组产值居第一位。张祥林高兴地告诉同村人,是“李妈”给她引进了好的抗虫棉种子,村里人于是纷纷找李文英要良种。李文英什么回报都不要!她说:“看到棉农们种良种增收,我心里高兴,这就是最大的满足。是的,现在很多青年人都无法理解我们老一代人的想法,但从那个‘又红又专’的时代里成长起来,我们受的便是这种教育,已经习惯了。”

2005年7月,李文英发现《枝江植保》上通报第三代棉铃虫卵高峰期可能在7月19日左右,而根据该年棉花早发的特点,她认为通报时间偏迟,在与植保站技术专家会商后,及时将最新、准确的情报以口头方式通知到每个农户,要求他们迅速防治,从而控制了虫害的发生。

董市镇洪治村有20多户从秭归县、夷陵区搬迁来的三峡库区移民,他们是山地农作物栽培熟手,但对大平原上的棉花种植却一窍不通。2001年望运富一家从秭归茅坪迁到洪治村四组,有4亩多田。李文英把他作为联系户,决定在他的田里试种“太仓502”品种,手把手地教他。棉苗长起来了,李文英给它们系上作为标记塑料带,以便观测记录棉花的生长情况。谁知到拣棉花的时节,望运富把标记塑料带扯下,当废物扔了。李文英看到到处飘的标记带,真是哭笑不得:“你这样一来,我就半途而废了,怎么帮你明年改进啊?”望运富也苦笑说:“我只要拣得到棉花就行,哪管得到这些啊。”即使这样,李文英仍然耐心地坚持指导望运富科学种棉。2010年,望运富仅棉花一



项就收获8600多元。

21年来,李文英运用多项棉花新科技助农增收,并尝试了33个棉花新品种和50多种新药、新肥,剔除了一批不适合的种子、农药、肥料,大大降低了种植棉花的风险。遇上秋冬春连旱,她放心不下棉花的成长、防旱、防虫,去洪治村特别勤,资料也发得特别多。她在田边遇上主人,就先看苗情,再问施肥情况,后讲抗旱保苗措施。田边没遇上,家里又没人,就根据田里的实际开方子、留条子。用她日记中的话说:“有的农户开始反应慢,就反复讲了多遍,直到他们行动为止。”枝江市农技推广中心李德梅夸奖她是“七八十岁的年龄,四十几岁的干劲”。

李文英一生坚持写工作日记,日记记录了她半个世纪的农业科技推广足迹。关注“新品种对抗虫害的作用很大”,1977年日记:“我从陕西省棉花科研所引进了1436、1462、3619、721、112号棉花品种,与我棉花良种场的7239号品种进行杂交,搞了12个杂交组合。那时的病虫害很严重,通过杂交而成的新品种,对抗虫害的作用很大。”她培育的新品种“鄂枝03”,1988年日记:“棉农种棉最大的敌人,就是虫害,为了治虫,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我历时10年选育出了棉花抗枯、黄萎病的新品种‘鄂枝03’。1987年,通过了省专家小组的审定鉴定,经专家组鉴定后,命名为‘鄂枝03’。这个品种抗棉花枯萎病能力强,在1983年的区试中,亩产皮棉97斤,1984年亩产209斤,1985年211斤,在枝江七星台镇示范种植亩产皮棉200斤。在湖北省的汉阳、宜都、枝江等10几个县推广面积累计5万多亩,产量增产10.6%,1985年至1987年,获得宜昌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办科技试点,1990年日记:“我在马店白家岗村办点,试验示范并推广棉花



抗病品种‘中棉12’‘中棉89’，累计面积1400多亩，与前年相比，棉花抗病能力显著增强。我从河北、山东、安徽等省引进新品种7个，全部推广给了棉农。”

她退休了仍然心系农村，2000年日记：“这一年4月，我退休了，但我没有退步。2000年，我主动来到董市镇洪治村办点，在张祥林户种植4亩半的抗虫棉，当年他家的总产收入6800多元，亩收入1511元，当年在该组产值数量排在第一位。有人对我说，这下张家可讨到李婆婆的好了啊，后来，有200多农户都种上了这个新品种，家家增收。”退休以后成果累累，2006年日记：“我示范了抗虫棉新品种12个，其中‘中棉所12’‘九杂4号’等都表现出了棉桃大、品质好、抗病强、亩产高的特点。据统计，亩产籽棉在564~662斤，高的还达到了700斤左右；我每年向联系户供棉种250斤~300斤左右，16年共供种5000斤左右，创经济效益24万多元，每亩节省农药投资50~60元，16年累计为我联系的棉农节约26.4万元。我在枝江市董市镇洪治村办点，以洪治村为中心辐射至城关丁家沟、百里洲、八亩滩、棉花良种场等地，为攻关种业当技术顾问。全年共下乡100余天，自筹车船费、品种试验费等合计1200余元，为棉农服务。我引进示范粮、棉、油菜等各种农作物新品种22个，其中抗虫棉品种12个、油菜品种（双低油菜）4个、包谷品种2个、蔬菜品种4个。这些品种95%以上表现高产、抗病、质优，得到了广大棉农的欢迎与好评。”

李文英义务指导技术，把棉农的事当自己的事。农业情报《枝江植保》有时印数不够，她自己贴钱复印了给棉农送来，村里常有人请她帮忙带种子、带农药，一来棉农信赖她，二来是有的棉农算细账，因为少跑一趟县城要节省10多元车费。大家有时看不过去，可她说，



棉农在乎这点车费,说明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从来没有一点怨言。面对棉农们的技术求助,她从来不会敷衍。她懂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她不懂的技术,也会想尽办法帮棉农求教。洪治村的潘德盼是董市酒厂的退休职工,他家不种棉花种柑橘。他说:“李婆婆是棉花专家,但对其他作物,比如柑橘、玉米、蔬菜……只要我们有需求,她便请市里的专家来讲课。我们求教她时,她百解不烦,一个专家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我常邀请她去家里坐坐,她是知识分子,我们喜欢听她讲,哪怕只是拉拉家常。”村里有两个科技专栏,其中有一个在一个农户的山墙上。潘德盼记得,有一次,宣传栏下有堆干牛粪,李婆婆正好经过这里,她怕大家不方便看情报,便想把牛粪清走,不巧的是,旁边几家人很早就下田去了,她想借把锹也借不到,只好用手把干牛粪捧走,还把宣传栏下的杂草也拔干净了。她希望每一个棉农都能掌握更多的农业科技知识,尽可能少流一滴汗水多一份收获。

李文英是闪亮的旗帜,毕生奉献诠释了党员本色,她在田间地头的50多年,让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敬佩不已。村民张道华说:“我和李婆婆早就认识,十几年前,她便开始在村里推广抗虫棉、抗病棉,后来逐渐跟洪治村建立了固定联系,三天两头往村里跑,手把手地教棉农种植新品种棉花。2000年时,我们村有22家从秭归来的移民,不会种棉花,李婆婆从备土做营养钵、棉苗移栽,一直教到棉花采摘,全程跟踪服务。有时来不了村里,便打电话来让我们转达,打什么药,按多大比例打,在电话里说得清清楚楚,生怕我们错过了时节,种庄稼最讲究时节,她从来没有耽搁过季节。”张道华说,“这么多年,她就像我们洪治村的亲人,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呢,我觉得李婆婆就是!”

李文英每次下乡，往返一趟需6元，每月车费需要一百多元，月工资的10%花在了车费上。另外的大开支是电话费。为了能及时帮棉农解决治虫、排水等紧急情况，她经常要和棉农通话，进行技术指导，这笔费用每月需要一百多元，又花掉了工资的10%。据枝江市农业局不完全统计，20多年间，她累计下村超过2500天，贴进去的车船费、试验辅助工工钱、扶困种子、肥料钱和资料费等不低于10万元，而她每月退休工资只有1600元。

2009年5月18日，在董市镇四合村一组的一次下乡时，李文英在村民潘传民家的油菜肥料示范田里做完调查和记录，返回时跌入一米多深的水坑中。当时四周无人，身高不足1.5米、瘦小的高龄老人抓着手坑旁的茅草，挣扎了十几分钟总算爬上来，捡回了一条命。“我真的被吓坏了，很怕，之后有3天不敢再下乡了。”这次历险并未使她停下脚步，她在工作总结中写道：“如果坑里的水再深一点点，也许我就‘光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甘愿无偿地为棉农服务，为建设新农村出最后一把力。”这次遇险后，李文英花200元买了个旧手机。亲友们心疼她，纷纷劝她不要再下乡了，可她就是停不下来。“一来，我是放不下自己做了一辈子的专业，浪费了所学专业实在可惜；二来，棉农们说太需要技术了。”李文英不会骑自行车，下乡时她大量时间靠步行。有人估算：“退休至今的二十余年里，她下乡的里程数相当于10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让李文英高兴的是，她的“长征”没有白走，苦没有白受，因为棉农们一直没有忘记她。2011年4月21日，百里洲镇的一个农资商店老板托人找到李文英，邀请她去洲上给大伙讲农业技术课。一个上午，她一刻不停地讲了整整3小时，前来听课的棉农，也从四、五个增加到结束时的50多



个。78岁高龄、52年农技服务、21年义务护棉,记录“棉花奶奶”李文英坚守半个多世纪的“三农”情怀。有人不理解李文英,问她这样既累身子又贴票子,到底图什么?李文英回答:“棉农的需要就是我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发挥余热,圆满地走完人生。”她退休后,坚持每年写工作总结。李文英在2008年工作总结中写道:“有人问我,你不收报酬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只要对棉农有利,付出就值得,我从不后悔。又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能在退休后仍坚持在农村又干这么多年?我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入党时承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要实践自己的诺言,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坚持,再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出最后一把力。”

为“三农”,李文英非常慷慨,但对自己,她却非常抠门。平时几乎不吃荤菜,几件略好的衣服,是在武汉的几个妹妹送给她的;一双胶鞋,一个大布包,一顶草帽,是最常见的行头。她说:“只要内心富足,穿什么衣服都一样;如果自己是个大草包,穿得再光鲜也没用。”长期在基层与棉农打交道,李文英已经离“时尚”很远了:2007年,大学同学毕业50年聚会,在回母校的20名同学中,李文英是唯一穿着解放鞋的人。其他同学,有的当教授,有的出国,有的当官,有的经商,唯有她在农村不忘初心,清贫如洗。刚见面不久,班长周映玲要为她买新衣服,同宿舍的同学郭曼莹要把自己身上那件时尚的上衣脱给她穿上,有的同学要给钱,都被她婉拒。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李文英上台讲述几十年来在农村为棉农服务的经历时,现场非常安静,讲到她历时10年选育成功的“鄂枝3号”优质棉推广到中国很多县时,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当时,好多同学都感动得哭了,为她骄傲。

她毕业后和大学同学郑荣棣相爱并结婚,1957年她分配到宜昌



地区工作，丈夫到枝江县工作，结婚后，家临时安在枝江。1972年，她被派到枝江百里洲县棉花粮种场从事技术工作，她在这里扎根14年，丈夫则在枝江县七星台镇工作。夫妻同在一个县，长江却让他们天各一方。结婚50多年，李文英和爱人真正相守的时间却只有十几年。对丈夫，李文英更抱有一种永远的愧疚。2005年，就在丈夫去世的前三天，李文英才知道他患上了癌症。丈夫去世后，李文英在家中专门留出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丈夫的遗像，书桌上留着 he 曾经看过的书籍，地上摆放着他修理过的农机具……以此来表达对丈夫的愧疚和怀念。他们夫妻生育了一对儿女，儿子在枝江，女儿在武汉。儿子8岁那年的一天，李文英在百里洲农场上班时，突然接到口信说，她儿子从树上摔下来，头破血流。李文英刚赶回家，儿子就捂着头跑到医院找医生包扎伤口。对儿女，李文英欠的“债”似乎永远也还不清。李文英说：“我对两个孩子一直深感愧疚。儿子和女儿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至今生活得很不如意。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但为了棉农，为了事业，我不得已只能牺牲家庭。”

因为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李文英不会用电脑，也不常看电视，为了更新知识，她长年自费订阅两刊一报：《中国棉花》《湖北植保》和《楚天都市报》。前两种刊物，是为了获取最新农业技术和良种信息，后一种，除了闲暇时阅读，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获取天气预报信息，根据报纸上的天气信息及时通知棉农施肥、开沟、打农药。

2011年，作家张同发现并采写关于李文英的报告文学，刊发在《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引发50多家媒体的跟进报道，推出了李文英这样全国性的典型人物。2011年6月1日《楚天都市报》上刊登了李文英的事迹和她的大照片，她的亲友们才知道她为棉农所做的一切，



亲友们都非常佩服和震撼。6月2日中午,华中农业大学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余思林、植物科技学院副院长秦长平一行,代表母校专赴枝江慰问李文英,称赞她是百年华农骄傲。余思林一行就把李文英当年的《简历表》《入学注意事项》送给她,还送给她华农的校徽和《湖北棉花技术手册》《华中农业大学》(丛书)。端午节即将到来,学校还送给她皮蛋。华农送给李文英的礼物中,另有1953年9月29日的《长江日报》。当天的《长江日报》上刊发了华农1953年录取学生名单,农学系中的39人,有李文英与丈夫郑荣棣的名字。这些历史资料,让李文英非常高兴。余思林恳切地希望,李文英校友回母校为师生们讲课,以此勉励年轻的大学生勇于下到基层,走向农村。李文英收到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院士6月3日发自武汉的信函,邓秀新在信中赞扬李文英是华农校友的优秀代表。邓秀新校长在信中说:“我从报上看到您的事迹报道后,同全校师生一样深受感动,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勤读立耕,立己达人’的华农精神,是母校的光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湖北各界高度评价棉花奶奶,掀起向李文英学习高潮。201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都市报》报道的“棉花奶奶”重大典型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棉花奶奶”李文英的先进事迹,称赞她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战线的一面旗帜。批示中说李文英同志把“专家”的头衔挂在乡村,把自己的“论文”写在田间。她从大城市武汉走来,却情系“三农”,50多年来扎根基层,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奉献为民,其功德记在棉农心坎上,名声留在当地棉农口碑中,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战线的一面旗帜。此事迹应该认真总结和宣传,此



典型应该学习和表彰。2011年8月2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在全省开展向李文英同志学习的活动。随后，《湖北日报》跟进报道了李文英的先进事迹。中央媒体也给予了广泛关注。9月4日，光明日报以《“离不开那些棉农兄弟和棉田”——“棉花奶奶”李文英半个多世纪当“棉农义工”》为题，对李文英的事迹进行了报道。9月6日，中宣部组织中央多家媒体集中采访报道“棉花奶奶”李文英的感人事迹。同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退休二十余载甘当棉农义工》，聚焦李文英扎根田野、默默耕耘的感人事迹。在随后的几天里，人民日报、人民网以《李文英“棉花奶奶”退而不休》为题，报道了她的感人事迹；《棉农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棉花奶奶”以奉献和责任，在田间地头树起飘扬的旗帜》，并配发“编者按”和相关图片，集中展现李文英半个世纪的“三农”情怀；中新社、《科技日报》等媒体相继对“棉花奶奶”的事迹作出了详尽报道。腾讯、网易等网站也纷纷转载“棉花奶奶”的相关报道。截至目前，有10多万网友发帖，称赞“棉花奶奶”为棉农的贴心人。

面对社会的关注，李文英却十分平静。在出席湖北省老科协专门为她召开的座谈会上，老人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一辈子从没想过出名，只想尽到一个农村科普推广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让棉农能够多一些收入，让农村能够快一些发展。”2011年6月，枝江市为她成立了“李文英工作室”，并建立“李文英棉花发展基金”，让她的事业后继有人。2014年，李文英劳模工作室承办棉花直播等生产研究课题8个，推广抗虫棉新品种12个，示范应用精华素、光碳生态肥22亩，组织送科技下乡4场次，举办植保、土肥、栽培等新技术培训2000人次，发放科技资料3000余份，带动农户亩平增收500元



以上。

2017年7月1日,李文英因肺癌晚期救治无效,在枝江市去世,享年85岁。3日,李文英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枝江市殡仪馆举行,枝江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宜昌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和昔日同事以及枝江市多个乡镇的百余村民纷纷赶来,送她最后一程。

李文英退休二十余年来,累计奔走田间2500多天,走过10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帮助特困棉农购买种子、肥料,支付车船费、试验辅助工工钱和资料费达10多万元,开展技术指导作物面积1200多亩,常年联系农户400多户,辐射农户近万户,帮助棉农增收千万元,被尊称为“棉农义工”和“棉花奶奶”。

李文英同志1983年7月入党,1984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88年被评为湖北省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2011年被评为湖北省科技服务标兵、荆楚农技推广先锋,荣获湖北省老有所为科技贡献奖一等奖、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2年被评为湖北省最具慈善爱心行为楷模、湖北省三八红旗手。2011年以来,李文英先后被授予“湖北省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荆楚农技推广先锋”、湖北省“老有所为科技贡献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道德模范提名奖”、“宜昌十大民选新闻人物”、“楚天年度功勋人物”、枝江市“第二届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荣登2011年12月“中国好人榜”,获宜昌市“最具慈善爱心行为楷模”称号、湖北省及宜昌市“三八红旗手”。2012年6月被授予“全国争先创优优秀共产党员”,并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2年10月被评为湖北省第三届感动荆楚“十大杰出老人”。2013年1月,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4年,作家张同的报告文学《棉田映晚霞》获得宜昌市屈原文艺创



作奖。2017年1月,李文英荣获2016年度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突出贡献奖”,这也是继她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后,再次获得国家级殊荣。李文英扎根基层50多年,是农业科技推广战线的一面旗帜。

2017年8月,由国家一级编导陆洞元、尹波创作并执导的大型黄梅音乐戏剧《花漾年华》,“棉花奶奶”李文英的事迹被搬上舞台。黄梅音乐戏剧《花漾年华》共分六个篇章:1、奔赴农村;2、情系三农;3、十年磨剑;4、拒绝诱惑;5、生离死别;6、终生不悔等,再现李文英服务“三农”的感人事迹。9月,该剧曾作为第二届宜昌艺术节“宜昌文华奖”演出剧目在枝江演出,收获巨大成功。12月5日晚7时30分,“向人民汇报”宜昌艺术剧目县市区巡演首场演出——枝江市歌舞剧团新编黄梅戏《花漾年华》在宜昌五一剧院震撼上演,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红色特工”谢洪恩

谢洪恩(1906年—1949年),男,汉族,曾用名鸿恩、宏恩,1906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城郊。妻谢余光,婚前用名余光,枝江县石子岭村余家花屋(今当阳市半月镇胡家湾村)人。

谢洪恩曾就读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宜昌私立华英中学。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宜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彝陵中学、华英中学等校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26年,时值国民革命军北伐,英国军舰炮击四川万县,造成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谢洪恩积极参加了华英中学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英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华英中学英籍校长以撕毁学校招生广告为由将年仅20岁的谢洪恩开除,并责令其“从后门滚出去”。谢洪恩深受侮辱,悲愤交集,这也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失学后,年轻的谢洪恩相继在宜昌城杂货铺、糕点铺当学徒,又曾自备织袜机拜师学会了织袜子的技术。

1929年,23岁的谢洪恩顶职到宜昌盐务局工作,后任主任。宜昌城1940年6月沦陷前,谢洪恩随所在盐务局迁往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又被调到应城盐务局。1946年,因抗战期间与共产党接触频繁,思想进步,再度以所谓“通匪”嫌疑被当局开除。

谢洪恩热衷于教育事业,曾立志教育救国。1946年回到宜昌



后,在中山路的北面珍珠岭上四海茶园附近(今儿童公园内)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并以夫妻两人的名字给学校命名为“恩光小学”。1948年9月,经其内侄余玉龙介绍,谢洪恩来到枝江县石子岭小学教书,担任五、六级的历史、自然课程的教学。

谢洪恩到枝江县石子岭小学后,寄宿在位于学校北面不足两里的青龙岗和白虎嘴之间的余家花屋余玉龙家。余玉龙在日本人入侵时,任江防部队联络站谍报组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本投降后,历任枝江县龙旗乡副乡长、新政乡乡长、三清团区队长、董市镇镇长、江北办事处主任,1949年4、5月间,升任宜昌专署专员鲁坚助理秘书。其人为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

石子岭小学位于枝江、当阳和宜都三县交界处,是著名的游击区,也是襄西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带。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如李先兵等)及地方革命武装经常在花庙河、石子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发动群众。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1928年,共产党人孟庆祥(解放后改名孟彩云)曾在紧邻学校的花庙河建立了党小组,可以说,这里是一片革命的沃土。在枝江县石岭地区工作期间,谢洪恩受新形势的影响和新思想的熏陶,逐步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认识。他通过当阳县半月乡乡长刘善长结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以后,便萌生了投向革命的想法。1949年2月,他携带女儿谢德珠和刘天如等一行三人,在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带领下,从石子岭出发奔向襄西革命根据地。

当他们一行到达当阳县半月乡时,党组织交给谢洪恩一封信,委托他送交内侄余玉龙,动员时任董市镇镇长的余玉龙率领江北保安大队起义。余玉龙曾与中共地下党人李先兵在问安寺多次私下接



触,有过率部起义的口头协议,对李先兵等人的革命活动听之任之。他虽然对国民党已不抱幻想,但又对形势认识不足,下不了起义的决心。这次策反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促使余玉龙将20支枪连夜埋在周家场,减少了对共产党的威胁,放弃了对共产党进行对抗。在策反工作未果的情况下,谢洪恩于当日午夜返回当阳县半月乡后,又连夜在刘善长派人护送下赶路继续其行程。在到达中共当阳地委(1949年1月前为第四地委,亦称襄西地委)、当阳专员公署(1949年1月前为第四专署,亦称襄西专署)的驻地南漳县东巩镇时,得到解放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其中,地委城工部(又称敌工部)部长何定华介绍他们前往江汉公学襄西分校学习。该校于1948年末由襄西地委创办,地委副书记、专员刘真兼任校长,杨筱震任副校长,创办初期校址在东巩镇以南的新街和龙王滩一带。

当阳地委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拟派出人员进入宜昌城为迎接解放做准备工作,城工部同襄西分校反复研究后认为,谢洪恩年龄较大,曾在宜昌盐务局工作多年,又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同时,谢洪恩家居宜昌县城,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加之到达解放区为时甚短,没有暴露行踪和身份,比较适宜潜回宜昌城内做隐蔽工作。地委城工部(敌工部)部长何定华亲自同谢洪恩谈话,交代了任务,并指派了具有长期从事地下联络工作经验的城工部干部对其进行了地下工作纪律、联络方法等培训,详细研究了敌情和回宜昌的路线。4月中旬,谢洪恩回到宜昌,在云集路广寒宫(清唱茶园,即今宜昌市人民银行附近)门前以摆香烟摊为掩护,开展为党组织收集情报和张贴革命标语等工作,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与其联系。谢洪恩的二女儿谢德珠及刘天如回到枝江县贺家祠



堂及周家场小学(今仙女庙、老周场集镇),继续以教书工作为掩护配合谢洪恩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节节胜利,而国民党则对人民实施更加疯狂的镇压。1949年4月28日,国民党第60师师长兼任宜昌守备司令部司令官易瑾悍然发布“八杀”令,宣称对于所谓“造谣惑众者”“纠众暴动者”“鼓动工潮学潮者”“盗窃抢劫者”“窝匪通匪者”“破坏电信交通者”“扰乱金融者”“无命令破坏物资者”均处以极刑。5月8日晚11时,宜昌全城进行戒严演习。5月9日,《川鄂日报》重登业已宣告灭亡的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的“戒严令”,并进行所谓“严防奸宄潜伏活动,确保宜昌市区治安”的户口整顿,派出武装人员在全市实行户口突击检查,一片杀气腾腾的法西斯式白色恐怖。

5月初,谢洪恩在张贴革命传单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跟踪。不久,谢洪恩即被国民党宜昌守备司令部以“通匪犯”的罪名逮捕,关押在宜昌模范监狱,旋即于5月10日被杀害于飞机场(今夷陵广场建委大楼旁)。5月11日,《川鄂日报》第二版以《组织党羽刺探军情匪谍谢洪恩昨伏法另有三人陪斩以示警惕》的大字标题报道:宜昌守备司令部,于昨(十)日在飞机场枪决通匪犯一名,按该犯系四川泸州人,名谢洪恩,年四十三岁,于三十七年十二月被匪利诱,潜赴匪区东巩受伪干部训练后,旋被派来宜昌,调查各机关及仓库地址,以便匪军攻城后,内应外合,并借摆摊为掩护,经派员破获后,审讯确实,并呈准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处以极刑云。

谢洪恩被捕后,对前去探视的养母、妻子及两个幼儿德安、德美倍加关怀和安慰,对自己的险恶处境却泰然视之,表现出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念。后在被绑赴刑场经过珍珠岭的家门时,面对养母

和妻儿悲痛欲绝的情景,他态度坦然,视死如归,从容就义。

1949年7月16日宜昌解放,时任宜昌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部长的何定华亲自指派毛云峰调查了解谢洪恩惨遭敌人杀害的经过,并指示市委、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整理上报材料。1950年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谢洪恩为革命烈士,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副主席聂洪钧签署颁发鄂优字第451号革命烈士家属优待证。



青年英雄潘天炎

潘天炎(1932年—1973年),枝江市问安镇袁码头村人。幼时家境贫寒,仅读过一年私塾。1942年父亲被日寇抓去当苦力,在江口镇被打成重伤致死。由此家境更为困苦,为求生计,他与兄长二人年少即外出帮工。1949年6月,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同年8月在湖南被解放军某部第二营营长当作孤儿捡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38军为志愿军第38军,准备首批入朝参战。陆军38军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志愿入朝签名运动,潘天炎才17岁,个儿瘦小,当时他正在拉肚子,指导员要他留守,他哭了。第二天,他跑到营部找到营长冯怀玉说:“营长,我肚子好了,不信?我撒泡尿给你看看!”营长被潘天炎这少有的天真和决心逗笑了,答应让他去朝鲜。潘天炎做了个鬼脸,扭头跑了,随后跟来的指导员着急地跟冯怀玉说:“营长,他没有好,白天还跑了几趟厕所呢!”冯怀玉无可奈何地说:“咳,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就这样,潘天炎于1950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第38军第112师第334团2营6连9班战士,先后7次参加战斗。

1951年2月,彭德怀总司令命令西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不惜一切代价阻滞美军北进的速度,因为在战场的东线,正在



策划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击作战。2月28日,美军一个团在1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分两路进攻鼎盖山,被坚守在这里的第334团杀伤200多人,潘天炎所在的机枪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38军112师336团5连坚守的阵地是泰华山主阵地前沿的草下里南山,5连以几乎全部伤亡的代价,把草下里南山阵地坚守到了上级规定的时间,上级命令6连接替5连继续阻击美军,控制敌军通道和集结点,因此与美军发生争夺战。第112师防御地段的东端点是东南面紧靠利川的鼎盖山,潘天炎所在部队坚守山顶,阵地右侧是连部主阵地,左侧是悬崖和大深涧。潘天炎与班长、小组长坚守在阵地最前沿。他们坚守6天,打退敌军4次冲锋,自己的弹药即将用尽。根据作战形势,上级命令必须再坚守一天,以牵制敌军。当敌军发动第5次冲锋时,潘天炎与战友扔出一批手榴弹,炸死不少来犯敌人。敌军接着用炮火向山头猛烈轰击,副班长身负重伤。敌军分两路包抄,发动第6次进攻。潘天炎急中生智,与小组长商量,将6颗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埋在工事前面,脱下帽子盖上,进行伪装,用电线拴住导火索。潘天炎个子小,敌人没发现他手牵电线隐蔽在大青石后面。敌军见阵地无守军,仅存一顶帽子,以为志愿军全部撤退,便蜂拥而至。潘天炎见时机已到,立即拉动导火索,一声巨响,将群敌炸翻。敌军继续进攻,小组长打死4个敌人后,不防敌军手榴弹爆炸,光荣牺牲。潘天炎含泪用卡宾枪打死残敌。为了继续打击敌军的进攻,他立即整理阵地工事,检查武器弹药。结果,除手榴弹外,卡宾枪仅有一颗子弹。突然又有6个敌人带着1挺机枪和4支步枪发起进攻。潘天炎心生一计,高声喊道:“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准备好手榴弹!”然后悄悄跳出工事,绕道迂回至敌后。敌人听见喊声,便对准工事猛烈射击,潘天炎出其不意,从敌人身



后扔来两颗手榴弹,当场炸死6个敌人。敌军见状,十分气恼,组织两个排的兵力,采用羊群战术进攻。潘天炎跑回阵地工事,将所有手榴弹盖揭开,一个个往敌群投去,炸得敌人四处奔逃。此时,敌军一颗手榴弹扔来,潘天炎急忙一脚踢回。他转身一看,一个敌人已经悄悄摸到他身后,企图活捉他。潘天炎举枪将这个敌人击毙。回头一看,有两个敌人冲上山来,他抓起敌人尸体上的武器,将两个敌人消灭。这时,全连反攻时间已到,背后枪炮齐鸣,向敌军发起全线反攻。在这次战斗中,潘天炎打退敌人9次冲锋,保证了全连按时反攻取得胜利,十八岁的潘天炎成了“孤胆英雄”,他的英勇事迹受到战友的称赞和上级的嘉奖。潘天炎孤身一人消灭敌人30多人,击退了敌人9次冲锋,荣立小功两次、记大功两次,并授予“青年英雄”称号,获得朝鲜人民共和国军功章一枚及立功证明书。陆军38军政治部将他的英雄事迹载入军史。

潘天炎的英雄事迹在全国广为流传。1952年,我国著名的单弦牌子演唱艺术家梅门造、魏喜奎、马增惠等人将潘天炎的英勇事迹编成演唱曲目单弦《青年英雄潘天炎》,并制作唱片在全国传唱,1956年编入初中音乐教材。1952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英雄潘天炎的英勇事迹。1953年,潘天炎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54年9月,潘天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乡人民为了向英雄学习,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将家乡生产合作社取名为“天炎社”,后又改为“英雄大队”。1956年11月,潘天炎被所在部队任命为排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青年英雄潘天炎》的连环画册。作家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和原三十八军军长江拥辉少将的《三十八军在朝鲜》两书中均记录了他的英勇事迹。1957年5月,潘天炎光荣复员,回地方工作,先后任原枝江县粮食

局人事股副股长,百里洲、问安等地粮管所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1973年2月12日,潘天炎病逝,安葬在马家店街道办事处杨家垱岗地,1975年因修建湖北化肥厂生产区而迁至问安镇袁码头村第1组。家乡人民在袁码头小学内树立“青年英雄潘天炎”纪念碑,1991年3月在墓地为其塑像,是枝江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实践点。2015年9月,潘天炎战斗英雄墓被命名为宜昌市第三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巾帼英雄杨大兰

杨大兰(1970年—1989年),一家姐妹四个,大兰排行第四。她一心要当父母的“好男儿”。读初中时,她将自己的名字的“兰”字改为男女的“男”,想做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班主任见她总在练习本上署名“杨大男”,几次批评她瞎写。她跟老师赌气,说老师“不尊重”她的“特殊用意”。后来,老师才知道,大兰是一心要当父母的好男儿。

她到枝江县董市镇信用社桂花分社当炊事员,每天挑水、做饭、烧开水、送开水,任劳任怨。她上班让桂花分社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食堂。对来办事的人,她端茶倒水十分热情。不久,她看到猪圈是空的,主动找分社主任要求喂猪。小猪喂了个把月,却不太见长。大兰急得直哭,跑回家找爷爷婆婆“取经”,到处打猪草,请兽医,给猪打虫、改换饲料,小猪渐渐长大了。她见院里有空地,就把从院墙外窜过来的竹根挖出来,把蒿子砍掉,把苑子晒作柴烧,把地整成小菜园,四处种上菜。

她见桂花分社人手少,事情多,业务忙,自己插不上手,于是,就利用空闲时间学业务、练技术。刚开始,她怕别人讥笑,就偷偷地学。遇到不懂的问题,她主动找业务能手请教。她还找主任要来业务书籍,经常带在身边,有空就学。很快,她就能在门市上协助做业务工作了。她利用业余时间到附近农户家组织存款,九个月收储2万多元。



杨大兰以英模为榜样,在内心为自己树立起最真实最朴素的信条,并用心灵去践行事业和创造价值。农村的“双抢”时节,分社放她4天假。她每天起早做了饭,喂了猪,然后赶回家割谷插秧,晚上再赶回分社。妈妈心疼女儿:“放假了,就在家里住吧。”大兰说:“我还要喂猪呢!晚上值班,多个人也多份力量。”当年,桂花分社破天荒宰了年猪,吃“血花”的时候,大伙感谢大兰,大兰一笑,说:“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杨大兰一直很爱写日记、记笔记,在她仅存的笔记中,摘录了歌德的名言:“你若是喜欢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契诃夫的名言:“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还有张海迪的话、唱给雷锋的歌等等。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杨大兰从“名言”中感悟,以英模为榜样,在内心为自己树立起最真实最朴素的信条,并用心灵去践行事业和创造价值。这一切,已成为她人生的注脚。

1989年12月25日凌晨,枝江县董市镇桂花农村信用社,由潘星兰与杨大兰当班值夜,被可怕的闯入声响惊醒,她们急忙起身察看,猛然间,两个脸蒙黑巾的歹徒恶狠狠地扑了上来,将她俩塞住嘴捆住双手。歹徒打不开保险柜,向两位姑娘索要密码。她俩没吭一声,拒绝回答。“好,有胆量!”一个歹徒狞笑一声,扭头吩咐同伴,把她们分开审问。另一个歹徒一把揪起杨大兰,连拉带拽地往外面拖去。来到外间,杨大兰趁歹徒不防备,猛地一头撞过去,将那个家伙顶了个跟头,然后奋力向门外冲去。她要跑出去大声呼喊,叫醒群众起来保护国家财产,捉住作恶的坏蛋!凶残的歹徒已经拔出匕首向姑娘狠狠扎去!杨大兰倒在血泊中……潘星兰也被刀扎得满身是血,但始终没有哼一



声！竟然被歹徒残忍地割下姑娘的一只耳朵。多处刀伤，大量失血，潘星兰终于昏死过去。两个歹徒见阴谋实在无法得逞，只好趁着夜色逃入黑暗之中。但是，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不出三天，两个歹徒双双束手就擒！面对歹徒入室抢劫，杨大兰与潘星兰临危不惧，与歹徒英勇搏斗，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国家财产。杨大兰先后被歹徒连砍九刀，壮烈牺牲，成为刘胡兰式的“巾帼英雄”。

杨大兰的牺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她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媒体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纷纷现场采访和跟踪报道。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为“两兰”题写了“学习潘星兰、杨大兰同志忠于祖国、忠于职守、不畏强暴、无私奉献的优秀品德”的题词。

1990年3月7日，在首都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亲切接见杨大兰的父亲杨尚洪。杨尚洪代替女儿接受了“为国献身，重于泰山”的锦旗。国务院追授杨大兰“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总工会追授杨大兰“金融卫士”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妇联追授杨大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共青团中央追授杨大兰“英雄青年”“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公安部追授杨大兰“保卫国家财产、勇斗歹徒治安英雄”称号。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杨大兰为革命烈士。中国农业银行追授杨大兰“社会主义农村金融卫士”的称号。2017年，“两兰展馆”在枝江市董市镇大兰小学建成，成为枝江市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见义勇为何东旭

何东旭(1990年—2009年),男,湖北枝江市人。何东旭系家中独子,八个月大后便跟着外婆,直到上小学,对外婆一直很孝顺。何东旭从小就爱看书,小学期间,就看完了四大名著。他爱好写作,作文在枝江市、宜昌市以及一些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的作文竞赛中获过奖。在上中学时,曾两度获得“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大奖。

2009年考入长江大学文理学院,系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5091班学生。在校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他极富有正义感,谁有困难,他都会慷慨相助。他平时不爱张扬,生活十分简朴,十分乐于助人,因此与同学关系融洽。喜爱历史,关注国家大事,是个很有朝气的青年。心胸开阔,人缘好,平时喜欢打篮球,是班级篮球队队长。喜欢演讲,多次参加过各种演讲比赛。何东旭是个极其负责任的学生,他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无论刮风下雨,他都每天早上5点55准时起床,组织同学们进行体育锻炼,是一个让老师放心的优秀班干部。平时大家学习很紧张,何东旭看到谁没有时间打开水,都会主动帮助他们把寝室里的水瓶添满热水,同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过他的帮助。何东旭还喜欢魔术,休息时就喜欢变魔术给同学看。

2009年10月24日下午2时许,在荆州宝塔河江段江滩上玩耍的

两名小男孩陈天亮、张志鹏,不慎滑入江中。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5091班、5092班的几十名学生正准备为自编自导的校园励志剧《霹雳阿傻》拍摄外景镜头。何东旭、方招、陈及时等10余名男女大学生发现险情后,迅速冲了过去。因大多数同学不会游泳,大家决定手拉着手组成人梯,伸向江水中救人。很快,一名落水男孩被成功救上岸,另一名男孩则顺着人梯往岸边靠近,并最终获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人梯中的一名大学生因体力不支而松手,水中顿时乱成一团,呼喊声一片。这时,正在宝塔河100米以外的冬泳队队员闻声赶来施救,冬泳队员杨师傅、韩师傅、鲁师傅等人陆续从水中救起6名大学生,而何东旭、方招、陈及时相继沉入水流湍急的长江水底遇难。“10·24”英雄大学生集体“结链”救人的英雄壮举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100多家新闻媒体聚焦荆州,进行了全方位、大篇幅的宣传报道,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

事发当天,宝塔湾畔搭起了露天灵堂。自发前往悼念三位牺牲大学生的市民络绎不绝,千只纸鹤,万朵鲜花,寄托着人们的无限哀思。2009年10月28日,在荆州市第二殡仪馆和长江大学为三名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送来花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特地从武汉赶来为英雄鞠躬送行。在灵车启动后,送行的车队绵延数公里,沿途鞭炮声不绝,有300多辆的士、私家车护送英雄回家。人们说:“这是荆州千年古城史上最宏大最悲壮的葬礼!”国家教育部、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湖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湖北省教育厅,共青团湖北省委,荆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荆州区委及长江大学等发来电唁或送来花圈。开通何东旭的网上



纪念馆,一些无法前往吊唁的人,也在网上纪念馆献花、留言,甚至录音,“永远为你骄傲”“怀念你,一路走好”,大家用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方式对这位有着英雄壮举的热血青年表达追思之情。何东旭被称为是枝江的骄傲、宜昌的骄傲、当代大学生的骄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省长李鸿忠等中省领导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大力宣传、学习“10·24”英雄集体先进事迹。教育部和湖北省委在长江大学举办学习“10·24”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集体先进事迹座谈会。全国各地、各高校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座谈会、演讲赛等各种形式,掀起了学习英雄的热潮。艺术工作者为英雄们谱写了20多首歌曲,在全社会广为传唱。网络上,人们自发展开了讨论,有对英雄的敬意,有对生命价值的反思,更有对传统美德、社会正义的呼唤和颂扬。

2009年10月26日,共青团湖北省委、共青团荆州市委授予徐彬程15名大学生“见义勇为先进青年群体”,追授陈及时、方招、何东旭3名同学“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见义勇为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10月27日,湖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授予徐彬程等15名同学“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英雄集体”,追授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同学“舍己救人英雄大学生”荣誉称号。10月28日,教育部授予徐彬程等15名同学“全国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集体”荣誉称号,追授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同学“全国舍己救人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10月29日,湖北省文明委授予10月24日在荆州长江抢救落水少年的18人英雄群体“湖北省道德模范特别奖”。

2009年10月28日下午,枝江市近万名市民、学生聚集在市殡仪



馆,迎接“10·24”枝江籍青年英雄何东旭回家,枝江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在此为何东旭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2009年10月30日,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10·24”英雄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追授陈及时、方招、何东旭“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11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10·24”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牺牲的长江大学学生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为革命烈士。11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18人为“全省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英雄群体”荣誉称号,追授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人“全省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英雄大学生”荣誉称号。11月27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陈及时、何东旭、方招等抢救长江落水少年的18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群体”光荣称号。12月4日,“10·24”英雄群体当选2009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2009年12月21日,“全国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报告会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共湖北省委联合举办。在京部分高校师生代表近700人参加报告会。报告会上,6名报告团成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集体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深深感染了现场听众,许多听众潸然泪下。90分钟的报告会,共响起45次掌声。报告会开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受胡锦涛总书记委托,亲切看望大学生英雄集体代表和报告团成员,并向英勇牺牲的3名大学生烈士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2010年1月至4月,“10·24”英雄集体先后获湖北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奖、“2009感动中国人物特别奖”“2009中国教育年度新闻新闻人物”集体奖等,并荣登“2009中国好人榜”。

2010年3月29日长江大学“10·24英雄集体”代表和近百荆州市民在长江大学艺术学院大门外种植“10·24英雄集体”纪念林。4月1日,长江大学“10·24英雄集体”纪念像揭幕仪式在武汉长乐园陵园隆重举行,这组纪念像命名为“重生”。社会各界近千人前往长乐园公祭3位舍己救人的大学生。10月24日,长江大学“10·24”英雄集体事迹展览馆开馆。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致电问候“10·24”英雄集体。





英勇烈士章志忠

1928年至1932年期间,徐家花屋为中心的玛瑙河沿岸,数百名革命者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有一次,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蔡家嘴支部书记章志忠不幸落到敌人的魔掌。为了除掉叛徒,保护党组织不被敌人破坏,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用仅剩的两颗手枪子弹打死了叛徒。敌保安团团总为防止他反抗、逃脱,命令团丁穿他的锁子骨。因为没有铁丝,必须用尖刀穿引。面对共产党人章志忠的凛然正气,团丁陈先丙战战兢兢地退下卡在枪管下的刺刀,双手颤抖地在章志忠的锁骨处寻找地方。章志忠见他笨手笨脚,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刺刀,骂道:“没用的东西,白糟蹋了几年军粮。看老子自己来……”说着,举刀穿过锁骨。他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保安团丁瞠目结舌,不敢正视。被敌人刺破双腿肚的章志忠昂首挺胸,大步走在路上,腿肚子淌出的鲜血染红了一路的草……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他只字不说。第二天,他在安福寺找儿岭英勇就义。



妇女运动组织者胡永秀

1926年,16岁的胡永秀嫁到艾家。丈夫艾祖华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除佃地主林白兴的两亩多水田外,还时常带着弟弟艾祖泽给人帮工。六口之家尽管终年劳碌,仍然不能温饱。1928年,胡永秀和丈夫艾祖华、夫弟艾祖泽参加了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农会。他们一家三口经常在夜里参加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农会学习,听共产党员讲革命道理,开始明白穷人缺吃少穿、受苦受难的根源,决心团结起来,闹革命、争自由、求解放。不久,他们三人都参加了农会,每人领取了一块4尺长的红布巾作为标志,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起初,胡永秀的任务主要是秘密串联,发动穷苦乡亲参加革命活动,监视、掌握豪绅动态。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把当地妇女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她。经常和胡永秀联系的上级主要有“大老鲍”“小老鲍”“周叫花子”等。胡永秀晚上挨家挨户串联,团结、鼓励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活动。在她的宣传下,姐妹们明白了争自由首先要放脚,放了脚才能同男人一样闹革命。胡永秀革命刻苦也用心,利用难得的零碎时间向上级派来的联络员学唱革命歌曲,然后教给姐妹们唱,用革命歌声来发动群众。她教唱的歌声通俗易懂,既有亲和性,又有革命感染力,如:

(一)

红军朝前涌,革命气势雄,不怕豪绅耍威风。
红军斗团狗,为的争自由,穷苦农家喜心头。
红军苏维埃,工农召拢来,领导穷人斗老财。
正月是新春,贺龙大将军,带领红军闹革命。

(二)

清早起,拖拖犁,拖起犁儿去耕地。
耕着地,出白米,租课交尽饿肚皮。
打财主,斗豪绅,分了田地自己耕。
自己种,自己吃,饿死游手好闲的。

(三)

妇女们,团结紧,革命也有我一份。
姐妹们,快觉醒,为啥把脚缠得紧。
姑儿们,莫缠脚,咱们坚决要解脱。
放大脚,赛男人,自由平等闹革命。

1930年腊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更加嚣张,在罗家园子杀了不少红军(当时对农民赤卫队的称呼),胡永秀一家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其丈夫的妹夫王培贵,被反动团防抓到横店子天主堂杀害了。胡永秀一家虽然悲痛万分,但是并没有被吓倒,参加革命活动反而更加积极,只是更为隐蔽了。他们积极配合中共地下组织杀了恶霸地主林白兴,给反动团防以极大的震慑。

1932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天一早,董市团



总周莲青的分队长黄振成带着一伙枪兵把胡永秀的家团团包围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将艾祖华、艾祖泽和胡永秀抓住。他们走出村口时，才发现团狗子事前已抓了不少革命同志。抓来的人在游岗示众之后，又被押往高峰寺集中。在众人面前，黄振成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口口声声要把“猫子”赶尽杀绝（当时，土豪劣绅称农会是“猫子会”，骂农会干部是“猫子”）！吼叫了一阵子，他命令部下从带来的乡亲中拉出胡永秀夫弟艾祖泽在内的8个人，一个一个用大刀砍死。瞬间，血流遍地，惨不忍睹。随后，黄振成又命令枪兵把胡永秀丈夫艾祖华和其他20多人押走。

在被抓捕的革命者中，只有胡永秀一个女的，黄振成认定胡永秀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从她嘴里肯定能钓到“大鱼”。于是，黄振成要保长陈香甫将胡永秀带去横店子。天黑下来后，胡永秀蹲在路旁，谎称脚疼走不动。保长陈香甫叫人弄来一匹驴子，把胡永秀驮到横店子，关在天主堂的一间小屋子里。没过几天，黄振成来了，开始对胡永秀进行审讯。任凭反动团丁百般折磨，威逼利诱，胡永秀反正只有一句“不知道”。黄振成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于是琢磨着从胡永秀身上捞点油水。他叫人把豪绅马运甫找去，帮他出主意。马又叫保丁高明圣去胡永秀娘家，要其娘家弄钱赎人。胡永秀娘家人四处求情，八方借债，凑齐76块银洋才将胡永秀救出来。在胡永秀被关押的17天里，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硬是没有向敌人透露丁点信息。

出牢以后，胡永秀无家可归，在娘家呆了一段日子。后来，才知道丈夫艾祖华和林文魁、张全敏、陈光汉、陈光才、陈仁修等27名革命者都在太和场（今安福寺镇太和场集镇）牺牲了。敌人此次清乡，杀害了许多农运骨干，苏区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幸存的同志有的隐蔽下来，



有的被迫转移或随贺龙到湖南干革命去了。

胡永秀参加革命前没有正式名字,随夫叫艾胡氏,为了方便地下工作,有一位家住安福寺名叫“陈光汉”的革命同志给她取名“胡永秀”。丈夫艾祖华、夫弟艾祖泽和妹夫王培贵先后牺牲后,胡永秀含恨更名“胡永珍”,发誓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独自带着3岁的女儿,继续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



抗洪抢险英雄舒德才

舒德才(1955年—1998年),枝江市白洋镇雅畈村人。抗洪抢险中英勇献身的中共党员。

舒德才1975年被白洋镇水利站录用为水利工程师。198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舒德才任镇水利站副站长兼沙湾堤防管理段段长,是白洋镇150千米堤防渠道、11座水库、30座泵站工程建设的技术总负责人。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6月至8月,舒德才一直奔波在长江防汛抗洪第一线,共参加排除险情100多次,51天未回家,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8月7日晚,长江第4次洪峰抵达白洋。深夜23时,舒德才抢险归来刚跨进防洪指挥部大门,就接到垭子村党支部书记龙顺达的电话报警:“向家坝排水闸漏水,大堤出现崩岸。”他放下电话,随即叫上值班司机开车赶到10公里外的险段察看,发现大堤迎水面有一个直径20厘米的漩涡,准确判断险情,制订出“外堵内围、围堰减压”的施救方案,立即组织人员用油布封堵。舒德才和衣跳入滔滔江水中,与10多位抢险队员在激流恶浪里手挽手组成人墙,用脚踩压油布,在江水中浸泡整整8个小时,并指挥岸上1000多人用编织袋装土石填压,一直激战到8日上午7时控制住险情为止。8月初,以前很少生病的舒德才感到身体不适,头昏脑胀,每餐只咽得下拳头大小的饭团,身体日渐消瘦。为了不让人发现,每次开



饭时他总是让别人先吃，自己在值班室坚守电话，等别人吃完后才去厨房就餐。渐至不能正常进食，只能用茶水冲几块饼干勉强下咽。别人劝舒德才去医院看一下，他说：“洪水太猛，人命关天，先挺一挺再说。”8月15日至17日，在迎战第6次洪峰的紧要关头，舒德才三天三夜没合眼，连续工作72小时，指挥排除10多处重大险情。8月18日下午5时，他从大堤回到镇水利站，刚一落座，就用两手按住太阳穴，仅说一句“我的头好疼……”便晕倒在椅上。舒德才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8月20日以身殉职，时年43岁。1998年8月，枝江市委、市政府作出向舒德才学习的决定。9月，宜昌市委、市政府授予他“抗洪功臣”“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舒德才学习。1999年6月，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舒德才为革命烈士。



献身教育的好校长朱政文

生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生命究竟是什么?生命是否就是活着?生命能否跨越时间的隧道?
生命会不会千秋常在、万古不朽?

枝江一中原党总支书记、校长朱政文同志用他43个校园春秋再一次回答了这一古老命题,谱写了一曲昂扬的生命之歌!

朱政文出生在百里洲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5年参加教育工作,1981年春天就任枝江一中校长。那时的枝江一中,荒草萋萋,荒草中横卧着几栋破旧的平房,全部家产不足30万元,74名教师中不达标的占79%。而且,教育质量低下,在外榜上无名县内毫无信誉。

面对如此落后的面貌和落后的办学条件,朱政文没有沮丧。他坚信事在人为。

朱政文从走进枝江一中的那天起,就把目光瞄准了办学质量。

因为他深深懂得,一所学校的优劣,教学质量是硬指标。

教学质量哪里来?

改革,唯有改革才是出路。

在八十年代初,改革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字眼,尤其在中小学校。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人们心中余悸犹存。

然而,朱政文却率先举起了改革的大旗。

是他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打破“铁饭碗”，搬掉“铁交椅”，将“劳酬结合、绩酬结合”的竞争机制引入了学校管理。

是他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结构工资制。

也是他，率先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主体教育思想”，第一次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融为一体，一改教师被动教学生被动学的局面。

仍然是他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在枝江一中创立了一整套素质教育的方法与课程体系。

十八年过去了，十八年里，朱政文总是站在时代最前列，以改革为动力，用改革促发展，使枝江一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统计表明，在朱政文担任枝江一中校长的18年中，累计毕业学生5457人，被大中专院校录取的达4702人。也就是说，每10人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就有9人被录取。其中还有30多人出国留学，成为了祖国高科技领域里的栋梁之才。

枝江一中变了，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在三峡的东大门。从枝江县的“先进单位”到湖北省的“文明单位”，从宜昌市的“双文明红旗单位”到连续两次被评为湖北省的“最佳文明单位”，从1995年被授予宜昌市“示范学校”，到1999年4月23日，也就是朱政文同志不幸病逝后的第6天，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评估被授予“省级示范学校”的光荣称号。几乎一年一大步，三年一跨越，每一次进步都蕴含着朱政文的汗水，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朱政文的心血！

在朱政文的读书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教育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科学最讲真实。”



是的,科学最讲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

无论是在地老天荒的秭归高坪,还是在一马平川的枝江八亩中学,无论是做普通教师,还是担任一中校长,朱政文始终脚踏实地,孜孜不倦地进行教学探索。

朱政文深知课程结构在教学中的位置,他亲自主持修订了新的课程体系,将原来的文化课唱主角转化为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同时并重,让学生在必修课中夯实基础,在选修课中开阔眼界,在活动课中发展个性,培养特长。

朱政文异常重视教育环境在育人中的作用,他将教育环境归纳为“隐性课程”,在枝江一中,他采取有力措施建设了一套以显性课程为主、隐性课程为辅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朱政文深谙制度建设的重要,在枝江一中,他亲自主持制定了110多项、500余条规章制度。上到校务重大决策,下到厨房卫生,人人有权有责,事事有章可循。

熟悉朱政文的同志和朋友都清楚,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育专家。他的专,来自于他的勤奋好学。多少个夜晚,子女睡了,老伴睡了,整栋楼房——不,整个校园,整个城市都已进入了梦乡,但他仍在灯下耕耘。他从古代先哲、从陶行知叶圣陶教育大师的文集中寻找办学思路。从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从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和布鲁纳的“结构发现法”中追索育人途径。他还从现代社会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吸取养料,化作甘霖。朱政文病逝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所做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竟达500多万字,其中《教育随笔》40多本,读书卡片3500张。

这是一笔多么伟大的积累!



当我们面对那厚可等身的学习笔记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瘦削的身影正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跋涉、攀登！

朱政文不仅热爱学习，还善于总结，笔耕不止。他先后在《人民教育》等多家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篇。其中《立论指导与发散思维训练》一文获省二等奖；《中学体育双向目标管理初探》获全国奖。

朱政文的工作业绩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誉，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多次肯定。从1985年开始，各种荣誉像鲜花一样朝他涌来：“优秀园丁”“十佳校长”“劳动模范”“德育先进工作者”“优秀知识分子”“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专家”。1994年被评为中国教育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政文是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更是注入奉献的动力，坚定献身的信念。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牢记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朱政文在枝江一中任校长的日子里，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敏锐眼光，才使他紧跟时代步伐，锐意创新，率先改革；也正是他有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才使枝江一中从落后中崛起，跨入先进行列。

在枝江一中，朱政文自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德治校，德才兼备。识人以德为首，育人以德为先。

什么是德，德就是先进的思想、优良的品质、高尚的情操。

朱政文力排众议，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选拔到了学校的各级领导岗位。

朱政文打破陈规陋习，大胆启用新人，在枝江一中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朱政文始终不忘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全体教职员工,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教书育人职责。

自从开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来,朱政文就把文明创建当作了枝江一中的头等大事。

他亲自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文明创建的先头兵。

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他不断召集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总结经验,寻找不足,出新招,补漏洞,周密构建功能强大的文明创建网。在枝江一中,“文明年级”“文明班级”“文明楼层”“文明寝室”“文明单元”“文明生活区”“文明家庭”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层出不穷。

朱政文坚信,“要成才,必须成人”。朱政文更坚信,作为师表,最重要的教育,就是要用自己优秀的人格去感化别人,影响别人。

只有你具备了优秀的人格,才会培育出具有优秀品格的人。

朱政文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勤政为民。他就像根蜡烛,默默地燃烧着自己,奉献着光明。

1989年,朱政文主动要求把自己的校长职位拿出来让全体教师民主选举。朱政文的这一举措使许多人大惑不解。校长,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但毕竟是一校之长啊!有的人不正在朝思暮想着这个长那个长吗?也有领导为朱政文担心说:你万一落选了怎么办?朱政文微微一笑,说:“万一我落选了,证明我没有当一中校长的资格,一个不够资格的人占据枝江一中的校长位置,那是渎职!”

这是何等的襟怀,何等的境界!

朱政文的人格力量又一次受到了展示和检阅,他以98%的选票当

选为枝江一中校长。

朱政文身为枝江一中党总支书记、校长，每天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很满，但是，他从未离开过心爱的三尺讲台，他总是主动担任毕业班的一门甚至是几门主课。

担任毕业班的主课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来不得半分大意和疏忽。朱政文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学校管理工作繁重而降低标准，他严格要求全体教职员工的时，对自己要求更严。

每一次授课前，他的教案准备得仔仔细细、工工整整。

上了讲台，单是他那一手魏碑行书，就漂亮得叫人赞叹。

朱政文教的是高三语文。朱政文的语文课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新意迭出，妙趣横生，许多教育专家听了他的授课都深深折服。

有人评价，朱政文一辈子魂系讲台。

朱政文说，他离不开讲台，他一离开讲台就心里发慌，不踏实。

1998年4月初，当宜昌市医院确诊朱政文为纵膈恶性肿瘤后，全校上下就瞒着他一个人。老伴胡开珍强忍着泪水劝他说，你嗓子哑了，说话学生们也听不见了，休息几天，等好些了再上班吧！他不，他摇摇头，艰难地说：“不碍事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我口型，再说，我在黑板上多板书一些。”

从确诊到赴武汉治疗，对于高三（8）班的同学来说是一段永生难忘的日子，他们的语文教师朱政文校长带着绝症在给他们授课。朱政文的声音实在是太细太弱了，他怕他的学生们听不明白，不停地在黑板上写着、写着。有时，还把后排的学生叫到跟前耐心地讲解，反复地叮咛。

“听明白了没有？”朱政文拼尽最后一丝气力问他的学生。



学生们无声地点头。泪,止不住一次次涌上来,又一次次咽回去。

朱政文的语文授课深受学生的喜爱。枝江一中的语文单科成绩在全宜昌市连连夺冠。1993年和1994年两年,他授课的高三(2)、三(3)两班语文,高考中平均达103.8分,最高达123分。

朱政文的语文授课经验也得到了教育权威们的关注和首肯。人民教育出版社将枝江一中列为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的试教学校。试教的结果是,被试学生高考中语文成绩在全国三十多所实验学校中属于领先地位。实验组提交的两篇论文被人民教育出版社评为优秀论文,分获一、二等奖。实验组撰写的实验总结报告在全国试教总结大会上宣读,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有人说,朱政文是累死的。

大凡熟识朱政文的人都清楚,他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二十年前,朱政文任八亩中学校长时,他除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外,一个人担任两个班70多名学生的政治、语文和历史三门主课。每周21个课时,每天都是工作到午夜以后才能休息,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备课、批改作业和思考学校工作。朱政文有一个头痛的老毛病。每当头痛病犯了,他就用冷水洗一洗,用冷毛巾敷敷。即使工作了一夜,第二天仍然照常上班。那时候他的家距学校不足半里,但他坚持住校,很少回家。恢复高考后,1979年,一所由七个村子合办的农村中学,70人参加高考,竟有22人被大专院校录取,创造了令人震惊的奇迹。

1981年调任枝江一中校长后,朱政文为振兴枝江一中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每天,起床铃响时,无论刮风下雪,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早锻炼的



操场上。

每天,整个校园都睡了,唯有他办公室里仍然亮着灯。

他患有多种疾病:肝硬化、眼底血管充血、脑血流图异常,但他从未住过一天医院。

他曾经一个月内因为疲劳昏倒了三次,每一次昏倒醒来,吊针一拔,就支撑着爬起身,走进课堂。

他曾经一边输液一边上课、办公,持续了整整10天。

他从来没有寒假暑假,没有节日假日,更没有双休,就连大年三十,吃完团圆饭,又回到校园,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

枝江一中的教职员工们跟他算了一笔账,按他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计算,超常工作时间十万多个小时,合计12500多个工作日,折合正常工作时间41年。

41年啊!比一个正常人的工作年限还要长!其中还不包括他那超常的工作量!生命是有限的,但奉献是无限的。

在这里,生命跨越时间,成为永恒!

朱政文是1998年4月16日前往省城治病的。走前,他上完了高三(7)班的语文早自习,安排好了近三天的工作。他对送行的同事们说:“没事,过两天我就会回来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是他永远告别他挚爱的岗位。

不,他的人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他的心,他的情,他的魂,仍然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坚守。

在武汉肿瘤医院里,朱政文清楚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对到医院探望他的人说,我要抓紧工作。他请人带来了八个高中毕业班的考试卷和各科质量分析报告,他一边仔细阅读,一边用工整的魏



碑字体做批语。5月,当他得知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将到学校检查工作时,在病床上的他对前去看望的校领导提出了13项建议。9月,在他第二次赴武汉治病的头一天晚上,他又与学校领导讨论了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从晚上8时一直谈到凌晨1时。

1999年1月,病重的朱政文牵挂着学校,坚持出院治疗。回到学校后,他拖着病躯,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从1月出院到4月病逝,他共向学校提出建议22条,都被采纳。他还分别找教师们谈话,殷切希望教师们支持学校现任领导班子工作。2月,当他得知省政府督导室将于4月中旬来校进行省级示范学校评估验收的消息后,他兴奋极了,用了两个多小时与几位学校领导讨论迎评工作。4月16日中午,已经病危的他仍在关注着学校的评估验收,用最后一丝气力询问了学校的准备情况。

4月17日中午,弥留之际的朱政文,带着满腹遗憾对老伴胡开珍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啊!”

朱政文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开后,数以千计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枝江殡仪馆,自发地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他们当中,有宜昌市、枝江市的领导,有枝江一中的教师,有枝江一中的学生家长,有全国各地毕业于枝江一中的学生,甚至,还有许许多多与朱政文仅仅相识或者不相识的人。一位名叫李曼青的中学教师,与朱政文素昧平生,她一连三天佩戴黑纱,主动为朱政文守灵。一对盲人夫妇,拄着拐杖从遥远的乡下摸索着来到朱政文的遗体前嚎啕痛哭……

他们是为朱政文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是为朱政文的品格所折服,在他们的心里,朱政文永远是一座灯塔,照耀着人生的航程。

一位老年教师说,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朱校长的公正。



在枝江一中,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殊公民,人们可以和校长平等地讨论学校的发展规划,也可以激烈地争论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教师因上班迟到了5分钟,被毫不客气地扣掉了当月奖金,而朱政文因为处理公务延误了上课时间,他主动地找到主管考勤同志,扣去当月奖金50元。

一位中年教师说,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朱政文的廉洁。

在朱政文任枝江一中校长期间,相继修建了教学楼、办公楼、大会堂、科技馆、图书楼、学生公寓等各类建筑物15栋,总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固定资产投入一千五百多万元,每个建设项目他都采用公开招标的办法确定承建单位,签订承建合同。一位叫章光大的建筑工程师敬佩朱政文的清廉,慨然出资10万元,在枝江一中设立了“光大奖学基金”。

朱政文从不接受吃请,即便是学校因公接待客人,他也绝少陪客。当枝江一中高考连连夺冠、声名鹊起后,要求进入枝江一中校门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一律照章办事,他给老伴和孩子们下了一道严令:凡是手中提有东西的,不管是谁一律不准进门。就连有的学生为了答谢他送来的礼物,他也一一折款,托人捎去。

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朱政文的无私。

朱政文可以不管自己的家事,可以不顾自己的病痛,但别人的危难他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一位名叫杨启嵩的教师英年早逝,朱政文亲自料理丧事,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一位名叫吴德昶的老师身患重病,朱政文陪他到宜昌市医院动手术,并亲自从武汉联系最好的医生。



一位名叫许德华的学生家境艰难,朱政文得知后,一方面救助他,派人走访慰问他的家庭,送食油、送大米,一方面亲自谈话,鼓励他贫而发愤,引导他积极进取。

为了解决枝江一中教师们的家属转非和子女就业,朱政文不知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然而,他自己的老伴却始终没有职业。凭朱政文的贡献和资历,按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应该说,只要朱政文愿意,给老伴找一份工作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每当老伴提及此事,他总是说,别急,我是校长,我要首先考虑别人。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老伴的黑发盼成了灰发,想找一份工作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就在朱政文病倒的前几天,他对老伴说,你想参加工作的事就算啦,我退休后有退休金,我们两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谁知道,仅仅过了一年,还没有退休的他竟然丢下老伴去了。

朱政文走了,他实在是走得急促,走得匆忙。不仅他的老伴在呼唤他,枝江一中的一千多名师生也在呼唤他,枝江五十多万父老乡亲都在呼唤他,他走得太早太早了,他有几十年治学的体会还没有系统地整理,他有几十年管理学校的经验还没有认真总结,他还有很多理想没有实现,他还有很多遗憾没有弥补……

然而,他把精神留下了。他对事业的忠诚,他对工作的执着,他的铮铮风骨,他的无私奉献,就像一棵四季长青的巨树永远活着,活在我们身边,活在我们的心里。



拥军模范毛成秀

毛成秀,女,194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中专文化,湖北省枝江市农业银行工会干部,政工师(已退休)。曾在教育战线工作20多年,她热爱本职工作,成绩突出,曾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文教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为巩固国防、支持部队建设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她作为一名普通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以一颗慈母之心,常年累月利用业余时间、节假日、星期天到乡下走访,利用到外地出差之机,到医院、到部队慰问人民子弟兵。这些年来,她与河南、山东、四川、北京、湖南、广东、广西、内蒙古、新疆及本省等29个省、市的5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建立了联系,为18名军人找到终身伴侣;走访慰问多个烈军属、退伍军人;为75个部队和400多名指战员、烈军属解决过具体困难,花费现金和物资折款65000余元;40多个春秋,她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写下了3000多封信件,飞往75个部队,为战士释疑解惑,指点迷津,点燃了一盏盏希望之灯;40多个春秋,她积积攒攒积累的是一叠叠厚厚的车船票,记录了她不可磨灭的人生轨迹……40多年的慈母之爱,40多年的恋兵情结,着实令人钦佩、可歌可泣。人民子弟兵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慈母的名字——毛成秀。

她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由于她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自觉拥军,无私奉献,在湖北、宜昌、枝江取得了良好成绩,宜昌市首先跨入“全国双拥”模范城行列,枝江市年年被评为省级“双拥模范市”。她本人于1984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军区授予“拥军模范”光荣称号;1984年8月出席了全国“双拥”代表大会,荣幸地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胡启立、王震等。1990年3月,被中国金融工会授予“全国金融系统优秀女职工工作者”称号,1992年7月27日被民政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容声杯”全国百名拥军优属模范之一,其事迹被编入《情系长城》《全国百名拥军优属模范风采录》。1997年被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拥军优属”模范个人。1984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军区、省军区授予“拥军优属”先进个人称号。曾多次被市委、市政府、市人武部、市民政局评为拥军模范、宜昌市十大新闻人物、国防“百佳十面旗人物”之一。其事迹得到中央电视台,湖北省电台,宜昌、枝江电视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战斗报》《战士报》《工人日报》《宜昌日报》《三峡晚报》《国防教育报》等多家新闻单位的宣传报导。

她把祖国的安危与个人的幸福紧密相联,把做好爱国拥军工作作为毕生追求。

在毛成秀做“双拥”工作的生涯中,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她有欢乐,也有苦衷,然而,她硬是挺过来了。她凭着她对军人的满腔热情,对国防事业的执着追求,负重如牛地耕耘40多年。这贵在她有“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坚定的信念;贵在她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贵在她听党的话,听人民的话。的确,有人对她“双拥”不理解,觉得她是多此一举;有人说她是逞能,认为是图名图利;有人说她笨,傻,划不来……面对风言冷语,她毫不在



乎,始终咬定一个道理:“拥军不错”,为此,她感到心里很坦然。

毛成秀把国家的安危与个人的幸福紧密相联,把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作为毕生追求,这已被事实所证实,被人们所公认。要说图名图利,她14岁就开始拥军,当时她根本还不十分清楚“名”和“利”的含义,到了70年代和90年代初,她光荣地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接见,被评为“全国拥军模范”,应该说功成名就了,可她现在仍坚持做“双拥”工作,毛成秀也不傻,更不憨,她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她的行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的展现。

毛成秀对拥军工作那么执着,那么专注,但她从不满足。那一本本烫金的荣誉证书,记录了她与子弟兵结下的鱼水深情,那一面面鲜艳的锦旗,一枚枚闪光的勋章,展示出她拥军路上的光辉业绩。时代变了,战士对她的称呼在变。50年代,战士称她“小妹妹”,60年代称她“大姐姐”,70年代称她“军营外的指导员”,80年代称她“毛妈妈”,现在称她“毛奶奶”了。从青丝到白发,战士对她的称呼在不断改变,但她拥军的拳拳之心始终没变。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毛成秀,这位军营中所熟悉、社会上广为传颂的拥军模范,多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纯洁党性,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名,不求利,以她一生不懈的追求和满腔热血谱写她亮丽多彩的春秋,照亮鼓舞着身边的人们,为党旗争辉,为国旗添彩。



抗洪英雄邹开清

天地含悲,江河流泪。

公元1998年8月15日凌晨,一位优秀的基层水利干部——湖北枝江市江口镇水利站助理工程师邹开清,在与长江特大洪峰搏击了41个日日夜夜之后因疲劳过度,突患脑溢血病,永远倒在他那宁死也不肯离开的岗位上,用生命书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抗洪壮歌。江口镇举行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追悼会。惊闻噩耗的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恸哭哀悼这位人虽远去但忠魂犹存的抗洪勇士……

在倒下的一刹那,他手里还抓着询问汛情的电话。临终前,他仍在说:“扶我起来,我还要上堤……”

8月14日,已连续在长江大堤上奋战40天的邹开清,又要上堤了。镇水利站站长淡昭华见他近来脸色黑沉,时常虚汗淋漓,知道他准是有病在身,便“命令”他休息一天。

谁知,邹开清没上堤防却守在了电话铃声不断的值班室里。15日凌晨1时左右,当班员蔡直权发现邹开清胸口疼痛难受,表情异常痛苦,便劝他躺下休息。但邹开清硬撑着,又接了几个电话。1时20分,上了一趟厕所回来的邹开清再也支持不住了,踉踉跄跄地走进值班室,一只拖鞋掉在门口,他想去捡却力不从心。没等坐下,他又艰难地



抓起电话询问江口段的水情和堤防汛情。刚说了两句,他一头栽倒在桌子下。蔡直权吓得一跳,赶紧抱住邹开清,大声呼喊:“来人哪! 快来人哪!”

闻讯而来的副镇长魏生权、镇政协联络处主任时永国、镇派出所副所长方光明等,疾速用车把邹开清送进枝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甘长明立即组织抢救组,实施输液输氧。

此时,邹开清的伸张血压高达300毫米/汞柱,病情万分危险!“一定要尽全力抢救!”火速赶到的镇长方斌几乎用哀求的口吻对医护人员说,“他是我们的抗洪功臣啊!”

这时,神志已变得模糊不清的邹开清,吃力地睁开眼睛。他看看守在病床前的人们,断断续续地说:“我没事……快扶我起来……我还要上堤……”说着就失去了知觉。

凌晨3时25分,邹开清那颗为抗洪抢险超负荷劳累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在守堤的41个昼夜里,他睡觉时间不足24小时。一个多月来,他与妻子没说上三句话……

童孔英是一位无比坚强的女性。可她怎么也无法相信,丈夫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突然离去。

在邹开清的遗体前,童孔英悲痛欲绝。她哽咽着对记者说:“一个多月没和他说上三句话……他日夜守在堤上,没回家过一次夜……就是在站里值班,隔家只有4层楼梯,但他也不上楼……”

她怎能不悲痛欲绝呢?就在邹开清临终前的8月14日晚上9时许,童孔英还看见丈夫守在值班电话旁做记录,她从面前走过都没打扰他,因为她知道丈夫实在太忙了。



镇水利站有9人,但精通水利技术的只有站长和邹开清。他们担负着全镇3.2公里长江大堤巡堤查险的重任。从7月初进入主汛期以来,邹开清便成了长江堤上最繁忙的人。

魏生权悲痛地说:“防汛抗洪40多天来,邹开清睡觉的时间不足24小时,几乎是日巡夜守,从不间断。巡堤回来又帮助值班。实在太困太累了,就铺个编织袋倒在堤坡上躺一会儿,或坐在值班室的沙发上打个盹。”魏生权说,“其实他血压一直很高,自己偷偷到医院拿过几次药,医生再三劝他休息治疗,不能熬更守夜,可他从来就没向任何人提起过……”

邹开清不向人提起的事何止这一点?就连在抢险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壮举,他也从来只字不提。

一个多月来与他同吃同住同守堤的江口镇武装部部长肖家明动情地说:“邹开清是平凡人中最不平凡的一个。”

那是7月2日晚也是长江第一次洪峰来临的时刻。谭家河堤段堤外崩坎,堤内约40米翻砂鼓水。在家值班的邹开清听到巡堤人员的报告后,直奔险段。赶到后他制订紧急处理方案,组织人员奋力抢护,终于使不断恶化的险情得到控制。从此,邹开清定守在这个险段,一定就是20多个昼夜。站里领导见他太辛苦,提出换他回来,可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水利干部发挥作用的时候,我怎能退下来呢?”那段时间,天空时时暴风骤雨,江水常常跳涨跳落,守堤难度大,险情出现多。邹开清死盯住险情的每一变化,随时报告,随时抢险,使这个重险段迎送了一次又一次特大洪峰而安然无恙。在守堤抢险最紧张的日子里,他吃的是自带的方便面,啃的是廉价的饼干……

抢险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头。7月17日,东湖闸内港发



生2处翻浑水带砂管涌,水下砂盘直径达1米,高度达0.3米。邹开清闻讯,迅速赶到现场,与其他技术人员研究了处险方案后,跳入3米多深的发黑的污水中,组织劳力艰难地构筑水下导滤围井。连续激战8个多小时,这个长江第二次洪峰期间枝江境内最大的险情得以排除。次日,已三夜未合眼皮的邹开清又赶到谭家河外堤崩坎150米的险段。他跳入滔滔江水中,摸探险情,抛石镇脚,一战又是6个小时。

由于在浑浊的江水和港水中浸泡时间过长,邹开清身上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和疮,他却顾不得去医院打针吃药。

41个日日夜夜,邹开清与干部群众一道查险处险13处,确保了长江大堤迎战超1954年特大洪水的安全。

在43年短暂的人生中,他用无私奉献,用血肉之躯诠释了一个人活着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邹开清短暂的一生,是只知奉献不求索取的一生。

8月15日,记者走进他两居室的家。家里几乎没有丁点的现代气息,几件老式简陋的家具,把本来十分拥挤的房子变得更加狭小。床上的一顶蚊帐上,竟有大小补丁20多个。童孔英说:“他留下的遗物除了几本记事的本子还有1000元的欠款……”

邹开清上有70多岁的母亲,下有读高中的儿子,妻子所在的砂石厂两年多工资分文未发,入股进去的1.3万元全部家产现在被洪水卷走。全家仅靠他400多元钱的工资生活,可他从没感到“吃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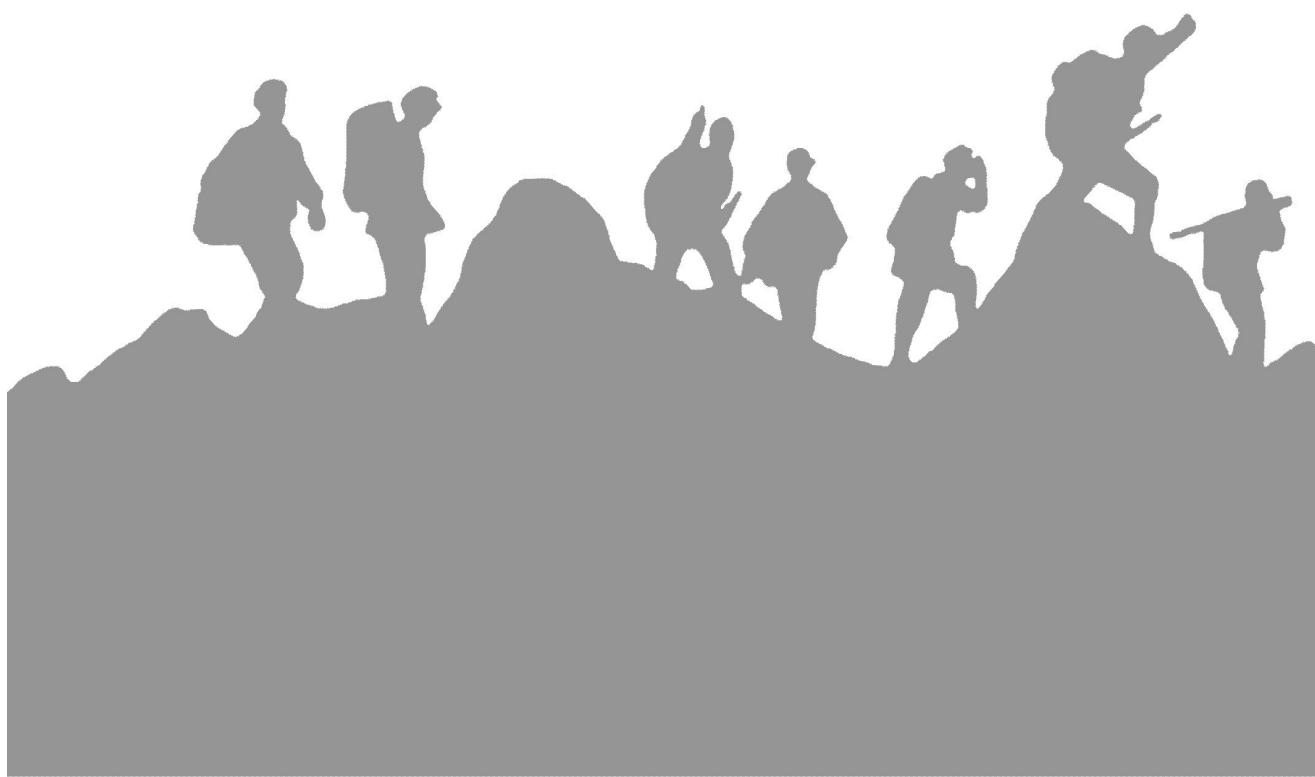
邹开清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水利技术骨干。1990年,他被江口镇委、镇政府点名从石岭水库要来,负责全镇的水利技术工作。尽管他从工作到转正经历了11个年头,尽管他一直身兼数职,但直到1992年才聘干,可他从没发过一次怨言,向组织提过一次要求。

从1996年冬季开始,邹开清承担了十里店、友谊、灵官庙等村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他每天工作在10个小时以上,开沟挖渠,培埂整田,样样带头干,抢着干。他和乡亲们艰苦创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全镇第三期万亩农业综合开发一次通过国家、省、市三级验收,成为“示范片”。

邹开清走了,可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和他那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精神,正激励着长江两岸昼夜抗洪抢险的千千万万军民……



★第三篇★





李先鎡与李先兵的革命故事

李先鎡(1907年—1931年),字鑫臣、利生,乳名宽心,枝江市百里洲镇坝洲村李家湾子人。

李先鎡家境殷实,幼年即入私塾,后到枝城、江口、荆州、鄂西施南求学。求学期间,接受新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李先鎡回到家乡百里洲,经中共地下共产党员周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枝江早期地下党组织“鲍文清支部”的骨干成员。他在坝洲尾子李氏家庙高山寺以教书先生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组织成立地下农会、妇教会、青年团等组织。白天在庙里教书,晚上在李家湾至鲍家河、偏洲林家埡一带的高粱地、芦苇荡、老树林里,组织农会、妇教会、青年团等骨干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发动各进步组织骨干成员在百里洲广大贫苦农民中,宣传中共政治主张,宣讲革命道理,经常夜里在地主家门口张贴“有钱人不要笑,没钱人不要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地主,均分田地”等宣传标语。

1930年2月16日(民国19年农历庚午年大年三十)夜里,县保安团团总黄凤麟带领30多名全副武装的团丁到百里洲企图围捕李先鎡。李先鎡在同志们的掩护和老百姓的帮助下,连夜渡江北上。到安福寺地区后,李先鎡担任中共松枝宜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底,李先鎡在安福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他拒不投降,



在瑶华太和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李先兵(1910.04—1980.02),原名李承志(智),枝江市百里洲镇葵兴村人。

1930年,李先兵完成小学学业,因思想进步,抨击当局黑暗统治,而被国民党当局限制升学。为实现报国夙愿,1931年,李先兵用族侄李先镔(革命烈士,1931年牺牲)的小学毕业证报考了省立荆州第八中学。入学后,李先兵将自己的名字“李承志(智)”改为“李先镔”,不久,再将“李先镔”改为“李先兵”,意即继承先烈遗志,誓做革命先兵。从此,“李先兵”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征程。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李先兵在省立荆州第八中学主编《拂晓文艺》,宣传进步思想,呼吁社会改革,唤起民众抗日,在荆沙一带学生中很有影响。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各地学生纷纷响应。李先兵被选为“荆沙学生联合会”主席,组织和领导同学们上街游行,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并到沙市码头日本领事馆前示威。1936年1月,李先兵组织学生罢课,反对亲日派头子杨永泰任湖北省主席,“拒杨”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36年3月,校方以“破坏教学”为由,将他开除。

离开省立荆州第八中学后,李先兵又先后在上海正风中学、武汉育杰中学读书。1937年,李先兵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他们组织抗日救国歌咏队从武昌沿长江到黄石,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5月,李先兵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回到枝江,先后在江口小学、董市小学任教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江口、董市、刘巷等地秘密设立工作团分团部。这期间,他组织从省城、荆沙、



宜昌等地回乡的学生开展驱逐百里洲反动区长郑斗南的运动,迫使郑斗南下台。1938年夏,李先兵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生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李先兵在江口、董市一带发展党员,动员群众,利用社会关系组织革命武装,动员青年农民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枝江县当局发现了李先兵等的革命活动,通令全县停止录用李先兵,并将其赶出枝江县境。在敌人的迫害下,李先兵只得离开枝江到重庆,在中华大学读书。1939年底,根据党组织指示,李先兵、周绍汉等再次返回枝江百里洲,准备拉起抗日武装渡江北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0年8月,周绍汉在枝江宝筏寺惨遭日寇杀害,枝江抗日敌后游击战争受到重大影响。

1940年底,李先兵在中共地下交通人员的帮助下,辗转到钟祥县石牌地区,参加新四军第五师襄西独立团,开始了其戎马生涯。

李先兵到襄西抗日根据地后,任新四军第五师襄西独立团政治宣传科副科长。1942年调十四旅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943年3月,任第三军分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43年秋,任第三军分区直属教导大队政委。1944年春,襄南地委决定李先兵任路南县委书记,率襄南三团和三十三团,开辟汉宜路南地区(包括沙市以西、宜昌以东、长江以北、汉宜公路以南地区)。他带领一部分部队活动于沮漳河两岸,配合中共荆当县委开展对这一地区的几股土顽的统战工作,在江陵的双冢祠、当阳的草埠湖、枝江的风台等地建立抗日政权。1945年初,李先兵任襄南军区教导团副政委,培养和轮训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和地方干部。1946年6月,已调至中原军区干部大队的李先兵随部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在王家店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至



鄂西北,后调十五旅在武当山一带活动,旋奉命转移至陕南第五军分区,创建秦岭中部根据地。1947年2月,在中原局党校任教育科长,是年6月,调十二纵队三十八团任政治处主任。1947年底,李先兵随部队重返襄西支队,开展开辟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共荆(门)钟(祥)宜(城)县委书记、中共江枝宜(江陵、枝江、宜都)县委书记。1949年5月,中共江枝宜党组织分开建设,枝江单独设立县委,李先兵任中共枝江县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兵任第一任中共枝江县委书记。1951年,李先兵调任宜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宜昌日报》社社长。1952年调北京,先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宣传组组长、文化教育组组长,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副馆长,文化部民族文化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2月,李先兵同志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

为了人民的解放

1910年,我出生于枝江县百里洲,本名李承志,在江口小学读五年级时,拿侄儿李先滨的小学毕业证报考荆州八中,从此就用了侄儿的名字,先用“滨”,次用“宾”,后一直用“兵”。

1926年,北伐军到了我们县,县里成立了枝江县党部,宣传北伐军的政治主张,我参加过多次群众集会,印象很深。

抗日初期,枝江有些青年在武汉求学,我和周绍汉也在武昌育杰中学读书,同乡吴先琳就读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周绍汉很勇敢,他经常组织我们搞街头宣传,还成立了抗日救国歌咏队,到中华大学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7年10月,周绍汉经抗日民族先锋队介绍,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我和吴先琳与周同往,在一个学习小组。后来周绍汉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我和吴先琳则一道返回枝江。通过江口小学校长谈畅轩的帮助,我在江小任了代课教师。

我回江口后,做了两件工作。一是组织抗日救国工作团。当时在江口董市刘巷等地均设有分团部,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的大政方针,但只搞了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了。二是组织“驱郑”运动。百里洲区区长郑斗南为非作歹,百般阻止抗日救国运动,我们发动从省、荆、宜等地回乡的学生一百多人,到县府礼堂坐堂请愿,要求撤销郑的



职务,最后逼得国民党下令撤换。

1938年秋,经吴先琳、杨国民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是在县城后乡的树林里进行的。先琳同志拿出一本《列宁选集》,封面上有列宁的头像,她把书放在树杈上,引导我念了入党誓词。“驱郑”胜利后,接替郑斗南任区长的黄少林要我任刘巷区民众教育馆长,我没干。1939年上半年,我到董市小学任教务主任。这年6月,董小校长张慎先去世,董市商界一些人上县,要求我当校长,当局不仅不同意,还命令全县对我停止录用,并加强了对我的监视。

1940年,地下党组织送我到襄西抗日根据地。在襄河边的钟祥县石碑找到了新四军。开始分配我到15旅45团任曹一清团长的秘书,不久任该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旅部过襄东后,任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后随15旅开辟襄南,任教导大队政委。1943年春,我奉命前往潜江作国民党军3旅7团团长李正乾的策反工作,促使他于5月23日晚带领全团起义过来受编,和我们的部队一起混编为三个团,成立襄河纵队,我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1944年,襄南地委书记兼襄河纵队政委张执一命我带纵队3团、襄西33团,去开辟汉宜路南地区,并任路南县委书记,两个团在汉宜路北会合,分两路进军。我带33团直插双冢祠。3团过漳河抵达问安寺,最后两团在问安寺一带会合,活动于沮漳河两岸,开展对赵益之、施昌直、刘筱岳三股土匪武装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同时,我们还在双冢祠、草埠凤台等地相继建立了乡政权,从而粉碎了日军企图在这一带设立据点,控制沮漳河两岸的阴谋。不久张执一同志令我回襄南,任分区教导团副政委。

1946年中原突围时,组织安排区乡干部复原回家,县团以上干部



随军突围。我随15旅44团去武当山,后又跟旅长王海山过陕南,开辟秦岭中部地区。不久,奉命到老8团任政治部主任。中原局建立党校时,调校任教育科长。突围部队整编,又调到二野13旅39团任政治部主任,随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途中在武松打虎的地方阳谷县集结待命。过了几天,陈毅同志率三野途经阳谷,我们便随三野渡过黄河,歼灭了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快速纵队,并乘胜打过陇海铁路,完成了牵制敌人,让刘、邓大军站稳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在过黄河前后,陈毅同志给我们讲过话,接着他率部东进,我们则南下大别山,在花家河与刘邓大军会合,邓小平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中心内容是关于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

1947年初秋,上级动员原五师干部转入地方,将38、39两个团划为地方部队,并将县团级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在大别山试行土地改革,我参加了这个工作团。紧接着组建江汉军区党委。以大洪山茅茨畈为活动中心,我们就在这一带搞土改。后来军区组织襄西支队,我又随支队到襄西,建立了荆钟工委,我任工委书记兼襄西支队政委。不久,上级调来蒋占义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另派我开辟枝宜地区,属荆当县委统一领导,我任荆当县委副书记兼江枝宜县委书记。

1948年冬,我们江枝宜县委一班人先到殷家巷子、穿心店、双冢祠一带活动,建立了江枝宜第一区,区书记兼区长张美举。接着,到沮漳河沿岸的风台、草埠一带,建立第二区,区书记王友祥,区长万仪,副区长曹安玉,区中队长刘丰慧,中队指导员韩尚贵。在半月山一带建立第三区,区书记杜万福,区长王小平。第三区建立后,我带一个连的兵力和赵必扬一道围攻了国民党维新乡公所,缴获长短枪27支。随即以新场地区为主建立了第四区,区书记林春生,区长赵佩箴,副区长赵



必扬。不久,国民党江口自卫中队长淡功颖率部起义投诚。当时,国民党重兵驻汉口,我们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多次与淡联系,使其将一百多条枪拖出受编。后因情况恶化,敌加派重兵妄图保住长江防线,我军奉命有计划地撤向汉宜路北。我们在安福寺一带活动时,又同隐蔽在安福寺附近肖家庙教书的邹开锋同志接上了关系。经邹开锋、徐国炎等同志做工作,加上大好形势的感召,安福寺自卫连连长梅斗南、副连长杨佩三拖出几十号人和枪起义投诚。至此,我们基本上控制了江枝宜地区,为大军横渡长江奠定了基础。这时我们所作的工作是:扫除土匪武装,建立和巩固区乡政权,为大军筹集粮食,准备船支,并随时提供情报。如当时国民党董市镇镇长张友谊,就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我们的侦察员就住在镇上,一有情报就送过来了。

1949年6月,江枝宜分开建县,枝江单独设立县委,我任书记,县长陶君彦,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贾平,组织部长许超,城工部长朱玉衡。7月,县委机关进驻江口镇,随即成立枝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主任,陶君彦、邹作盛任副主任。军管会命令国民党枝江县副县长阎西陵限期缴械投降,并把命令信送到百里洲。在规定的时限内,阎派人带着武装到江口缴械,他本人也渡过长江向军管会报到。7月17日,四野35师从白洋南渡长江解放枝江县城。

(李先兵)



转战襄西的峥嵘岁月

【人物简介】

朱玉衡,男,1917年1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岑河口,学名朱德远,后改名为朱守洪。1942年,又改名朱玉衡。1939年1月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参加岑河口区委举办的党员短期训练班学习。5月,任岑河区委宣传委员。曾任岑河口区委书记。1942年,任荆门县路东区委书记;同年6月,调任江枝特区任区委书记。1949年5月,任枝江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1952年7月,任枝江县委副书记。1953年6月,任枝江县委书记,1955年1月调离。后从湖北省检察院离休。

因捕杀汉奸土匪而被逮捕,遭到严刑拷问,受尽摧残

1917年1月9日,我出生于江陵县岑河口。

在我的房族中,有个比我年长的侄儿朱贤科,1930年参加红军,当过连长,长征到过陕北,负过伤,1937年复员回家。1938年,党组织派彭祥麟、陈克东两位同志和朱贤科联系,在我们那里发展党的组织,从事地下活动。

1939年1月9日,是我22岁生日。那天,经过朱贤科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是秘密举行的,在场的只有陈克东、朱贤科和我3个人。陈克东手拿一本书,书上有马克思的头像,我就在这



位导师像面前宣了誓。这年的三四月间,我参加了岑河口区委举办的党员短期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领导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民运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为打游击做好准备。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到训练班集中学习,印象很深。

1939年5月,我参加了岑河口区委,区委书记是王锦章,区委组织委员是段振经,我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军事委员是朱吉耀,区委民运委员是范云门。当时,区委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这个地区的保乡会民运工作。保乡会的宗旨是“除奸、防匪、抗日救亡保家乡”。我们在岑河口万寿宫召开区保乡会的成立大会,声势很大。

保乡会成立后,区委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保乡会的活动也很出色。武汉沦陷后,日寇继续西侵,汉奸、土匪乘机而起,人心惶惶,社会不得安宁。1939年7月,为打击汉奸、土匪的嚣张气焰,区保乡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捕杀了一些汉奸、土匪,人心大快。可敌人却怀恨在心,当地恶霸地主刘希根,利用宗派关系,暗地里阴谋策划,不久,区委军事委员朱吉耀在北九甲被人杀害。这年10月的一天早晨,国民党以“保乡会为匪”的罪名将我逮捕。关押期间,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问,受尽摧残,但我毫不动摇。经组织多方营救,于1940年2月获释,这是我入党后经受的第一次考验。

用仅有的两支步枪,缴获了敌人长短枪30余支

1940年10月,组织上通知我去鄂豫边区党校学习。党校设在小花岭,属大洪山脉,校长由李先念同志兼任。到党校作报告和讲课的除李先念同志外,还有五师政委陈少敏、组织部长杨学诚、宣传部长吴家貽、民运部长夏忠武、“七·七”报社社长谢文耀等同志。

这期党校学员有近三百名,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都在稻场上上课,坐背包,书和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完全是军事化的生活。1941年的春节,我们在党校度过。离家过春节,这于我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敌人的牢房里过的,那时是阶下囚,第二次是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其感受无法形容。在党校学习尚未结束,因工作需要,江陵县委提前要我回县。

1941年春,我离开边区返回江陵后,参加了县委在天西渔南(天门以西、渔河以南)抗日根据地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公开举行,李先念、陈少敏等边区首长到会讲了话。为防止敌人扫荡,也转移过地点。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精神,深刻认识了皖南事变中的右倾错误,总结了我们的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布置了开辟江陵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会议结束后,我仍回到岑河口区。当时,岑河口区委书记是王玉障,我任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区委所在地已被日寇占领,往东纵横二十余里的地方,过去是苏区,有群众基础,有革命传统,兼之湖沼甚多,地形复杂,县委打算依托这块地方开辟抗日根据地。为此,必须首先解决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李品月这支只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武装,拔掉这颗“钉子”。

自卫总队内部有我们的同志。总队副队长简舜卿是个民主人士,他的老婆生了孩子,有天晚上,他请总队长李品月、总队副队长陈北扬吃喜酒。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组织了一个行动队,深夜摸到这股反动武装的驻地,先缴了哨兵的械,睡梦中惊醒的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我们用仅有的两支步枪,缴获了敌人长短枪30余支。当我们再赶到简家时,李品月、陈北扬等人还在他家划拳唱京戏,饮酒作乐。我



们的突然出现,让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齐束手就擒。我们把李、陈二人拉到一面山坡上,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就地枪决,为民除了害。

这期间,我们多次同日伪军开展斗争,打击汉奸走狗,着手在敌占区周围建立政权,把敌人孤立于据点之内,使得日寇汉奸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的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不久,王玉璋同志调走,我任岑河口区委书记。

1941年8月初,国民党行政专员兼江北游击总队指挥林兆尧纠集反动势力,并勾结日伪军从东、南、北三面大举进犯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先向内地后撤,随后组织反击,这次战斗在夜间进行,经过短时猛烈攻击,打退了敌人。拂晓时,敌人组织大股兵力分三路对我根据地合击,所到之处,先抢后烧,几十个村庄几百户房屋被烧毁,群众被捆绑吊打,被抓走者不计其数。在敌众我寡、日顽夹击中,县、区干部和独立营约百人,隐蔽在莲花坑荒湖中。县委决定由宣传部部长杨知时率主力突围,留下坚持的人分三片活动,我和区委干事童年甲在南边一片。之后,敌人分割进剿,各片失去联系,我和童年甲被逼进木家坑荒湖中,被包围了一个多月,未吃过一餐饱饭,未睡过一夜好觉。我们商定,先让童年甲到长江边日占区农村岳父家找关系隐蔽。之后,在一个晚上,我将匣子枪和一支撇把枪埋在湖边一个荒台上之后,由我的母亲引路,从湖中上岸,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陈龙坞在三姨母家隐蔽下来。后来,通过一些单线,才与陈龙坞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42年春节后,我奉令调到襄西,地委组织部长吴云鹏把我介绍给荆门中心县委书记李纯斋,他告诉我,县委决定要我担任路东区委



书记,他还讲到,换个新地方,有时需要换个名字,并给我改名朱玉衡。

路东区委班子,除我以外,都是本县人,人熟地熟,工作很方便。襄西地委领导同志李守宪、刘真等常来路东区活动,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

争取赵益之匪部,由于准备条件不成熟,最终失败

1942年6月,我被调到地下党江枝特区任区委书记,曾昭荣、邹开锋任区委副书记。当时,上级党组织交给区委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组织审查。1939年,上级党组织曾认为这个区的部分地下党组织有不纯的问题,被放弃过,现在要特区委进行审查。二是做争取日伪军赵益之部的工作。

这个区的党组织,共有9个党支部,百余名党员,分布在江陵、枝江两县境内,多是1939年前后发展的。这里是沦陷区,江北日军据点林立,也有伪军。江南为国民党军队防线,隔江对峙。土匪较多,主要有两股,郑家良和赵益之。郑家良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江北的重要头目,对我抗日根据地常有侵犯,为害极大。郑家良为扩大其势力,总想吞并赵益之。大鱼吃小鱼、狗咬狗之争时有发生。赵益之不敌郑家良,就投靠日军,编入日伪军司令部,借此与郑抗衡。当我们争取赵益之时,他常说 he 投靠日军系郑家良部所逼。

我来特区时,邹开锋同志已被组织派往赵益之部,他与赵是同学关系,赵要邹任参谋长,为了便于工作,经组织研究同意了。我们不仅要争取赵本人及其上层人员,也要秘密做士兵的工作,利用赵郑之间的矛盾,以赵制郑,打击顽固势力。为了加强此项工作,特区委曾先后派十余名同志到赵部协助邹开锋同志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上级交给我们的两项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组织审查是逐个进行的,除个别党员有些消沉外,多数党员组织纪律性是好的,工作积极肯干,少数党员推不动,原因是胆小怕事,觉悟不高。

争取赵益之的工作也颇见成效,由于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以赵制郑,打击了郑家良为首的顽固势力;二是争取了赵部和日伪乡政权中的一些上层人士;三是赵益之接受了我方支队长的委任令。委任书由人称田胡子的政治交通员田国发同志从襄西带回送到赵部,赵益之欣然受命。为表诚意,他还赠送我方一千万元,此款交由曾昭荣同志掌管,做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1943年初,赵益之怀疑日本人要吃掉他,他秘密与我们商量,要求拖出来。我们原先没有这个打算,觉得赵益之反映的情况很突然,经同曾、邹研究,认为赵仅是怀疑,还难准确判定。同时,我们也得请示上级,需要时间。因此,决定劝说赵暂不行动。虽经邹做工作,但赵仍决心行动。赵部拖出时,在向荆门方向运行途中,受到郑家良匪部的阻击和日寇的追击。在敌伪夹击中,赵部受创撤出,致使日伪混杀,两败俱伤。此时,赵益之本人有些动摇想缩回,日寇再次拉拢他,他就妥协了。

这次争取赵益之失败的原因:一是行动过早。如待襄西根据地得到恢复(当时正在恢复中),我主力西来,南下一二天时间,就可掩护拖过去了。但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而是孤军行动,腹背受击;二是邹为参谋长,却是个学生,虽有一些为党工作的经历,但还缺乏军事工作经验,指挥水平更不相适应;三是对赵部下层工作开展不力,由于时间不长,有些工作也来不及做,没有一个连队为我方所掌握,其中一些上



层,尤其是赵本人动摇回头,我们的工作就更困难了。

由于这次行动失利,邹赵共事由有利转为不利。赵在表面上虽无恶感,但实际上心灰意冷。经我们进一步做工作,赵仍表示相机而动,但无从前的紧迫感了。我们分析,邹在赵部继续工作有困难,经上级同意,于1943年初,将邹开锋撤回襄南,同时也撤出协助邹工作的其他同志,但我们仍与赵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以后,对赵部的争取工作又派邹去过,刘真同志还亲自与赵见过面,进行过争取工作。后来,赵如何与我们彻底反目,我就不清楚了。

在问安、草埠湖、半月、新场一带先后建立了区政权, 为江枝宜开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1月,襄河地委调我到襄南,指定曾昭荣同志接替我,负责江枝特区的工作。我在特区工作半年多,主要住在曾昭荣同志家中。当初来时,为掩人耳目,只说我是曾的同学,因家乡被日寇侵占,来此投友谋生。经曾、邹等同志研究,组织了一些学生让我教书,因我从江陵县弄的“良民证”是张安仲的名字,人们都叫我张先生,流传着“张先生教学不要学钱”之说。我住在这里,来往的同志虽多,但由于有地下党支部,有周围群众掩护,还是比较安全的。我和曾昭荣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江陵县三区,他要去地委汇报工作经过我那里,由于我们有过一段革命的患难之交,借此重逢的机会,两个故友,促膝谈心,彻夜不眠,格外亲热。我照顾他的生活、安全,并派交通员送他。后来,他为营救一位同志,竟被赵益之杀害,真没料到那次见面,竟成永别。

我调到襄南后,先后在江陵县三区、襄南地委机关、监沔县委、江监石工委、潜西工委、渔南工委等处工作,共5年多时间。



1948年冬,襄西地委决定开辟江枝宜地区。专员刘真同志通知我参加县委任城工部长,并交给我一个排和一个区委的班子,到汉宜路南的殷家巷、双冢祠一带开辟江枝宜县第一区。这个地区属江陵县管辖,与枝江、当阳接界。汉宜路北有荆当五区可作我们的后方,开辟此地,不算孤军深入。随后,十三团也来配合,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了乡政权。常在这里工作的有李先兵、张三杰等领导同志,十三团政委刘生民也来过多次。后来,县委城工部派出干事岳启鸿由谭志亚带领前去与原江枝特区地下党的一些同志联系,这些同志闻风而动,很快就争取了维新乡(属枝江新场)敌乡长在内的全部武装人员投诚。

1949年春,我们在问安、草埠湖、半月、新场一带先后建立了区政权,为江枝宜开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是常有的,在斗争中,我们不断取得进展。在当阳境内,争取了敌人一个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的全部武装向我投诚;在江口,争取了敌大江部队一个中队包括中队长淡功颖在内的全部武装向我投诚;在安福寺,由于徐国炎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了国民党江北自卫队包括中队长梅斗南在内的全部武装向我投诚。在争取、分化、瓦解土匪的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收获。还动员了不少学生前往解放区或就地参加工作。董市镇镇长张友谊,在掩护我工作人员、搜集长江沿岸敌情、掌握沿江一带船只、支援大军渡江作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5月,江枝宜县分开,我被分到枝江县,县委书记是李先兵、县长陶君彦、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贾平、组织部长许超、指挥长林凯成,我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7月15日,大军渡江。17日,枝江县城解放。

(根据朱玉衡口述整理)



邓宗禹临刑“悔过”

邓宗禹，枝江安福寺上白坪人。1927年3月，共产党员邓宗禹在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命为驻五峰县指导员，同时受中共湖北区委委派到五峰开辟组织工作。

邓宗禹到五峰后，以县立局级小学为中心，深入街道、乡村，宣传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宣讲打击土豪劣绅的革命意义，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组建国民党五峰县党部，改组国民党五峰县政府，成立了中共五峰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群众揭发，将水尽司侵吞学款的劣绅马子俊、许悠然，菖蒲溪鞭打佃户的恶霸骆登武抓到县城公审游街，收缴杜笑庄等几家劣绅官吏的浮财并分给贫苦群众。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疯狂反扑。5月15日，逃到渔洋关的杜笑庄纠集各路团防300余人扑向城关，叫嚣要“报仇雪恨”。邓宗禹立即将县保卫团、学联会、农协会编为三个武装大队，分守北门、东门和南门，派王化南连夜前往宜都搬救兵。然而，混入共产党内任县保卫团副团长的骆存之叛变革命，与杜笑庄、骆登武里应外合，解除了县城革命武装，抓捕了邓宗禹。

16日，邓宗禹被押回县城。杜笑庄说：“蒋委员长的四一二行动邓先生还不知道吧，其实我们也是为您好。只要你写一张悔过书，您还做您的指导员，您看……”邓宗禹说当什么官儿这个好说。悔过书吗，



我看还是召集全城百姓，我当众写当众念，这样不是全城尽知，影响更大吗？”杜笑庄一听连说：“好，好，邓指导员真乃识时务之俊杰！”

杜笑庄派人在安化桥头搭了一个讲台，台上备好笔墨纸砚。邓宗禹从容地走上讲台，迅速提笔刷刷刷写下几行字，深沉而又激昂地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我邓宗禹就要离开大家了。”台下一阵骚动。骆登武对台下吼道：“吵什么吵，再吵老子毙了你们！”杜笑庄说“请大家安静，邓先生不会走的，他将要和我们合作……”

台下根本不听他们的，邓宗禹双手向下一按，台下立刻鸦雀无声。邓宗禹继续说：“我曾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离开大家，却未曾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但我并不惋惜，因为我深信走了我邓宗禹，还有后来人。但我们必须明白，路不会笔直平坦，革命不会一帆风顺！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军阀混战、贪官污吏的横征、土豪劣绅的暴敛，搞得我们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好不容易盼来北伐，革命刚刚取得一点胜利，却又遭到血腥镇压。骆存之就是一个摧残五峰革命的叛徒！就是他勾结骆登武、杜笑庄……”骆登武狂喊：“你他妈的悔的什么过，老子揍你！”他一步跨上台去要打邓宗禹，台下一片喊声：“不准打人！”“让人家把话说完！”骆登武见状只好住手，骆存之赶紧调来警备队包围会场。

台上，邓宗禹继续说：“父老兄弟姐妹们，不要看他们一时嚣张，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完蛋！今天，他们要我悔过，我自认平生光明磊落，无过可悔！”说着他转向骆登武一伙，“我能以我的血唤起民众的觉醒，能以我的死撕掉你们的伪装，死而无憾！要说悔，我后悔当初太轻信骆存之，后悔识破你们太晚，后悔没有把你们杀掉！”骆登武气得大喊大叫：“快，给我捆起来！”骆存之、刘炳富等一齐上台将邓宗禹五花大绑

推下台来。骆存之拿过邓宗禹写的“悔过书”，只见上面写道：“不远千里寻真理，生死早已置度外；今日我血洒染处，来年是你断头台。”骆存之气得把桌子一拍吼道：“给我枪毙！”杜笑庄说：“慢，骆大队长不是被他们戴高帽子游过街吗！何不……”骆登武说：“对对，来呀，给邓宗禹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要报仇，我要以牙还牙！”杜西伯、刘炳富一伙很快做了一个两尺来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无父无君的指导员”“共产党的下场像我”，骆登武亲手将高帽子扣在邓宗禹的头上，说：“你也尝尝戴高帽子游街的滋味吧！”

游街开始了，数百名群众被迫随行。当游到南门时，杜笑庄取下邓宗禹头上的帽子，要邓宗禹念帽子上的字。邓宗禹双唇紧闭，目视群山，不予理睬。骆登武说：“你不是很会讲吗，今日嘴巴张不开咕，老子来给你帮忙！”他将刺刀插进邓宗禹嘴里狠狠一绞，说：“怎么样，这下能讲哒吧！”邓宗禹嘴里鲜血直冒，殷红的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但他仍一言不发。骆存之上前假惺惺地说：“邓指导员，何苦呐，念一念有什么关系，何必拿性命赌气呢？”

邓宗禹怒目圆睁，“呸”地一口鲜血喷在骆存之脸上，口齿不清地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军阀！”骆登武、杜笑庄连声喊道：“快开枪，打死他，打死他！”刽子手杨兆清慌忙举枪，连发三枪未中。杜西伯骂声“草包”，上前举枪，两颗罪恶的子弹射进邓宗禹的胸膛。一位宁死不屈的革命英杰英勇就义！



记中原突围游击战

【人物简介】

常兆敏,男,1925年12月23日生,
河南省巩义县人,1944年10月参加革命,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宜昌地区四岗农场书记、枝江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我于1925年12月23日出生在河南省巩义县。1944年10月,19岁的我怀着对日寇及国民党蒋介石的刻骨仇恨投奔革命队伍,在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的一纵队当上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随后参加了中原突围及游击战争。每当忆起那段往事,我就更加怀念昔日的战友。

突破封锁线

1946年6月25日晚上,我们接到向西北方向突围的命令,当时,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道路泥泞,部队行动非常困难。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部队终于抵达平汉铁路王家店,这时天已大亮,敌人加强了王家店铁路沿线的阻击力量,天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地面上敌人的炮火、装甲车与铁路两侧的明暗碉堡倾泻的火舌构成交叉火力网。我们在突击队和后卫部队的掩护下,从铁路沿线往前冲锋,被敌人打散,死伤无数,然后又从水稻田里拼命往前冲,排长背着司令员王树声,冲破铁



路封锁线后与大部队集结又日夜兼程西进，来到襄河（汉水）边，当时天已黑下来，纵队决定由四团团长王定烈率四团阻击追兵，掩护纵队过襄河。当时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猛烈地轰炸，照明弹照得像白天一样。我们只搜寻到几条小木船，每次只能渡一个多连的人。当时我与王树声司令员、张才千参谋共坐一条小木船。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纵队主力强渡襄河，安全到达西岸，随后进入武当山地区。

迂回游击战

在武当山，部队分散到武当山周围的十余个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通过打游击与敌人周旋，不断重创敌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加紧了对我军的“清剿”。随着冬季的到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弹药奇缺，衣服、粮食等给养得不到补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47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在老观窝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召开紧急会议，经请示党中央，王树声等人化装到华北。此后，纵队在司令员张才千的率领下，历经艰辛辗转 to 古老背，从古老背过长江到长阳，又辗转 to 红花套。此时，天已快黑了，敌人又追了上来，大炮不停地炸，形势非常危险，部队不能停留，我们又坐小木船过清江河，经过一夜奋战，直奔五峰，到达红鱼坪时，与国民党从湖南调来的三十三旅的部分人马相遇。司令员指示我们“作好准备，吃掉敌人”。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先佯装撤退埋伏下来，等敌人钻进包围圈后，我军一齐冲杀出来，将敌人全部歼灭。这一场打得真漂亮，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第三天，我们与副司令员刘长义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了，部队发展到一千二百人，并准备回师大别山。



勇炸敌碉堡

在红鱼坪会师后,敌军又围追过来,我们沿途击溃阻截敌人,辗转到达洋溪冷水街,马上抢渡长江到董市,又从董市出发到当阳半月,在半月住了一夜,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又出发继续北上。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河南信阳的冯家店。

“哒哒哒哒”,刚到冯家店,突然枪声响起,对面山上敌人的碉堡里,吐着火舌向我们扫射。不端掉敌人的碉堡,部队就无法前进。营长刘举泰大声问道:“谁冲上去炸碉堡?”“营长,我去!”我大喊一声,便夹着炸药包带着一个班冲了上去,借着山体作掩护,先跟敌人喊话:“你们快缴枪投降,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但敌人仍负隅顽抗,不停地扫射,一颗子弹打伤了我的手腕,当时血流如注,我不顾一切带领战士用手榴弹作掩护冲了上去,一举炸毁了敌人的碉堡,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又一大障碍。

炸毁敌人的碉堡后,我昏死过去,被战友们抬下山来,后又随部队继续北上,经河南周口、泰康,一直打到安徽阜阳。后又辗转回武汉,打京山,又追敌到钟祥。纵横驰骋数千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意志,无畏的献身精神,勇猛的战斗作风,闯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终于迎来了全国彻底解放,盼来了新中国。

(根据常兆敏口述整理)



张翮的靠椅故事

1938年10月的一天上午,一艘从宜昌开往沙市的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泊宜都县陆城码头。中共宜都支部书记刘真刚刚登上客轮,就遇见了他的入团介绍人、中共鄂西中心县委委员张翮。战友重逢,分外亲热。交谈中,刘真得知,张翮此行是去沙市从事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不过,让刘真有些奇怪的是:与一般旅客出行尽量轻装的习惯不同,这位“职业革命家”额外还带了一把藤靠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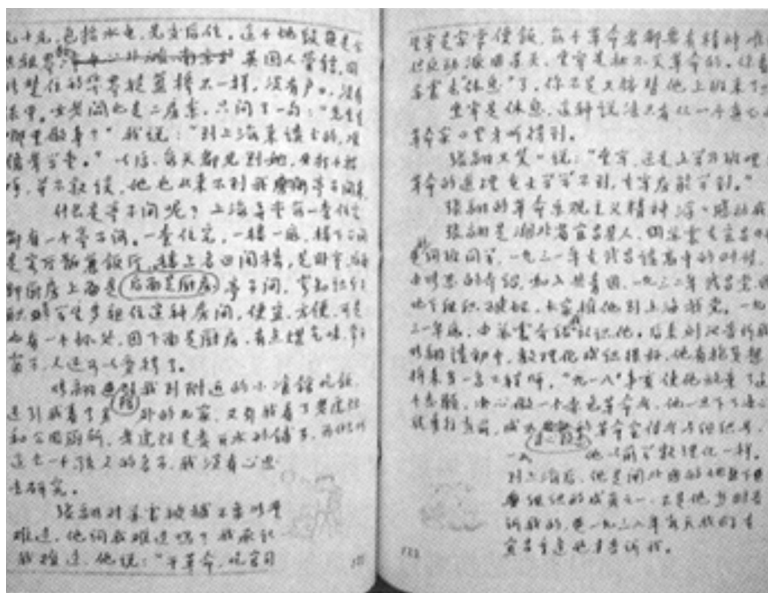
张翮旅途中为何带着靠椅?要解开这个谜团,还得从他的革命经历说起。

1911年5月7日,一个名叫张传宝的婴儿诞生于宜都县安福寺横溪河(今属枝江市)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张传宝小学毕业,考入宜昌省立四中。这位天资聪颖、数理化成绩冠甲全班的优等生,面对国家贫弱,屡受列强欺辱之耻,立志当一名工程师,科学救国。因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翮,取号凌云。翮者,大鹏之翼也,意谓展翅高飞,壮志凌云。

1931年春,张翮考入武昌省立高中。然而,日寇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却击破了他的科学救国梦。他开始意识到,只有改造旧社会,才能富国强兵,抵御外辱。从此,他放弃当工程师的梦想,投身于抗日爱国运动,加入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心做一个赤

色革命者”。1932年,他与同学苏震一道加入共青团。

1932年11月,中共武汉地下组织遭敌破坏,张翮、苏震越墙逃出学校,赴上海参加地下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翮任中共闸北区委委员。在白色恐怖的旧上海,牢狱和刑场随时都会与革命者相伴,但张翮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1933年3月,战友苏震因携带党的宣传品被捕。应苏震之邀,刚刚来沪准备参加革命的刘真对此十分难过。张翮劝慰刘真说:“干革命,吃官司、坐牢是家常便饭,每个革命者都要有精神准备,但反动派用杀头、坐牢是扑不灭革命火焰的。你看苏啸东(苏震号名)去休息了,你不是又接替他上班来了嘛!”随后,张翮又笑着说:“坐牢,还是上学习班哩!革命道理在大学学不到,在牢房能学到。”



宜昌市首任市长刘真回忆张翮文稿手迹

50多年后,刘真在回忆张翮当年的谈话时感慨地说:“‘坐牢是休息’,这种说法只有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口里才听得到!张翮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在张翮的教育引导下,刘真在上海加入共青团。

1934年春,张翮亦遭国民党军警逮捕,以政治犯的罪名判刑5年,关押于苏州军人监狱。但张翮在狱中并未“休息”。他参与领导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改善政治犯的伙食;他设法借来《资本论》,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牢狱成了他继续战斗的阵地和学习的课堂。

艰苦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张翮染上了肺结核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监狱当局根据国共两党释放政治犯的协议将张翮释放出狱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并患有严重的胃病,发烧、咯血、胃疼,饱受病魔的折磨。但他仍然抱病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1938年春,张翮回到宜昌,7月任中共鄂西中心县委委员。为了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他回到家乡横溪河,发展党员,组建中共横溪河支部。利用宜都县政府下令集训壮丁之机,以其叔父、汉流大哥张文成的名义成立横溪河社训支队,创建了当时襄西地区中共掌握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10月,张翮回到宜昌中心县委机关,一边治病,一边奔波于宜昌、沙市之间,指导其分管的党组织工作。由于病情愈来愈重,身体十分虚弱,旅途中只得带着一把轻便的藤靠椅随时歇息。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刘真在宜沙班客轮上目睹的,他带着靠椅献余生的感人场景。

1939年1月,张翮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亲属将其抬回家乡治疗。无奈病入膏肓,医治无效。弥留之际,张翮向垂泪的家人留下最后的遗言:“你们不要悲伤难过,人总是要死的。只是我追求的事业未竟,但这事业一定能成功,可惜我看不到了!”3月,张翮带着对人民解放事业未竟的遗憾和对胜利的美好憧憬长辞人世。宜都青年将他与

苏震、刘真誉为“陆城三杰”。地方名儒邹圣乡挥泪撰书挽联：

献身革命，陆城三杰最知名，纵铁窗摧残，坚贞不屈，羨济世长才，
深替祖国庆幸；

矢志救国，抗日数年尤努力，任病魔折磨，力疾笃行，恸积劳短命，
遽为民族牺牲！

（钟剑鸣）





活捉李明德

解放前夕，国民党枝江县政府建有一支反动地方武装——大江部队，它直接受县长指挥，是反动当局赖以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大江部队中有一名颇受主子赏识的干将，即二营一连连长李明德。当时，他驻防问安寺、袁码头、草埠湖一带，经常以“清剿”为名骚扰百姓，烧、抢、奸、掳无所不为，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当年，在江（陵）、枝（江）、宜（都）三县广大地区还活跃着一支革命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枝宜县独立营。营长王小平，教导员李继章，有100余人枪。他们打击敌顽和土匪，救民于水火，深受群众爱戴。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新场区中队（即四区中队）随县独立营在王小平的率领下，从半月山附近向草埠湖方向转移。中午时分，部队到达袁码头附近的熊家窑时，突然发现南面有一支约百多人的队伍也在向前运动。看其服装、装备是敌人无疑。面对突然出现的敌情，王营长当机立断，迅速作出决策，要求我们趁其不备，“吃掉这批送上口的食”。怎么个打法呢？有人提议拦住去路，迎头痛击；有人主张迂回包抄，前后夹击。王营长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他当即命令一个排从左，一个排向右，形成一个布袋，抄敌人的后路；又亲自带领一个排和新场区中队的两个班占领熊家窑上的一片制高点，正面阻击敌人。



对这场战斗,我们的战士也充满信心。一方面,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另一方面,部队不仅带有长短枪,还配有九挺机枪、三支掷弹筒和二门六〇炮,武器装备上也占有优势。

敌人越走越近,我们发现来的正是李明德所属连。原来,他们是抢粮绑“票”后回防的。队伍中,还有挑担子的民夫,驮粮食的牲口,以及五花大绑的“肉票”。大概是因为放抢得手,有点忘乎所以了,个个大摇大摆,得意洋洋。李明德看上去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着一套军装,也是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当他们发现我们的时候却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当阳县的自卫大队,还不断地吹号和我们联络哩。

不一会,正面阻击的部队首先打响,步枪、机枪一齐开火,给毫无准备的敌人当头一棒。开始,李明德还没意识到他的对手是县独立营,以为又与哪个区中队遭遇了,所以,并不十分紧张。他一面组织兵力反击,一面带队抢占窑包,但是,还没等他稳住阵脚,左右两侧也枪声齐鸣。敌兵们感到处境不妙,三个一帮,二个一伙地匍匐在包包坎坎的岗坡上,数十条长枪,上十挺机枪,同时向我阵地扫射。双方激战了近半个小时,战斗呈现出胶着状态。“六〇炮快上!”王营长大声地命令道。只听得几声巨响,炮弹在敌阵里炸开了。这一下,把负隅顽抗的敌人打得晕头转向,顿时,喊爹娘的,东躲西藏的,一片混乱,队伍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我们趁势逼近窑包,混乱之中,约一个排的敌人冲出包围,逃之夭夭了,剩下二个排放下武器,成了俘虏。这时,李明德带着几个亲信,边打边退,跑到坡下的一间民房里躲了起来。我们的战士跟踪追击,将民房团团围住。“快出来投降吧,我们宽待俘虏!”“不出来就用手榴弹炸死他”。李明德见势已去,无路可走,只得乖乖地交枪投降。

这次战斗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俘敌70多人,缴获步枪50多支、机枪3挺。我方王小平营长和一名战士不幸负伤。

我军活捉李明德的消息很快传开,群众拍手称快,敌人心惊胆寒,再也不敢贸然进犯我江北游击区了。

(高凤鉴 韩尚贵)



创业艰难百战多

1940年,抗日烽火已经燃遍鄂楚大地。这年冬春之交的1月,李先念会合在党领导下活动于豫南鄂中的各路抗日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成为鄂豫边区新四军抗日武装第一个统一的主力团。次年1月,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鄂中天门、汉川一带,沟汉河湖,星罗棋布;芦苇柴林,藏龙卧虎。顾大椿同志为指挥长的天汉湖区根据地指挥部,就建立在这里,他们发动群众打击乡团,消灭日伪武装,成为武汉外围一支抗击日伪顽的重要力量。张执一任政委的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亦沿着蜿蜒曲折的汉宜铁路路基(汉宜公路),悄悄开拔到江汉根据地。汉宜公路是连接武汉和鄂西的主通道。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盘踞武汉,汪伪“定国军”汪步青一师,亦占据武汉南20里的侏儒山,隔断了武汉三镇与天汉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夜渡沔汉湖

1941年,15岁的我穿戴整齐,怀着激动的心情,疾行于敌占区汉阳县汉宜公路上,很快就到了位于公路边柏林庄肖家大湾外婆家。舅表哥杨毅(时任中共汉阳县组织部长)给我讲述新四军抗击日寇,打击伪顽,保家卫国,求得民族解放的故事。我欣然同意加入新

四军,从此远离家人,投身革命洪流。我在汉阳县政府驻地南乡,为前线部队服务,尽力做后勤工作。汪步青师在侏儒山一带活动猖獗,行亲日卖国之能事。为打击其嚣张气焰,打通武汉至天汉根据地的交通线,新四军第15旅在张执一首长的带领下,从10月至12月,先后三打汪步青师,俘伪军950余人,击毙打伤赶来增援的日寇2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兵工厂设备,特别是缴获了在当时环境下弥足珍贵的6担医药。这一战役重重打击了汪伪日军,大大增长了民族志气。

侏儒山盘踞之敌被端掉以后,汉阳县地下党组织与天汉湖区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就多了起来。在敌占区,汉阳县汪伪汉奸及日寇经常出没。我们一起参加新四军的20来个小鬼,需要到相对安全的天汉湖区根据地锻炼成长,并充实后方力量。1942年春的一天,组织部长杨毅秘密召集我们,作了简短动员后,便悄悄地向天汉湖区进发。很快,我们翻过侏儒山,与地下交通员接上了头。交通员对敌顽汉奸日寇出没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机智巧妙地避开了汉奸敌人,渡过襄河。傍晚,抵达汉川境内的汈汉湖,交通员很快弄来两只小船,我们奋力摇橹,船飞快地向对岸驶去。桨声俟乃,水声哗啦,春寒料峭的湖水,透出一股凉气。渡过汈汉湖,对岸就是天汉湖区根据地的驻地了!我们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在黑暗中,分明看见个个眼中闪烁出希望的光芒。

白衣战士不解缘

天汉指挥部的驻地是灵活机动的。我们抵达时,指挥部驻地在汉川县祁家湾,因我年龄尚小,人亦机灵,就留下来做指挥长顾大椿



同志的勤务员,照顾首长的生活起居。可是没过几个月,我患严重痢疾,不得不住进冯家大湾湖区医院。病好后,医院指导员段庆元同志认为我是一个行医的好料,马上请示顾指挥长,让我留下来学做看护员。从此,我便与医生这一职业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新四军一名光荣的白衣战士。

天汉医院深藏于湖区芦苇荡中的冯家大湾,全由茅草和芦苇搭建。1942年,日寇又来扫荡,医院分散隐蔽,重伤病员转移到老百姓家。医生和看护同志只着便衣,提个打猪草的竹篮,下面放药,上面盖上厚厚的猪草,每天定时到老百姓家为伤病员换药打针。面对众多日寇汉奸、敌顽和地主武装,我们经常变换方式,灵活机动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943年,由于日寇经常扫荡,湖区医院从此处于流动状态。这年,天门、汉川、应城、孝感四个县日寇和伪军联合出动,对天汉湖区进行十多天的“扫荡”。医院重伤病员不得不又转移到老百姓家,轻伤病员随船行动。院长汪毅(女)、政委徐静带领船队与敌人周旋。敌东我西,敌南我北,敌人进村,医院下湖,敌人分乘汽艇下湖,我则进入柴山、湖汉、芦荡。敌人合围,一连几天不走,医院就采取“贴烧饼”的办法,跳到外线,靠两面政权分散隐蔽,弄得日伪望湖兴叹,无可奈何。

经过两年的斗争成长,我在天汉指挥部卫生队先后担任调剂员、司药。经看护班长杨玉林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队(共青团的前身)。1943年3月由卫生队长张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在五师三分区医训队(潜江)学习了半年。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系统地学习了医学基本知识,实属不易。毕业后到三分区卫生部工作,部长谈太阶让我负责药库管理。

自力更生办药厂

1945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主动出击,日伪顽拼死抵抗,作垂死挣扎,战事日益频繁,规模日渐扩大,伤员不断增多,同时又有疾病流行,急需大量医药。当时的新四军包括三分区部队药品极度匮乏,在艰苦的8年抗战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因药品不足,不能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会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怎么办,作为共产党员、白衣战士,是消极等待,还是自力更生?卫生部长谈太阶同志召集我们,决定由我负责,组织金方梧和一个姓曾的同志等4人,白手起家,兴办小药厂,土法制药。厂址设在天门县潘家沟一农民家中。我们脱去军装,装扮成农民,在根据地药铺采购大量中药,自栽薄荷草、桔梗等。谈部长亲自向当地老中医请教中草药的泡制方法。设计制作白铁蒸馏器,借用群众的部分工具,开始了制药工作。我们把缴获的鸦片熬开,把细草纸烤黄作滤纸过滤提纯,用作镇痛剂。又借用酿酒的原理,用大铁锅烧开水或煮杏仁,蒸汽上升遇盛冷水的白铁蒸馏器冷却,沿着天锅流下来,汇集一起制成注射用水或杏仁水。杏仁水用以止咳。我们还制取了大量常山丸,发给各部队院所,并配以少量宝贵的奎宁丸,使猖獗一时的疟疾得到有效控制。硫酸钠是导泄的必备药。没有硫酸钠,我们就地购买芒硝与白萝卜一起煮沸溶解倒进大木盆,再放几根稻草,露置一夜。次日晨,在稻草周围的晶莹剔透的硫酸钠结晶体呈现在面前,我们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盛夏,军队经常长途急行军,极易中暑。我们就用两块木板制成模具,取甘草、砂仁,煮沸去渣,放入樟脑、牛黄、冰片,加蜂糖调匀,倒入模具夹压成块,晒干包装,制成大量防暑药,发给战士行军时服用,强心解凉,深受战士喜爱。此药俗称“八卦丹”,我们特意改



称“行军丹”，并在模具上刻上“行军丹”三字，使每片都印上“行军丹”字样，成为战士们形影不离的救命“仙丹”。除了上述的几种医药外，我们还先后试制止咳丸、健胃散、救急水、硫磺软膏等几十种膏、丹、丸、散和脱脂棉纱布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我们四人同心协力，夜以继日，忙着洗晒、切碾、熬煮、蒸炒，每试制成功一种药剂，想到前方战士会因此减少痛苦而迅速痊愈，我们心中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其中既有创造性工作取得成功的喜悦，又有作出贡献后的自豪，还有我们四人群策群力、共同战斗的愉悦。

制药厂在分区卫生部的领导下，从1945年4月开始，至8月日寇投降结束，共历时5个月，作出很大贡献。谈部长经常从工作上给予及时的指导，生活上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知道我患有严重的胃病，就特批给我一瓶100片装的日本产若素，其实就是酵母片，但当时药品奇缺，只有首长享此待遇。一天我亦患上疟疾，部长拿出自己的津贴买只老母鸡，让警卫员走了几十里羊肠小道送来让我补补身体。小药厂紧张开创性的工作，官兵深厚的感情，使我终身难忘。

千里转战鄂西北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偏安重庆的蒋介石部队急欲出川摘桃，挑起全面内战。党中央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阻滞蒋军东下华东，布置全面内战，命令王震359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率嵩岳军区部队南下，与李先念新四军五师在中原桐柏地区会合，组建统一的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两个野战纵队。三、五分区一带成为江汉军区，司令部驻地在安陆。军区卫生



部部长仍为谈太阶同志,我任药房司药长,管理军区药房。中原军区经过一年的斗争发展,壮大拥有6万英雄解放军,牵制蒋军30余万达10个月之久。大大缓解了敌人对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对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五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原军区部队成为蒋系军队的拦路虎和眼中钉,蒋介石从华东、华北调来30余万军队,从6月16日起,兵分6路,蜂涌而至,再度缩小包围圈,以5比1绝对优势意欲于1946年7月1日全歼我军。6月26日,我军根据毛泽东“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开始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战役。

突围前,军区药房药品太多无法转移。为不至于落入敌手,我们买来两口大缸,把多余的药品全放进缸里,用大铁锅盖上密封,在司令部掘个大坑,迅速掩埋,以便我军打回老家,再派上用场。

突围那晚,正值阴历“月打头”,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卫生部跟随司令员罗厚福、参谋长李人林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从安陆桑树店出发,在夜幕的隐护下,悄悄向西急行军。国民党部队一里一堡,并密布铁丝网,妄图将我军围困中原。安陆地处平汉铁路以西,所以不必经过平汉路敌人封锁线,但中原突围是党中央毛主席和李先念、郑位三等五师首长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围,司令员罗厚福带领江汉军区部队,在平汉线西侧掩护并接应中原军区南线突围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早在26日,中原军区皮定钧部就与敌人打响,向东佯攻,造成中原主力东进的态势,使国民党军主力设防东线,西边布防薄弱,以至于当晚江汉军区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团共4团近万人的队伍一夜之间冲出包围圈,敌人却浑然不知。整个部队似一匹冲出迷雾的骏马,千里驰骋,一路斩关夺隘,翻山越岭,路过随县,翻越大洪山余脉,几乎无阻碍。几天时间,就过枣阳宜城县界,抵达襄河岸边。直至此,敌兵才发觉我军主力西进,慌忙调兵尾追。我军赶在敌兵之前,



在流水沟大摇大摆地渡过襄河(汉水),向南漳进发。在南漳,形势急转直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有飞机侦察轰炸。我军采取日夜兼程,整体突围的办法,继续向竹山转移。一路上,我们打击乡团,势如破竹,渡河进入竹山县城。军区领导遵照中央的指示,部队分成几部分,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就地打游击,建立地方政权。越来越多的敌人正规部队开进鄂西北,我鄂西北边区根据地部队与之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阵地战、游击战,很多干部战士被俘后英勇就义。地委书记吴云鹏(1943年,卫生队长张靖曾为其主治,并指派我作特别护理)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被残酷杀害。竹山县委书记许明清也被敌人生生活埋。仅蔡家坝突围一战,就有15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起初,我们在鄂西北没有群众基础,部分群众被敌人的反面宣传吓跑了,但我们十分遵守纪律,并作了广泛的革命宣传,群众逐渐接纳了我们,给我们作向导,提供食宿,我们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时因长途跋涉,蚊叮虫咬,我又患上了疟疾,不得不离开司令部与随军医院一同西行。和随军医院一起转移的还有区以上的干部队,共几百人,由李人林同志率领第三团作掩护。

随军医院和干部队伍在风雨中日夜兼程,踏着暮色到达竹溪蔡家坝一所学校。远处,莽莽秦岭,层峦叠嶂,奇峰竞峙。我们饥肠辘辘,十分疲惫,多想躺在课桌上休息一夜啊!可是后山一阵枪响,敌兵又来了,我们在部队的掩护下,迅速朝对面山上撤退,但那儿早被敌军占据。负责掩护的战士以数倍于我的敌人顽强拼搏,终因腹背受敌,不得不边打边撤。我们随军医院行动不便,被打散了,医务主任张纯良不幸被敌人抓住,英勇牺牲。我和30多名同志躲进山洞,直至天亮。第二天,我们换上了竹溪县老百姓送来的便衣,去找部队,可国民党军又追来了,我们迅速分散隐蔽,最后与部队失散,只剩

下我、警卫排病号和司药朱大凡三人在一起,一个王姓年轻人把我们带到位于山顶的他家隐蔽下来。他白天以掰包谷为掩护,为我们打听部队的消息,并准备包谷和干粮送我们找部队,一直到小河口才返回。我们白天隐蔽,晚上赶路,又遭遇敌人,三人又走散了,只剩我一人。离开了部队,脱离了党组织,只身一人潜伏在豺狼虎豹出没的深山老林,当时那个心情不晓得是啥滋味,有多么的痛苦。走了大半夜,碰到一位老人,把我带到山顶他外甥唐恭俭家,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国民党又清乡,“五家连保,十家连诛”,唐家呆不住了,又转移到他姨爹伍英甫(地主)家,日夜做活。由于过度劳累,加之环境艰苦,我患上严重的风湿热,浑身关节疼痛,睡了半个月差点死去。我想,可千万别死,我还有好多事要作,一定要回到汉阳,寻找党组织。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我不能呆在这里一辈子!一个夜晚,我逃离地主庄园,再找到唐恭俭,帮他放木排。

我在山脚河边搭乘木排,沿小河顺流而下。一个月后,终于走出深山,抵达老河口。近一年的封闭生活,终于可以看到充满光明的太阳。从这里顺汉水东南而去,就可回到心仪已久的家乡,找到家人,重新投身战斗。我不顾河水湍急,拼死向驶向河中心贩运生猪的商船游去,死命地抓住船尾尚未竖起的桅杆梢,随船拖行一里多路,终于爬上船。沿途每遇敌哨兵盘查,我就将猪粪舀向河水熏得哨兵掩鼻而去,以此混过关卡,终于回到汉阳。这时已是1947年7月。我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辗转到沙市觉楼街投靠叔父。在街上巧遇医训队同学吴征,他在荆州西门城外开诊所,和他一起到沙市普济药房购药。就在这个药房,我们又巧遇战友金方梧,通过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荆沙、公安一带,我们自觉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策反国民党军官,搜集敌方情报,摸清这一带道路桥梁、敌兵分布,画成地图,送到

潜江张荆河我方城工部。部长张泽生要求我们继续留在敌后战斗，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在敌后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巧妙的战斗，终于迎来1949年黎明的曙光。

（马家店卫生院离休干部黄泽文口述，杨子林整理）



“易穷”拆字

1928年夏,鄂西大旱,宜都、枝江尤为严重。枝江安福寺地区农民“普遍无饭吃”。加上官府豪绅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农民无以为生,只能沿途乞讨,以致大量灾民滞留宜昌城。

7月,处在地下进行隐蔽斗争的中共鄂西特委领导机关设在宜昌廖家台35号。特委书记周逸群耳闻目睹天灾人祸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心情十分沉重,深为民众疾苦忧虑。5月,周逸群由沙市至宜昌途中曾到安福寺指导过工作,知道安福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就十分活跃,所以决定再次深入安福寺巡视民情。

夏、秋之际的一天,身材魁梧的周逸群一身农装,以一名“拆字算命”先生的名义来到安福寺。交通员早已联系了安福寺的党团员、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大家早已等在共青团支部书记徐国伟家。周逸群与大家招呼后,对沿途惨景、灾民疾苦深感忧虑并十分愤怒,他斥责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地方反动政府不赈灾,不顾人民死活,指出地主豪绅不仁不义,对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灾民疾苦充耳不闻,反而想借大灾之年囤积粮食牟取暴利,他要求大家要把灾民组织起来,要自救,就是与地主老财斗争……

会上,一位农友在谈到灾情时叹道:“我们穷人就是穷啊!”

周逸群说:什么是穷?什么是富?说着他在地上写了“穷”“富”两



字,然后给大家讲解“穷”“富”的道理。他说“富”有宝盖头,“穷”也有宝盖头,我们“穷”是因为被土豪劣绅压迫得“弓”起了“身”子,“富”只不过是宝盖头下面多了一口田,我们穷人只要组织起来,把田从富人手里夺过来,不就由穷变富了吗!我的名字就叫“易穷”。现在是天灾人祸,广大穷苦大众要度过灾荒就要组织起来到地主土豪家里去分谷米,开展“吃大户”斗争!

周逸群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眉开眼笑。大家很快行动起来,亲串亲、友串友,动员农友参加饥民暴动……穷人家家家户户等米下锅,一听说分谷米、吃大户,都踊跃响应。

次年2月,经宜都、枝江县委发动,安福寺玛瑙河畔两岸人民及相邻的宜昌、当阳边界地区组织了四支饥民队伍,每支队伍在千人以上,男女老少带着锅碗瓢勺,像一股股洪流涌向地主豪绅大院,土豪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面如土色。饥民们直奔粮仓开仓分粮,推槌整米,砌灶安锅,烧火煮饭;就这样吃了东家,再去西家……

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点燃的饥民斗争烽火在继续蔓延,人数不断增加,一度达到数万人之多,并迅速扩展到松滋、江陵及鄂中地区的天、沔、潜一带,给地主豪绅以沉重打击,也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地方政府。

八十多年过去了,“易穷”拆字的故事至今还在安福寺一带流传。

(何复元)

娘子军打“狗”记

20余名手持钢枪的保卫团士兵，居然被一群赤手空拳的“小脚婆娘”打得落荒而逃，还缴了8支步枪。这件旷世奇闻，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宜都县安福寺苏区(今属枝江市)的一个真实故事。

今年是戊辰，年成拐得很。

风打太阳烤，犹如火来烧。

割的稻子不过碾，种田饿死人。

县里要征税，乡要团防费。

地主来开会，又兴屠宰税。

七算八又掂，门牌加灶捐。

一心把穷人整脱皮，心里才欢喜。

腊月二十几，无钱又无米。

白菜萝卜称不起，个个着飞急。

衣服器具当光卖尽，痛苦向谁泣！

.....

这是1928年鄂西大旱时，流传在宜都县安福寺地区的一首《荒年歌》。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在天灾的打击和贪官、土豪的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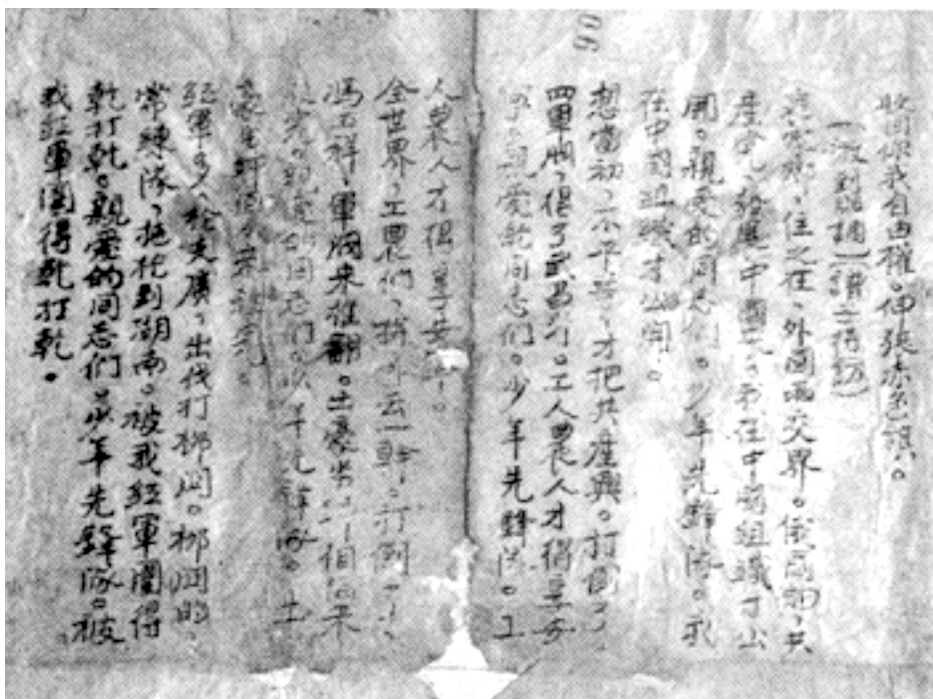
剥压榨下,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困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9年2月,在湘鄂西苏区创始人之一,著名革命家、军事家段德昌的亲自指导下,中共宜都县委、枝江临时县委在以安福寺为中心的宜都、枝江、宜昌、当阳四县边界地区领导发动了一场3万余人参加的“吃大户”的饥民斗争。

一天,1000多饥民由农协会会员领头,挑着箩筐,拎着口袋,浩浩荡荡地涌向安福寺五家畈大土豪余辑五家“吃大户”,一会儿就把地主院子挤得水泄不通。饥民中半数是妇女。说起“吃大户”,这些“家庭司务长”比男人还积极,看着一家老小挨饿,哪个心不急。碰上胆小的男人说泄气话,她们就七嘴八舌地数落道:“饿死是死,打死也是死,亏你是个男子汉,还不如我们女人家!……”院里院外只听见她们叽叽喳喳、吼吼叫叫。余辑五见势不妙,一溜烟跑到安福寺保卫团报了“抢案”。

不一会,团董陈海涛坐着绿呢大轿,带着20多名荷枪实弹的团丁,威风凛凛地开到五家畈。陈海涛一看饥民人多势众,不宜强攻,眼珠一转,心生诡计。他一面假惺惺地要饥民派代表到玛瑙河边误儿期茶馆“谈判”,以便诱捕“吃大户”的领头人;一面密令团丁驱逐饥民,以釜底抽薪。

饥民谈判代表刚走,团防队长万汉山就挥舞皮鞭指挥团丁驱赶饥民,凶神恶煞地吼道:“出去,出去,都给老子滚回去!”饥民们早就恨透了这帮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团狗子”,个个怒目而视,谁也不动。当满脸横肉的万汉山手扬皮鞭、骂骂咧咧地晃到妇协会会员赵么面前时,生性泼辣的赵么虎地一下站起来,两手叉腰,杏眼一瞪,喝道:“嗨,你想讲打呀!”万汉山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竟敢与他作对,顿时恼羞成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枝(江)宜(都)县委油印的红色歌谣

怒,对着赵么劈头就是一鞭子。赵么大吼一声,冲上去揪住皮鞭。周围妇女义愤填膺,齐声喊打,蜂拥而上,抓的抓、拉的拉,你一巴掌,我一拳头,打得万汉山晕头转向,趁势下了他的枪。接着,几个妇女解下裹脚布,朝他颈上、背上不住地缠,严严实实给他扎了个大“背褂”。万汉山开始还欲挣扎,乱蹦乱跳,如猴子跳圈,无奈裹脚布越缠越紧,急得妈呀娘地乱喊,沿转磕头求饶。看到万汉山这般狼狈,饥民们都哈哈大笑。

跟在后面的团丁见队长挨打,一个个吓得六神无主,只晓得瞎叫:“抢犯打人啦!抢犯打人啦!”妇女们一听,犹如火上浇油,喊的喊打,喊的喊缴枪,拳头、鞋底板如雨点般向团丁擂去,捶得团丁脑壳梆梆响。其他饥民也一哄而起,呐喊助威,打得“团狗子”喊爹叫娘,抱头鼠



窜。妇女们夺获了团丁8支步枪。

陈团董欲借“谈判”为名“枪打出头鸟”，没想到锦囊妙计被一群小脚女人给泼了汤。眼看娘子军就要杀进茶馆，顿时吓得面如土色，轿子也不敢坐了，扯起长马褂，拔腿就跑。

饥民们赶走团防后，个个喜笑颜开，马上开仓分粮。布袋不够用，就用褂子、裤子、围裙装，共分走粮食300余石。斗争胜利后，饥民们开怀地唱起了中共枝江临时县委书记王天鸿新编的歌谣：

可恨有个余辑五，为人特刁强，买通军阀和团防，来把饥民伤。

队长万汉山，生得多“勇敢”，带些团士们，来把饥民赶。

谁知妇女们，个个心不甘，脱下裹脚布，将他颈项缠。

缠得汉山心慌缭乱，忙把妈来喊，磕头如捣蒜！

同年5月、12月，中共鄂西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高度赞誉安福寺苏区妇女“围缴团防武装的行动极勇敢”，“表现了妇女很伟大的力量。”

（明建中）



宁死不屈的革命伉俪

七星台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共产党员在这里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共党员阮本槐、戴中秀在这里相识,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相恋,终成一对革命伉俪。他俩不幸双双被捕后,敌人对其施以酷刑,丈夫四肢被整断,妻子双乳被剜去,在敌人惨无人道的摧残下,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信念更加坚定,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

1932年2月5日,夫妻两人在江口英勇就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他们深爱着的这方土地!

开山寺里初相遇

1902年,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江陵菱湖双闸一户阮姓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给男孩取名本槐,寄以无限希望。阮家在当地虽然还算家道殷实,但时局动荡,人民生活得水深火热,在阮本槐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报国济世的种子。阮本槐15岁那年,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的他决定去外地求学。临走之际,善良慈悲的母亲执意带他去本地有名的开山寺烧香拜佛,保佑他求学顺利,将来能出人头地,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才。

在开山寺,母亲遇到了同样前来烧香的一位熟人。她牵着一个小小



姑娘，提着香篮。女孩眉清目秀，阮本槐觉得她长得煞是好看，心中升起一种特别愉悦的感觉。女孩叫戴中秀，年方13岁，是鲜家港戴家小院一农家女。其母每当年节都要到开山寺烧香拜佛，以祈平安吉祥，这次带着女儿来敬佛，是希望佛祖保佑女儿能许个好人家，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在开山寺的大门前，阮本槐和戴中秀第一次见了面。当各自的母亲虔诚地跪在佛像面前烧香、许愿时，这对少年男女在大厅的另一边打开了话匣子，两颗拳拳心一经碰撞，感情就迅速热络了起来。

蜿蜒的沮漳河在鲜家港处溜直一道弯。阮本槐和戴中秀就住在这道湾的两岸。阮本槐告诉戴中秀，几天之后他将要去外地求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戴中秀心中无比羡慕又无限惆怅。“我会给你经常写信的。”阮本槐已知道戴中秀能识文断字。从此，戴中秀记住了阮本槐，记住了这个愉快的秋天以及阮本槐秋天的诺言。少男少女的梦想在尚还朦胧的情感中萌芽。

志同道合结连理

在学校里，阮本槐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时刻关注时事，不断接受新思想。当他第一次阅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新青年》倡导的中国青年人要从苦闷、彷徨中走出来，要救国必须开创新出路的新理念犹如黑夜里的闪电，直抵灵魂，启迪他尚存蒙昧的思想。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时常参与进步青年组织的爱国运动。他不时地写信给戴中秀，向她倾诉思慕之情，交流自己接触到的新思想，还鼓励她坚持习文识字。17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阮本槐和他的同学们关注并积极投身于这场波澜



壮阔的思想运动，自觉接受新文化的熏陶和新思想的洗礼，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开始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学毕业后，阮本槐回到江陵菱湖双闸，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新青年》杂志去见漳河对岸的戴中秀。三年未见，他一直将她记在心里。两人自开山寺一别之后，各自都深深地记住了彼此。长时间的书信交往，两人感情不断升温；共同的信仰，使两颗心逐渐靠近。

戴家小院请有一位私塾先生，教戴氏家族晚辈后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先贤文化。戴中秀有兄弟姐妹九人，在姊妹中排行老二。因为是个女孩，戴中秀没有正式去课堂听先生讲课，但她每当做完家务后，就到私塾旁听。由于她醒事，心智高，学习又刻苦，重男轻女的族人也就听之任之。先生也偏私她，常常耳提面命。在阮本槐求学期间，她抓住一切机会习文识字，甚至会把阮本槐的信件当作学习的课本。每当父母为她张罗婆家时，她总是说不急，其实她早已芳心暗许。

戴中秀阅读了阮本槐带给她的《新青年》等杂志，其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她影响最大，书中积极向上的革命思想极大地震撼了她、深深地吸引着她。他俩在家乡青年人中积极串联，传播进步思想，宣讲革命道理，共同的信仰，成就了一对志同道合的恋人。第二年，两人结为夫妇后，一起前往沙市。他们在沙市经营着一家小百货生意。他俩以经营的小百货门店为支撑和掩护，积极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

比翼双飞革命路

1927年1月，阮本槐在沙市晴川书院经徐海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随后,在组织的委派下,阮本槐戴着一顶礼帽,拄着一根文明棍,乔装成一名商人出现在凤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凤台乡农民协会自卫队成立,阮本槐任凤台乡农民协会自卫队队长。不久,自卫队扩建为赤卫中队,他任中队长。1930年1月,赤卫中队被编入荆当游击队第一大队,阮本槐任中队长。

阮本槐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他的影响和介绍下,妻子戴中秀于1928年3月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夫妻俩并肩作战,参与和领导了凤台地区以“吃大户”为形式的反饥饿斗争,带领广大贫苦百姓向剥削阶级高高地举起了“农奴戟”。

1930年7月,阮本槐率领游击中队,在配合贺龙领导的红六军攻打荆州和沙市的战斗中,表现机智英勇,获得好口碑。在这次战斗中,怀有身孕的戴中秀去给几位游击队员送信,在返回途中,因为奔波劳累过度导致流产。阮本槐深深自责,愧疚地对妻子说:“我不该让你去送信,我太大意了。”“是我执意要去的,再说,我是共产党员,理当我去,紧急时刻,你又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人。”一对共产党员早已把他们的爱及其所有都献给了他们所崇尚的共产主义事业。

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凤台乡妇女协会成立,龚梅芳任主任,戴中秀任副主任。不久,龚梅芳赴洪湖参加赤卫队,戴中秀接任凤台乡妇女协会主任。几年时间,戴中秀在草埠、凤台地区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带领妇女积极分子参加“吃大户”等反饥饿斗争,腥风血雨中淬炼了她坚强的革命意志。

1932年1月,阮本槐率领游击中队配合鄂西游击二大队攻打草埠乡公所和驻草埠的县保安中队,活捉乡长熊必丰,击毙保安中队和乡保安队头目田协清与时继良。

舍生取义为初心

1932年1月23日，阮本槐、戴中秀与共产党员李道生、李道荣、熊国秀等人，正在一农户家开会，商议将一批优秀青年游击队员派送到洪湖赤卫队，不幸被江口保安团发现，夫妻二人同时被捕。

抓到阮本槐和妻子戴中秀，保安团认为捕到了“两条大鱼”。国民党保安团将阮本槐、戴中秀夫妇捆到江口，妄想将阮本槐“搞定”，就可掐灭凤台一带的革命火焰。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夫妻俩在狱中相互鼓励，异常坚定，对于敌人的劝降、诱降，丝毫不为所动。保安团丁用皮鞭、棍棒将他们折磨得皮开肉绽。

七天过去，保安团丁酷刑用尽，依然无法使他俩屈服。保安团丁遂将夫妻俩分开，试图“各个击破”。阮本槐的四肢相继被敌人打断，他始终不屈服、不低头。面对阮本槐无所畏惧的凛然正气，残忍的敌人绝望了，决定将他杀害。在另一间牢房里，保安团丁对戴中秀说：“你丈夫已经想通了，你还是招了吧。”戴中秀识破敌人的诡计，声色俱厉地吼道：“我丈夫不是怕死鬼，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们打错算盘了！”她鄙视地看了一眼眼前的保安团丁，轻蔑地说：“你们这些狗腿子，欺压百姓，不会有好结果的。”保安团中队长许直卿走到戴中秀面前，皮笑肉不笑地对戴中秀说：“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说出另外几个共产党员的下落，与阮本槐划清界限，我保你荣华富贵，再也不受苦。不然，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祭日。”戴中秀冷笑道：“我还知道我的祭日，而你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恼羞成怒的许直卿恶狠狠地大声道：“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不怕死！”随即，他指示保安团丁撕开戴中秀的衣服，残忍地用皮鞭抽打她。刹时，戴中秀全身鞭痕累累、血



迹斑斑,她咬紧牙关,痛骂面前的保安团丁“强盗、不得好死……”皮开肉绽的戴中秀被折磨得晕死过去。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刽子手们正在一旁吃肉喝酒,他们看到她醒过来,立即报告给许直卿。许直卿走到双手被反绑着的戴中秀面前,很不耐烦地说道:“想清楚了吗?老子的忍耐力是有限的。”话音未落,戴中秀拼尽力气,将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到他的脸上,气急败坏的许直卿用尖刀刺向戴中秀的乳房,戴中秀惨叫一声,再次昏死过去。惨无人道的敌人剜去了她的双乳!

1932年2月5日,年仅30岁的阮本槐与年仅28岁的妻子戴中秀在离沮漳河不远处的长江边的江口英勇就义。沮漳呜咽,长江饮泣,一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夫妇,以他们的血与生命践行了初心使命!

(王雯憬)



奇袭“白虎团”英雄舒德春

舒德春(1930年2月—2017年6月),男,枝江市仙女镇余家冲村人,原籍兴山县大峡口区古楼村。

1951年5月舒德春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第68军203师607团3营9连当战士。因在侦察作战中表现突出,1952年11月荣立三等功一次,并于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4月调往第68军203师607团部任侦察员。在部队期间,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1953年7月14日,在抗美援朝奇袭“白虎团”的战斗中与战友们一道荣立集体特等功。1955年复员回乡,历任大队治保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退役后,始终过着平凡的生活,从不居功自傲。

1953年6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向“联合国军”发动一次进攻作战。这次战役主要任务之一是歼灭南朝鲜的王牌军“白虎团”,彻底打掉美帝国主义与李承晚南朝鲜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战斗打响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了由609团第二营与607团侦察连组成的穿插营,另以607团侦察连三排为主体组建一支化装袭击小分队(简称化袭班)。化袭班由侦察连三排副排长杨育才任班长,成员有舒德春、张连训、王贵先、李志、赵顺合、李禄培、包月禄、黄同玉、周发世、侯时斌以及朝鲜人民军派来的联络员韩淡年、金大柱,被称为“十三勇士”。他们的作战目标是秘密潜入设在二青洞的“白虎团”团部,以出



其不意地奇袭来个“黑虎掏心”，一举端掉敌人的团部，从而使余下之敌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形成对敌作战的压倒性态势。607团团首长与小分队全体战士一起，群策群力制订了化装奇袭方案。根据杨育才身高目深的特点，化装成美军顾问，朝鲜人民军的韩淡年化装成南朝鲜军排长，其他人全化装成南朝鲜兵，以护送美军顾问或装作敌溃退散兵之模样，视情况灵活运用避、骗、打、抓的手段，插入敌团部。为了使化装形象逼真，化袭班成员特意到战俘收容所进行观察，模仿敌人言谈举止，并根据各自身份进行全天24小时的角色训练。

“白虎团”即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一团，是李承晚的嫡系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团旗上画着一只白色的老虎头，因此叫“白虎团”。“白虎团”占据有利地形，有凶猛的炮火，如何拔掉这颗虎牙，化袭班的勇士们根据化装袭击的特点，进行战前演练。在敌我阵地前沿及缓冲地带进行了观察、潜伏、窃听，以现地侦察结合沙盘作业等方法，反复熟悉了地形。在3天准备时间里，平均每人看地形9次，熟记了415高地至二青洞这段公路明显的方位物、上下坡、拐弯等地形特征，还审问了20多名俘虏，弄清了敌团部的具体位置、房屋间隔、结构、驻扎及警戒情况。

“白虎团”在金城川南侧灰古介、佳岷里、二青洞地域历时两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全团全副美式装备，有坦克40余辆，火炮140余门。团部位于二青洞西南山谷内，距敌防御前沿约7.5公里。驻地周围设有单列桩铁丝一道，四面均有岗哨把守，通向敌团部的公路守备甚为严密。小分队选择沿380高地，越三道铁丝网、一道鹿砦，左拐直插通往二青洞的公路，逼近敌团部。

1953年7月13日晚11时40分，上级下达了出发命令，十三勇士迅速到达前沿的一个小坑道里，等待出发的时机。那天夜里，阴云密布，



大雨倾盆。突然，空中闪着一道道金光，这是我军的火箭炮发射了。当志愿军的炮火向敌人纵深延伸时，杨育才一挥手，喊道：“出发！一个紧跟一个！”化袭班趁敌慌乱之机，冲过公路，直扑“白虎团”团部二青洞。志愿军十三勇士沿着事先研究好的穿插路线，首先穿过敌我前沿阵地间一片开阔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敌营第一道防线380高地。

突然，公路左侧山沟里传来隆隆的炮声，判断是敌人在打炮，穿插营与化袭班决定抄到敌阵地后面，突然袭击打它个稀巴烂。就在这时，前面敌人两辆坦克开了过来。穿插营的一位战士手握爆破筒将第一辆坦克变成了一堆废钢铁，后面的坦克吓得停了下来，车里的敌人架起高射机枪，朝第一辆坦克左右方向猛烈扫射。化袭班舒德春悄悄地摸到第二辆坦克背后，将一颗手榴弹甩到了坦克尾部的油箱上，第二辆坦克也瞬间被报销。敌炮兵阵地设在一条山沟的平地上，共有4门24管火箭炮，化袭班配合穿插营，迅速摧毁了敌炮兵部队，解除了我正面进攻的志愿军部队的巨大威胁。

化袭班凭借着敌人的探照灯、照明弹的光亮，冒着大雨巧妙地利用障碍物隐蔽前进。突然，在前头开路的侦察员急促地低声喊道：“地雷！我踏着地雷啦！”杨育才说着赶忙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颗美式反坦克地雷。侦察班长舒德春则带领其他战友跳进另一条水沟隐蔽前进，他们翻过豁口，越过雷区，终于安全通过敌人前沿防线，踏上深入敌人心脏的那条公路。

公路上又亮起照明弹。清点人数的时候，忽然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一个人。杨育才悄悄地把情况向朝鲜人民军的韩淡年说了。韩淡年走到队尾，猛然抓住了那个家伙。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胆小鬼，被我



军强大的炮火吓破了胆,躲在沟边的草丛里。当志愿军侦察员们在公路上跑过时,他还以为自己的队伍撤退了,就跟着闷不作声地往南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抓了一个俘虏,获得了敌人的口令,勇士们惊喜万分。

化袭班在穿插营的配合下,打掉了几批南朝鲜军的增援部队,巧妙地通过敌军几道岗卡,机智抵近“白虎团”团部驻地。

敌团部由铁丝网围着,里面有两排整齐的木板房,院外的小山沟里,停放着大卡车和吉普车,敌军正慌忙地往车上搬东西,企图逃跑。借着灯光,发现敌军“首都师”副师长、机甲团团长等正在开会。在杨育才的指挥下,舒德春等勇士们首先切断了敌人的电话线,然后将侦察员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第一小组打掉敌人警卫排;第二小组消灭会议室的敌人;第三小组捣毁敌军炮兵指挥部。杨育才一声令下,各组突然分别勇猛地闯进会议室、警卫室,手电筒照到哪里,子弹就射向哪里。仅用13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敌机甲团团长等54人被当场击毙,17人被俘,共计歼敌200余人,彻底捣毁了敌“白虎团”团部,切除了美、李军伸向“三八线”以北的“毒瘤”。战斗结束后,杨育才命令立即发信号,3颗绿色信号弹向天空冲去。

1953年7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舒德春授予国旗勋章;1953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侦察班长舒德春记“特等功”一次;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彭德怀为舒德春签发功勋证书。化袭班荣获“集体特等功”及奖旗一面。奖旗上书:“直捣伪团部 歼敌建奇功”。

(根据黄继超访谈文稿整理)

夜袭洋溪

夜色朦胧，春寒料峭。洋溪流水桥头，游动着一团影影绰绰的黑影。一支红军游击队端着枪悄悄地围了上去，低声喝道：“干什么的？”

“我们是编练队……守红军的！”黑影中一个人嗫嚅着。原来是十来个被国民党保卫团强迫守哨的老百姓。

“要是红军来了，你们怎么办？”游击队长故意问道。

“红军来了，我们就跑啦！”带队的班长傻乎乎地望着这支身着便衣、来历不明的队伍。

“我们就是红军，你们要跑就该跑了呀！”游击队长摆了摆手中的驳壳枪，诙谐地说。冻得缩头缩脑的编练队员先是一愣，随之如梦方醒地把梭镖一扔，像乱竿下的鸭子撒腿跑了。

这是1932年农历正月十九日红军鄂西游击第二大队夜袭国民党洋溪团防据点途中发生的一幕谐剧。

民国时期，洋溪是枝江县长江南岸一个商贸繁荣的港埠（今属宜都市）。国民党枝江县政府在此派驻了一个团防分队，不断对枝（江）宜（都）苏区进行袭扰。1932年2月，活跃在松滋、枝江、宜都三县的红军鄂西游击第二大队，为了支援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决定歼灭洋溪团防分队。

鄂西游击第二大队是一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大队长孟



伯平是公安县人、红六军军长段德昌手下的老暴动队员，曾任洪湖苏区江右军赤色警卫第九大队政委。1930年底，他奉中共鄂西特委指示，率一个游击小组来松枝宜三县打游击，从5条短枪起家，发展到一支拥有百余人枪的游击大队。他足智多谋，曾指挥游击队用伪装、夜袭等战术端掉安福寺、沙道观、街河寺等团防据点，打了许多漂亮仗。

2月23日凌晨，游击大队由松滋秘密进至洋溪后乡炉子岩村。孟队长和副队长龙平、中共松枝县委委员胡伯温听取了中共洋(溪)明(月寺)区委关于洋溪敌情的介绍。据地方党组织侦察的情况得知，敌团防分队有30余人枪，驻在洋溪上街头的王爷庙，与洋溪正街隔着一条小溪，两地之间只有一座石桥相通。敌人在驻地周围修筑了工事，并强迫壮丁在交通要口守哨。另外，在距洋溪7公里的枝江县城驻有敌川军一个连和县团防中队，如战斗打响，敌军至迟在一个半小时内即可赶来增援。看来，要在白天打掉洋溪团防分队是十分困难的。

“还是用老办法，夜袭，打他个措手不及！”孟队长听完敌情介绍，果断地说。

“队长，端团防老窝的任务我包了，你和老胡在后面指挥！”年轻气盛的龙副队长急忙站起来自告奋勇。

“石桥要派人卡住，防备敌人向镇里逃跑。”熟悉洋溪地形的老胡补了一句。

“好，就这样办！”经过一番讨论，孟队长最后敲定了战斗方案。

2月24日凌晨4时，游击队如离弦之箭向洋溪疾进，5时左右到达洋溪外围，在驱散流水桥的编练队后，兵分两路：孟队长和老胡提着短枪直插石桥断敌退路，龙平则率大队奔袭王爷庙。

远远望去，王爷庙前亮着一盏灯，摸近一看，两个哨兵打着哈欠，



洋溪石桥：红军鄂西游击第二大队夜袭洋溪战斗遗址

懒洋洋地守在庙前。4个扮成香客的游击队员手提香烛火纸，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

“什么人？”伴随团丁惊慌地喝问，夜色中射来一束手电筒的灯光。

“到庙里上香的！”“香客”边走边答。

“把老子吓了一跳！”团丁似乎松了一口气。

“香客”走至近前，突然甩下香烛火纸，一拥而上，两个团丁还来不及喊叫，就被游击队员用汗巾捂住嘴巴，束手就擒。跟在后面的龙平副队长率队飞步冲进庙堂，趁庙里敌人睡得正死，迅速摘下挂在墙上的枪支。突然，一个团丁惊醒了，乱嚷起来。“砰”的一声，龙平朝天开了一枪，厉声喝道：“别动，谁动打死谁！”顿时，屋里敌人乱成一团：有的赤条条地跪在床上磕头求饶；有的光着屁股往神像后面钻；有的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不一会，团丁大部就擒，只有分队长张学立带着



几个团丁从庙后翻过围墙向洋溪街上逃跑了。

战斗打响时,孟队长和老胡正警觉地守在石桥旁。不一会,西边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敌人窜来了。”孟队长低声提醒了一句。待黑影窜至距石桥30余米远时,孟队长和老胡的枪响了。一阵射击后,团防分队长捂着胳膊“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孟队长趁势喊道:“缴枪不杀!”这时,龙副队长也带队从后面追来。团防分队长见走投无路,连忙哭丧似地颤声嚷叫:“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不到半个小时,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胜利结束。游击队全歼敌团防分队,缴枪30余支,自己无一伤亡,随即迅速撤离洋溪。天亮后,当敌川军一个连和枝江县中队气急败坏地赶来“追剿”时,只悻悻地捡到了游击队丢弃在冬水田的几支破鸟枪。

(钟剑鸣)

杨献玖与“飞虎队”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空军,它就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后来我们民间习惯地称为“飞虎队”。“飞虎队”是如何诞生,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战机和飞行员在作战中损失较大,加上采购飞机、运送、组装、试飞、换装需要不少时间,导致战争初期中国空军被迫使用许多更加老旧的战机升空作战,在残酷的消耗战中,中国空军本来就不多的战机和飞行员几乎损失殆尽。1941年8月1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中国政府高价采购美国战机、高薪聘请美国飞行员,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陈纳德立即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并根据战时需要,将大队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前陆军驾驶员组成,队长是罗伯特·桑德尔,即“亚当和夏娃队”;第二中队外号“熊猫队”,杰克·纽柯克指挥。第三中队由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驾驶员组成,命名为“地狱里的天使”,由阿维特·奥尔森担任中队指挥官。

1941年12月20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当天,入侵日机10架,被击落3架(一说6架),重伤4架(一说3架),而志愿队无损失。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



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后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司令。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后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损失26名飞行员、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地面敌机的战绩。

美国航空志愿队为什么被称为“飞虎队”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一个人。

杨献玖,湖北枝江江口镇人。生于1920年3月24日(农历),2019年10月2日去世。曾在枝江读过3年私塾,3年新学堂。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打响,战火很快波及浙江,国民政府指示浙江大学西迁。1937年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往内地西迁,先后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行程近2600多公里,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并在那里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史称“浙大西迁”。1938年,杨献玖进入浙江大学学习,他随着浙江大学的辗转西迁而颠沛流离。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其英语成绩好,于1941年8月被选拔进军委会昆明译员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

青年时期的杨献玖

1941年12月20日,日军机入侵云南,昆明机场美国航空志愿队所有飞机升空迎敌,并首战告捷,这是昆明人第一次在敌机空袭警报后

没有被轰炸。当时老百姓敲锣打鼓到机场庆贺,他们看到飞机上画的鲨鱼头很惊奇,地处内陆的昆明人几乎没有人见过鲨鱼,于是就说飞机是“飞老虎”。第二天,昆明一家报纸上便使用“空中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杨献玖当时正在昆明接受英语培训,目睹了当时的场面,就将志愿队翻译成英文“Flying Tiger”,意思是会飞的老虎,一同受训的学员们觉得很好,美国航空志愿队的人员听到这个名字后也非常喜欢,觉得既独特又有中国风味,便传达给上层并获得了认可,最终获得许可后成为媒体宣传上的正式名称。后来好莱坞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华特·迪士尼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亲自动手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这就是日后扬名海外的飞虎队名称之由来。

美国航空志愿队在对日军作战中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呢?这与精准的情报关系很大。浙江大学毕业、参加了译员训练班学习的杨献玖,就是一名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情报员”。

2018年7月,湖南卫视都市台以“投笔从戎猛虎飞天,翻译官为飞虎队正名”为题对杨献玖进行了采访,并制作了专题片。电视片画面上,杨献玖讲,他当时在浙江大学学的是农艺,主要研究方向是稻麦,经常看见日本飞机在祖国领空肆虐,非常气愤,早有投笔从戎的志向,后因英语成绩突出,被选拔参加军委会昆明译员训练班学习,走上抗日救国的战场。1941年12月20日昆明空战后,将志愿队飞机翻译成了“Flying Tiger”,并把这个名字告诉给了陈纳德,从此航空志愿队命名为“飞虎队”,陈纳德也被称为飞虎将军。

2019年4月24日,百岁老人杨献玖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曾讲,当时



国民党军委会昆明译员训练班学员不足四十人,有中国人,也有欧美人,没有老师,学员们集中在一起相互学习,主要的学具是收音机,中国人用收音机学习英语,一同参训的欧美人也通过收音机学习华文,重点是提高口译能力。学员们都很努力,结业时经过了严格考试。政府及军方对于学业优异的结业学员,给予奖励,杨献玖与贵州大学历史系学生肖醒球(广东人)、一个中学生毕仁荣等受到奖励,奖金数额较大,但都没有全额发到得奖者手中,而是被国防部官员贪污了。昆明译员训练班结业的学员,后大都成为各飞行情报机构的主要业务骨干。

据档案记载,杨献玖后来由军委会分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后改为第十航空队飞行情报组,负责飞行情报工作。24小时全天候工作,每天和广西白色防空指挥部防空情报所及美国的防空情报所交流所获得的航空线上飞过的飞机种类、飞机国籍、飞行方向、飞机架次等情报,供航空队参考。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献玖于当年10月复员回湖北枝江江口镇老家,当时所授军衔为上校。

回到枝江后不久,江口三立中学(私立)成立,杨献玖被委任为江口三立中学校长。当时枝江仅有两所中学,分别位于长江南北,一所是位于枝城(江南)的枝江中学,一所即江口(江北)的三立中学。江口三立中学办学时间不长,但教学质量高,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如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向光忠(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毕业)、历史学家高明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等都曾毕业于三立中学。三立中学的教师中,不少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学生中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神枪惊破美军胆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军史》记录了枝江籍志愿军战士曹光胜的惊人战绩：在1951年10月朝鲜战场金城以南阻击战中，他冒着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在6个小时的战斗中，击退美军8次进攻，毙伤美军117名，荣立一等功。这名普通士兵是怎样创下这一歼敌奇迹的呢？



一挺机枪击退美军三次进攻

1920年12月1日，曹光胜生于枝城梁家畈村，19岁被抓进国民党军队当兵，1949年3月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成为解放军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六团一营三连

战士，1951年6月随军抗美援朝。9月，六十七军刚刚接下金城以南防线，就迎来了美军凶猛的秋季攻势。10月14日，曹光胜奉令率机枪组增援二连三排防守的瑞云里东高地82号阵地。但副射手和弹药手却在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线时一死一伤。曹光胜成为阵地上10余名官兵中唯一的机枪手。

1962年2月6日，曹光胜在宜都县烈军属和残疾复员退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大会上留影



15日上午11时,一阵炮火急袭后,美军第二十四师一个连从正面向高地发起进攻,端着卡宾枪,呈散兵线向山上爬来。曹光胜稳稳地托住机枪,凝神瞄准敌人,等待最佳的开火时机。当美兵摇晃着高大笨拙的身躯,冲到距阵地约100米的一道狭窄山梁时,最前面的十几名美兵几乎走成了一条直线。曹光胜立即轻扣扳机,打了一个3发点射,像穿糖葫芦一样,一下子击倒7名美兵。紧接着又打了一个5发点射,5名美兵又魂归西天。后面的美军吓得哇哇乱叫,调头就跑。但洋鬼子的脖子再长也跑不过机枪子弹,又有13名美兵接二连三地中弹倒地。曹光胜用机枪子弹一直把惊逃狂奔的美军“送”到山下,根本轮不上其他战士开火。看到25名美兵像绊索的醉汉,横七竖八地栽倒在曹光胜的枪下,战友们高兴地拍手叫好:“打得好!打得好!”

吃了大亏的美军第二次进攻时学了一回乖,不再沿山梁攻击,而是从西侧山坡横插着冲上来。这次曹光胜决定让敌人靠近了再打。他不动声色,任凭敌人胡乱放枪,长驱直入。当美军弓腰驼背地爬到距阵地只有50多米远时,他兴奋地喊道:“这下好打了!”攥紧机枪一阵点射,放倒了5名美兵。后面的美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丢下死伤哀嚎的难兄难弟滚下山去。

美军两次进攻失败后,又变换了花招:一不打炮,二不开枪,借着松林的遮掩,偷偷从阵地右后方摸上来。走在前面的4名美兵刚钻出半山腰的松林,就被监视敌情的战士耿尚志发现了。他连声疾呼:“曹光胜,快来打呀,敌人从这边上来了!”曹光胜疾步跑到右侧阵地,刚刚架起机枪,敌人已窜到距阵地50多米远的地方。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牛高马大的美兵正喘着粗气,掏出毛巾擦汗,连脸上黑森森的络腮胡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一瞬间,美兵也看到了正对着他的枪口,幽



蓝的眼睛露出惊恐的目光。说时迟,那时快,曹光胜立即瞄准打了一发点射。“唉哟”一声,美兵像块门板轰然倒地。后面的美兵不等曹光胜调转枪口,已像受惊的兔子调头窜进了松林。

曹光胜凭着一挺轻机枪,连续打退美军三次进攻。

擒贼先擒王

美军三次进攻失利后,暂时停止了攻击。曹光胜趁机一面整修工事,一面观察敌情。在对面81号高地上,美军仗着拥有制空权和炮火优势,毫无顾忌地在山头上窜来窜去。杀敌心切的曹光胜心里痒痒的,托起机枪瞄向了对面山头的活靶。一会儿,3名肩挎卡宾枪的美兵从山后钻出来,跳进一条战壕向北走来,只露出深绿色的钢盔在外面晃动。曹光胜立刻盯上了这组猎物,当3名美兵刚刚跳出战壕时,立刻扣动扳机。随着“叭,叭,叭,”一串清脆的枪声,3名美兵被打了个“狗吃屎”。其他抛头露面的美兵都吓得滚进工事,再也不敢招摇过市了。

过了一会儿,山脚下200多米远的地方又聚集了30多名敌人,挥动铁锹、十字镐,在进攻出发地挖修工事。曹光胜心想:机会又来了。他屏息静气,瞄准敌人一阵点射,打倒了几名美兵。剩下的美军吓得左窜右跳,四散逃去。

10余分钟后,曹光胜发现阵地右侧山脚一棵大树的绿荫下,坐着一群美军,一名腰挎小手枪的指挥官站在队伍前面,不时侧转身子,对着志愿军阵地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好像在部署进攻的路线。曹光胜心中暗喜:又是绝好的猎物。这位在战前军训中两次荣获“甲等射手”称号的神枪手屏住呼吸,稳稳地瞄准敌指挥官。一声枪响,美军指挥官应声倒地,席地而坐的美军都吓得趴在地上。曹光胜又是一阵点



射,美兵死的死、伤的伤,连滚带爬地四散逃开了。战友们齐声喝彩:“打得好!”

自此,曹光胜的“神枪”成了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从下午1点到3点多钟,急于报复的美军调来4架战斗轰炸机和12辆坦克,掩护成连的步兵向82号高地连续发起5次猛攻,高地防御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

吃血面,喝尿水,勇士五退敌军

下午1点多钟,成群的炸弹、炮弹落在高地上。阵地笼罩在火团和硝烟之中。但20余分钟的轰炸并没有达到美军预期的效果,当美军冲到距志愿军阵地50余米时,山头上又响起了苏式转盘机关枪短促而节奏分明的“咳嗽声”。侥幸没有中弹的美军就像听到死神的足音,立刻丢下死尸、伤员,狼奔豕突地逃下山去。

轰炸进一步升级。第二次进攻时,敌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燃烧弹。山上燃起团团大火,浓烟蔽日。然而,借着火势直扑山头的美军又在机关枪清脆的枪声中败下阵来。

第三次进攻时,美军使出杀手锏:一桶桶装有引爆雷管的汽油桶从天而降,高地笼罩在火海和漫天烟尘中。此时,美军已不相信山头还会有生命存在。但是,当美兵放胆伸直腰杆,冲近余火未烬的山头时,迎接他们的仍是令人胆寒的机枪射击声……

曹光胜何以能劫后余生?

原来,升斗状的机枪工事位于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山尖上,敌人炮弹打低了,落在山前坡下;打高了又飞过山尖。几乎擦着山顶俯冲投弹的敌机,面对这块巴掌大的地盘也失去了准星。不幸的是,他的战友却大部伤亡,盖有5层圆木2米厚土的防空洞被炸塌,工事被炸

垮,碗口粗的松树被烧成一根根乌黑的树桩,阵地成为一片焦土。

为了躲避飞溅的油火和横飞的弹片,曹光胜只好把战友的遗体拉来盖在自己身上,嘴里轻声祷告:“烈士啊!你们保佑我,我为你们报仇!”身上的炒面早已吃光,肚子饿急了,他就从烈士身上找来带血的炒面充饥。山上没有水,口渴极了,他就用美军的钢盔接自己的尿喝。当敌军炮火向后延伸,步兵开始冲锋时,他又从烈士遗体下钻出来,不时变换射击阵地,将一串串复仇的子弹又准又狠地射向敌人。就这样,曹光胜在后方炮火的支援下,下午连续击退美军5次进攻,又有几十名美军倒在他的枪口下。



下午4点钟,屡攻屡败的美军在81号高地架起一挺轻机枪,专门封杀曹光胜的机枪。子弹雨点般地飞来,打得曹光胜无法抬头。他悄悄向右转移了阵地,只回敬了几发子弹,敌人的机枪就成了“哑巴”。敌人又在山脚下架起一挺重机枪,密集的弹雨狂风般地扑来。曹光胜避开敌军火力,几发点射,又取消了重机枪的“发言权”。

十余年后,乡邻问他:“你当时怕不怕?”曹光胜豪壮地回答:“不怕,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上了阵地就没想活着回来!我给自己留了一颗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下午4点半钟,黔驴技穷的美军终于停止了攻击。平时5点多钟准时“收工”的美军破例提前“下班”。至此,在15日6个小时的战斗中,曹光胜共击退美军8次进攻,毙伤美军117名。

英雄的事迹随之在全军传扬。六十七军党委授予他“一等功臣”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

士荣誉勋章”；他受到金日成首相的亲切接见，一名朝鲜小姑娘按照朝鲜人民对英雄的最高礼仪，向他敬献了一双银筷；在鲜花、掌声、欢呼声的簇拥下，他被朝鲜人民抛向了天空……

（明建中）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1940年,枝江江北地区沦陷,我举家移到长江南岸。父亲要维持全家生计,利用旧有关系在枝江县政府教育科当了科员。国民党枝江县党部书记王南屏是父亲旧识,见我没有职业,执意要我到县党部当干事(这是书记长之下的主要职务)。我感到有些犹豫,经请示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蔡述彬同志批准,前去任职,并加入国民党。当时县党政机关为避免敌机炮轰,已迁移到后乡石门坎,后来又转到黎家坪。

我到枝江县党部之初,和王南屏同寝。他问:“人家都说你是共产党员,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喜欢看点这方面的书籍,特别是看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确实鼓舞人心,大大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我哪里够得上当共产党员呢!”他听了也没往下问,显然各自心里明白。我认为他是看我年轻肯干,有一定的文化,用了我,可以为他处理公文装饰门面,他也能轻松一些,当个清闲官。当时的县府办事处主任、三青团干事长谢东藩曾提醒王南屏:“王素是共产党员,你用他?”王说:“他就是共产党员,在我这儿他能怎么样?”

我在王南屏面前虽是晚辈,但他对我从不轻慢,秘密文件也好像并不瞒我,可有一次我在收发簿上看到有《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的绝密文件的登记,却不见其文,我断定藏在他的小皮箱内。一天夜晚,等他打牌去了,而且习惯上总是通宵不归的,我趁机将小皮箱撬开,连夜抄毕



藏好,后寻找机会送给了党组织。

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虽谈不上有多大实权,但它是晋升的阶梯,王南屏的后台是省党部的专员黄宝实,此人系中统干将。

当年的国民党枝江县组织的情况是:三个行政区各是一个区党部,县直机关属第一区党部,一区区长孟星南兼任该区党部书记;二区(百里洲)区党部书记是常广宣;三区(江北沦陷区)区党部书记是朱秋云。我在那里的一段时间,也奉令发展过一次该党组织,实际是闭门造车,即按行政区划抄一份名册报上去,原有的负责人(即区党部书记、区分部书记)一般不变,缺少了就以区长为区党书记,乡长、中心学校校长、保长作区分部书记报上去交差。发展新党员有的也是先报上名册,再办入党手续,我就是先当干事后入党的。这样,有些党员和书记的名字报上去了,自己还不知道。

枝江县党部当年由我创办过一个《枝江三日刊》(油印报),一般是转发中央社的新闻、摘录报纸上的有关抗日文章和本刊评论之类,虽然它是国民党县党部办的刊物,但我却选用了大量的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材料,以期无可自责。此刊办了好几个月,开始是我一个人编写刻印,后来来了个郭叔云(宗英),我在宜昌曾和他一起过了一次地下党组织生活,但他后来与党组织失去了关系,他到枝江县党部是通过他岳丈介绍的(他爱人胡叔善是我小学同学,枝江县城人)。此时《枝江三日刊》发行销售量增大,正需要增添人手,王南屏便接受他来和我共同办刊,我俩配合自然十分默契。王南屏和县里一般人对此刊从不挑剔,都感到非常满意。

1941年7月,当此刊办得正旺的时候,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我撤出隐蔽,因为我从枝江县党部发了不少空白证明,有个叫周用怀的地

下党员出了问题,而他正好持有这种通行证,地下党组织怕牵连到我,便通知我不动声色地离开县党部。

我这一去,王南屏自然不好交待。郭叔云本来与我无关,但王见我 与郭是那样合得来,难免不怀疑。此时便在郭身上做文章(具体过程我说不清)。郭叔云是秭归人,当时曾向我打听过组织关系,我说我因沦陷也失掉了联系,表示愿意共同寻找,郭最终被迫自首变节了。王南屏也就此以功抵过而了结。

我在枝江县党部呆了十一个月,经历了三个县长。我开始去时县长是吴尽心,不久换赵璧,也只顾赌博抹牌,后来又换成刘德基。他们干的都是要粮、要款,要人,应付军差。全县按江南、百里洲、江北分为一、二、三区,一区区长是孟星南,二区是常广宣,三区是严西陵,三区已全部沦陷,有名无实。县级首要人物除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外,还有三青团干事长谢东藩,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贺孚丞,参事陈楚珍。那时江北沦陷,不用说,人民受到日寇、汉奸、土匪的奸掳烧杀,百般蹂躏,江南的统治者也是征敛不已,民无宁日。日寇更时时觊觎江南,形势岌岌可危,但那些国民党党政官员唯知吃喝嫖赌,麻木不仁,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市教育局离休干部 王 素)



在国民党监狱的日子

解放前夕的宜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自知气数已尽,因此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更加疯狂,我就是在那样乌云弥漫的政治环境中被捕的。

当时我在宜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虽然只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开展活动,但还是遭到特务的围攻追捕,于1948年5月5日在中山路一书店中被捕入狱。被敌人关进牢房之后,我内心并没有惶恐不安之感,相反的是头几天里我睡得很香,因为不必再担心被特务盯梢、随时被捕了,但不能不思考的是将怎样应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我在宜昌被秘密关押了三个月,三个月中,被审讯了多次,还被拖出去“假”枪毙过(就是被拖到墓地后吓唬一下又拖回来),甚至还找来内奸作人证,提供我在宜昌秘密活动的证词,总之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我始终没有屈服。三个月后,我被押解到武汉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关在特种牢房,所谓“特种牢房”,就是在一个牢房内另设置的一个木笼,人在笼内只能坐着不能活动,连伸腿都困难,因为在这大约一个多立方米活动范围的木笼里,同时关着五个人,还有一只供大小便的粪桶。这就是敌人对待政治犯的“人道主义”待遇了。在这里一年四季,每天只供应两次食物,每次都是一碗掺碴、半稀不干的霉米饭。一年到头不管天气多么炎热都得不到一滴水喝,更甭想用水来洗脸擦身了。无论春

夏秋冬,我们穿的都是进牢时自带的随身衣服,全身虱子成堆。腿子生疮后,只能任其流血流脓、发臭腐烂,自己拆撕破棉衣内的棉絮揩沾血和脓。生了病更莫想得到一粒药治疗,和我一样的政治犯,有的就病死在条件恶劣的监狱里。直到武汉解放以后,我才结束这段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

在国民党监狱的那段日子,我想得最多的不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如何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意志斗争。夏明翰的那首诗可以形象地描述我当时的心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汪 洋)



徐国炎妙计运枪支

1932年6月,中共鄂西特委要求中共枝松宜中心县委派人到长阳、恩施一带购买一批枪支,支援洪湖苏区的武装斗争。当时,獠亭古老背渡口是到长阳、恩施唯一的长江渡口,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过江检查十分严格。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中共枝松宜中心县委想出了一个“死人过关”的妙计。请木匠做了一口特殊的棺材,又在附近村里找了一班吹打乐队,挑选出身上暗藏武器、披麻戴孝的20名精干游击队员护送棺材。枝松宜中心县委书记徐国炎身穿青布长衫,躺在棺材里,口袋里装着几副臭猪肠子,脸上用黄表纸盖上装死人。这一行人披麻戴孝、吹吹打打、哭哭啼啼,边走边放鞭边丢买路钱地来到渡口,哨兵喝令开棺检查,只见棺材盖上绿蚊成群,臭气熏天,他忙捂着鼻子骂道:“他妈的,人都烂成这样了,还不赶快抬去埋!”就这样,游击队员们在县委书记徐国炎的带领下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有力支援了洪湖苏区的武装斗争。

我的父亲邹文春

邹文春,生于1919年,中共党员,七星台大埠街村人。1939年3月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地下党组织江口支部书记。1942年12月为充实部队,被调到新四军五师,先任师文工团事务长,后任师总务股长,1946年7月与国军作战,在河南伏牛山战役中牺牲。

(一)

我的父亲邹文春于1919年冬月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他是家中独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后,爷爷便把他送到汉口读高中。1938年4月,日军空袭武汉,学校被迫停课,父亲回到家乡组建地下党组织。

在村子里,他首先召集几个年轻人给他们讲武汉的局势,讲战争的惨烈和日本人的残暴。“不少伤兵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前线退到武汉,我也随学校慰问队去看望。我们给他们送水、送吃的,好多人伤势严重,有的身上还有弹片。由于伤兵太多,医院收不下,不少人只能睡在马路边……我们不能眼睁睁看到国破家亡,我们不能做亡国奴。”

地下党组织以杨林湖为秘密联络点。那时,杨林湖是一片沼泽地,杂草丛生,岸边有茂密的树林,住户稀疏,相对比较隐蔽。父亲就在湖中搭建了一个草棚,找来一块石碑,每发展一名党员,新党员就在



石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并咬破食指用鲜血涂成红色,然后面对石碑宣誓。从1939年3月到1941年底,共发展党员200余名,父亲担任新场区党支部书记。

为不断壮大革命队伍,父亲又带领精兵强将秘密行动,去黄陂、孝感、来凤等地发展地下党员。一次,在来凤县的一个秘密据点,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反抗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剥削压迫,怎么对付土豪劣绅,不幸被叛徒出卖,父亲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敌人对父亲进行严刑拷打,用烧红的铁铲烫,用辣椒水往他鼻子里灌,使用“坐飞机”、上“老虎凳”等酷刑,迫其交出中共地下党员名单。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哪怕全身伤痕累累,父亲一口咬定“只有我一个人”。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企图用各种利益诱惑。从被抓捕的那一刻起,父亲就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心理准备,又怎会屈服呢!无论敌人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他始终面不改色,不为所动。敌人看从他嘴巴里撬不出半点有用的信息,就用绳子把他的手脚捆住,丢进了佛潭河里。在他奄奄一息时,被好心的打鱼人救上了岸。打鱼人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让给父亲躺着,为他疗伤,熬鱼汤他喝。父亲身体恢复得很快。

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父亲没敢暴露真实身份,化名邹华清,一边跟着打鱼人在河边打鱼,一边沿着河边继续寻找革命队伍。

后来,父亲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万竹卿和曾昭荣,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革命的目标,要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奋斗。他们中指滴血、痛饮血酒,结拜为三兄弟,并发誓:非亲骨肉,比骨肉亲;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有一个人活着,将承担三家责任,为父母养老送终,把子女抚养成人。可后来三兄弟都死了,而且死得很惨。万竹卿和曾昭荣没



有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而是被当地的土匪头子郑家良、赵益之杀害了。

(二)

1942年冬月,我刚出生22天,父亲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带着部分地下党员充实部队。父亲半夜三更偷偷回家给母亲做工作,母亲不同意:“要去我们仨一起去,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父亲抱着我跪在踏板上对母亲说:“我们革命者没有家,你们跟着我怎么办呀?现在天寒地冻的,我们的孩子还这么小,会把她冻坏的。你在家等我,明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有时间我来接你们,我没有时间就要我的警卫员来,好不好?”母亲泪流满面、将信将疑地点点头。

那一夜,父亲和母亲把他们一生的话都讲完了。父亲拉着母亲的手,心里五味杂陈,他深知革命的艰辛与斗争的残酷,说不定就有去无回了。但他不想让母亲太难过,就满怀信心地说:“我出门闹革命、打敌人,是为了我们明天生活更美好。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生活,我们的女儿要像男孩子一样受教育,你要克服困难把她送进学堂,等她长大了,要当一个新青年,生活简朴不奢侈,不戴金银首饰……”母亲说:“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我就是砸锅卖铁,讨米要饭也要让她上学读书,不能像我一样,大字不识一个。”“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父亲一边说一边收拾简单的行李,天不亮就直奔杨林湖,和警卫员张国良、地下党员邹开锋、邹开凡等一起出发了。

父亲走后,母亲日盼夜想,想一家人团聚;一年又一年的春暖花开,父亲并没有回来,只是收到了一封信。爷爷和母亲都不识字,不知



道信的内容,又不敢给别人看,爷爷收藏起来了,爷爷猜测:有可能是父亲给家里写的信,也可能是部队寄来的阵亡通知书……爷爷去世后,那封信也遗失了,至今是个谜。

父亲一直音讯不通,母亲带着我在家种田,没有一个男人,实在太难太难了,没办法,就改嫁了。但我并没有随母亲去。其间,母亲想过要把我接到她的婆家去,她的婆婆说:“你的女儿来我们家就要改姓。”母亲不同意,她说:“那不行,我的女儿永远姓邹,她是邹文春留下的根,是邹家唯一的希望……”就这样,我一直住在母亲的娘家,跟舅舅一起生活,直至长大成人出嫁。

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她和舅舅一起想办法筹钱,让我读书,我在孙家港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那个年代,女孩子读书的并不多,我们那个青春大队只有我一个女生上学。我很珍惜在校读书的时光,学习也很认真,我在班上担任过学习委员、文艺委员,每年都是“三好学生”,还常常得奖学金。眼看要考高中了,母亲对我说:“秀啊!你在家的附近读书我还勉强能负担,如果你读高中,就要去外地,要出住宿费、学杂费、生活费,我实在无能为力了。”为这件事我一个人反反复复想了半个月,最终决定在考试时交白卷。别人都说:“你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没有考取呢?”我说:“我考不取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不去考试,母亲要责怪我,我就是考上了,还是不能读,我也许会跳河。所以干脆交白卷,留下一条命,为我的父亲活着。

(三)

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堂屋里看电视,被一部战争题材的



电视剧《中原突围》深深吸引着。这部电视剧讲的正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的部队在河南打仗。看见我们的人一排排倒下,我就嚎啕大哭:“天呐!我的父亲就是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

1946年6月26日,中原部队5万人,被国民党反动派30万大军重重包围,为了保证中央主力军北上,李先念带领“大部队”打外围,而父亲他们3000多人负责打内围、断后。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大部队”成功突围,实行大转移,父亲他们这支人马全部牺牲。

父亲牺牲后,上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英雄后人的生活状况,也对父亲身份的确定做过多次调查。

1968年,工作组的同志又来调查。“听说在杨林湖有一个地下党组织,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地下党员的名字?”他们问我表哥。表哥在仓库当保管员,他说:“有这回事。杨林湖中确实有一个地下党组织把名单刻在一块石碑上,怕别人看见,就把这块刻有地下党员名单的石碑沉在湖底了。邹文春是我的表姑爹,他是支部书记。后来开垦1000多亩的杨林湖时,拖拉机把那个石碑挖掘出来了,做了桥面,但那个石碑座子上还能看清邹文春的名字。”正说着,工作组的同志看见一个在湖边清洗衣服的妇女,就问:“那块刻有地下党员名字的石碑在哪里?”妇女回答:“那个桥倒塌后,石碑也掉进了水里,还有一块座子,我们捡来搭步头,清衣服、洗菜用。”工作组的同志看到了那个碑座子,上面确实刻有“党支部书记邹文春”字样。

时隔多年,我父亲的战友朱玉衡、张国军、徐天德、赵必阳、张国良(父亲当年的警卫员)等10几个人开着吉普车来家中看我,他们见到我就抱着我痛哭流涕。那个时候,我们全家才真正知道父亲牺牲了。他们说:“这么多年了,你在农村受苦了,没有给你安排更好的工作,我



们很内疚。”我说,那些年国家也很困难呀,我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其实组织也曾安排我去县城教书,我当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上面还有生病的老人,觉得留在农村比较方便照顾老的小的,就没有去。

现在,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告诉他们,我的三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我取的。大儿子王继红,意在继承革命传统,当好红色接班人;二儿子王建华,就是要好好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儿子王卫华,意在把国家建设好了,还要好好保家卫国,不能让敌人再来打我们。我的子女没有当官发财,但他们都和我的父亲一样重视教育,两个孙子都受了高等教育,在城里工作。最小的孙子王雄风,秉承太爷爷的革命精神,2013年9月应征入伍,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服役5年,退役后,在宜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在部队期间,曾获得总队嘉奖,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等。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常常听奶奶讲述红色故事,了解了太爷爷短暂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人,一定要继承光荣传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一直相信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逢年过节,我都会朝着中原方向给父亲烧纸、上香,盼望他不要再漂泊,在万家灯火中循着家人的悼念魂归故里。

(邹秀运讲述,张贵勤整理)

怀念二爹詹家胜

我家里有两个证,那是被岁月熏得发黄褪色的证,那是被父亲经常握在手里翻阅起了毛边的证,那是让父亲如见其人、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的证,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烈属优待证》。

历经一个古稀之年,依然可见分别印刻有陈毅、李先念等重要领导人名字的证上端庄、清晰的深蓝色字迹,依然可见一笔不苟书写的我的二爹参军、牺牲时间及家乡住址,尤其是那红色镂空的布满全证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令人看了后热血沸腾。

我的二爹詹家胜在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四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二营五连战士。二爹所在的三野官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二爹遭受飞机轰炸光荣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我的二爹詹家胜,原名梁金胜,因入赘到邻村曹家河村詹家后改姓改名,婚后不久即参军,无子女,牺牲后其妻便改嫁了。我的父亲是二爹唯一的亲人,地方武装部便将以上两证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每当拿着这两个发黄褪色的证件时,就像触摸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弟弟的身体一样……

我至今尚能记得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每到年底,就会随着母亲到



公社去参加军烈属会议。印象中,每到了那一天,我就和母亲早早地起床,匆匆地吃过早饭,便一路顶着凛冽刺骨的北风,径直奔向公社礼堂。待一路竞走赶到礼堂时,已是座无虚席,到场的人都默不作声。原来啊,所有参会人员都跟我们一样,生怕误了这具有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的时刻,都是提前到达。

礼堂主席台正中的石灰墙上,张贴着红底黑字的标语:“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致敬!”那庄严肃穆的礼堂里,会议主持人首先宣布向烈士默哀3分钟,紧接着宣读有关文件,再就是几位领导轮流上台讲话,有对英烈的敬仰,有对烈士家属的慰问,有对现场人员新年的问候和祝福,有对年度经济工作的汇报和新的一年的展望等等。待会议结束,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又冷又饿的我拿着会上发的《致烈士家属的一封慰问信》和大红对联,急急忙忙地返回家中。到了腊月三十上午,这《慰问信》便张贴在大门上,这大红对联必定会妥妥地贴在大门框上,一起为家里的门脸儿增辉、增色。它们一年四季都在门脸儿框边上守候着,直到下一个新年的到来……

在二爹光荣牺牲后13年出生的我,虽然未曾与二爹谋面,但我时常在脑海里勾画着一个肉搏骨并、肝髓流野的激烈战斗场景。那就是:跟我父亲一样有着高大威武身材的二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美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面有机枪重炮袭击,而我的二爹同所有勇猛刚强的志愿官兵一样,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我仿佛听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呐喊声在朝鲜战场上此起彼伏;我仿佛看到了二爹在硝烟弹雨中冲锋陷阵,愈战愈勇,在烽火连天中英勇杀敌,宁死不屈……

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役中以弱



胜强,可谓是扬我国威军威,鼓舞了国民士气。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为提高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为中国从东方崛起,为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有了像我二爹一样的无数英烈和革命先驱,敢于付出鲜血和生命,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安逸的生活。为此,我们要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梁春云)



追忆功臣侯子良

因患阿尔茨海默症,他晚年记不清自己的亲人。但是,他记得住每个月必须向党组织缴纳党费。2020年2月前,一位耄耋老人每月都会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来到枝江市马家店街办熊家窑社区,向社区党组织缴纳当月党费。

社区工作人员说,这位认知能力极差的老人,生前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按时缴纳党费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每次党费必须缴足两百元后才会满意回家,他的事迹的确值得追忆。

被自己隐匿的战斗功臣

这位生前失忆而不忘按时缴纳党费的老人,名叫侯子良,1933年出生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自治县池水坝村黑虎寨。他3岁丧母,9岁丧父,不知道自己生日的他,因无依无靠只能跟着叔父一起度日。1948年底,侯子良因故流浪到贵州,15岁的他被保安团抓去当了壮丁,饱受屈辱的他几次逃跑未成。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侯子良有幸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1950年,侯子良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侯子良健在时,谁也不知道他是共和国的功臣。他持有的集体一等功荣誉证书和个人二等功奖章,是他逝世后孩子们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的。消息传开,很多人都惊讶不已。但枝江市人武部和枝江市



党史办、退役军人事务局证实了这一事实。

1951年，侯子良随15军45师135团1营1连参加抗美援朝，与英雄黄继光同在一个团。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侯子良和战友们英勇杀敌，顽强坚守阵地。在一次战斗冲锋时，侯子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腿部。尽管鲜血直流，但经过简单包扎后，他随即请求继续参加战斗。后来一次冲锋时，因遭遇敌军重炮轰炸，侯子良的左耳被剧烈的爆炸声震聋。此后，当炮弹在附近爆炸时，他则没有了明显感觉。

当他看到那么多战友倒在血泊中，悲愤不已。为了和平，也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报仇，侯子良不顾伤痛、不畏生死浴血奋战。持续鏖战43天的上甘岭战役，侯子良和战友们在那异常艰苦的战场上，靠着抹一把炒面吃一把雪的能量补充，用落后于敌人的武器装备，最终赢得了胜利。志愿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和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这场残酷的战役中，侯子良所在的连队最后仅有几个人幸存，他是其中之一。虽然活下来了，但左耳却留下了听力损伤的终身残疾，罪恶的弹片也一直残留在腿上未取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侯子良荣获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亲笔签发的集体一等功荣誉证书，并获个人二等功奖章。

勤廉为公的原则人

抗美援朝凯旋后，部队领导考虑侯子良是无家可归的人，便安排他去河南读军校。经过战与火的考验、灵与魂的洗涤，侯子良终于在1955年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手宣誓，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宣誓这一天,这位经历枪林弹雨磨砺的钢铁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对组织说,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党安排,决不讲任何条件。

军校毕业后,侯子良被分配到宜昌军分区工作。对党忠心耿耿的他面对频繁的调动,从无怨言。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辗转在宜昌、宜都、枝江人武部,1969年又以军代表的身份,进驻宜昌长航船厂工作5年。1974年,他被调到四川省酉阳县黑水区任副区长。4年后,侯子良又被调回原宜昌地区棉纺厂做筹建工作。

无论在军队建制上,还是转业后在行政机关和企业,侯子良始终践行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从来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他认为自己能活下来为党、为人民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能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做点事,就是最高的奖赏。

从枝江县(市)人武部退伍后,侯子良首站是调回四川省酉阳县黑水区当副区长,他两年的工资没有一分钱寄回家,几乎全部捐给当地用于公益建设,一件件好事实事都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老乡们都把他比作上了教科书的英雄“华子良”。

因为左耳伤残,侯子良为克服语音传导的障碍,在与人交流时,尽量坐在别人的左边,集中精力用右耳去倾听对方的讲话,直到后来安装了助听器,才给他的交流带来了方便。

侯子良一生中,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他从四川调回枝江后,从原宜昌地区棉纺厂筹建,一直工作到退休。在企业担任行管科科长期间,不管是分房子,还是加工资,都是先人后己,不搞丝毫特殊化。为了让工人们安心上班,他每周都要去厂幼儿园检查小朋友们的学习生活。他给幼儿园的老师们说:“一定要把工友们的孩子照顾好,不让他们担心分心!”

然而,对自己的孩子,他却从不关照。三女儿18岁时,想子承父业去当兵。当时,由于女兵指标少,女儿希望侯子良到宜昌军分区找熟识的政委帮忙。侯子良闻听,耐心地劝告女儿:“不管在哪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你就安心在棉纺厂上班吧,我相信你不会为当兵要爸爸去走后门!”

一个合理的要求都“碰壁”了,侯子良的孩子们从此再也没人向他提出任何合理、不合理的要求了。棉纺厂的老职工都说,侯子良是六亲不认的原则人。

良好的家风,让女儿们传承了侯子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三个女儿在企业下岗后,从未向政府提出过救助申请,她们合伙开了一家“烧鸡公”餐馆维持生计。后来,曾在原棉纺厂幼儿园担任过园长的三女儿,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董市镇创办了一家民营幼儿园。

心中无我忧天下

孩子们知道,父亲生前不愿在公众和家里面公开他的荣誉,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功劳应该属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们。

2004年9月17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汉口龙王庙实现了他魂归长江的遗愿。侯子良专门把这份报纸剪贴到他在上甘岭战役中荣获的集体一等功荣誉证书上,并写下:“我们敬爱的师长魂归长江,收藏记下!”上甘岭战役中干部战士心中无我般的生死之交,一直影响着侯子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偶然机会,侯子良曾遇到了昔日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因儿子病故,把正房让给了儿媳和孙子,自己和老伴住在低矮的偏屋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侯子良立即伸出援助之手,给



战友送去了衣服、日用品,还送去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个年代,黑白电视还是稀罕之物,战友推脱不了,便坚持每晚对乡亲们开放。孩子们说,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对任何一个人做出的关爱和付出,从来不奢求回报,他把能让老百姓高兴、认同的点滴之事,都当成一名共产党员的事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应做的奉献。

1958年,侯子良曾回过一次老家。他的出现,让叔、婶和父老乡亲惊讶不已。以为他早已牺牲的乡亲们奔走相告,全村人像过年一样为他庆祝“新生”。

在异乡工作的侯子良,也时刻牵挂着生养过他的老家黑虎寨。在3年困难时期,他与家人每年都要从牙缝里挤出五百斤粮票和一百元钱,寄回老家帮贫困乡亲们渡过难关。

1993年底,侯子良从宜昌三峡棉纺厂(原宜昌地区棉纺厂)退休。退休后,闲不住的他坚持每天看电视新闻,阅读自费订阅的党报,把关心国家大事当成一种自觉。在他的遗物中,《党章》《毛泽东选集》等都有他精心所作的批注。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75岁的侯子良从电视画面看到灾难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第一时间跑到宜昌三峡棉纺厂厂办为家乡抗震救灾捐款,他的行动也感染了全厂干部职工慷慨捐赠。

因为身体每况愈下,无法对社会再做事情的侯子良,便把坚持每月缴纳党费当成一种对党忠诚的义务,直至生命最后一息。2020年2月16日,87岁的侯子良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们,但他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勤廉正派、无私奉献的品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张家慧)



不忘报国初心 永葆军人本色

我叫胡天沿,是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退休干部,今年90岁了,党龄有67年了,作为老党员,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发言。回想这一辈子,最光荣、最开心、最回味的事就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美援朝战争到改革开放,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直追随党的脚步,见证了祖国的蓬勃发展,每次回想起来,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下我的故事。

穿越生死线,轻伤不下火线。

1951年7月,20岁的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暂三师七团一营通信班当副班长。11月份,我跟随部队从江口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安市(现丹东市),编入志愿军68军203师607团1营3连。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阵地防御阶段,美军为阻断我方对朝鲜战场的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一直对鸭绿江上两座大桥靠朝鲜一端进行密集如雨的狂轰滥炸,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或者跌落鸭绿江“葬身鱼腹”。但我们顾不上这些,想着前线的兄弟姐妹迫切需要我们的支援和给养,就在敌机的照明弹下跑步通过鸭绿江大桥,将生死置之度外。进入朝鲜境内后,新义州也是美军重点轰炸地区,我们只能咬着牙坚持跑,在连续跑了十几里地后才跑出了轰炸区,那时候真的感觉不到累,脚打出血泡也感觉不到疼。穿越这



条轰炸区那是九死一生,很多人都负了伤,但都搀扶着向前走,随时准备为党和祖国牺牲一切。

打出精气神,悲痛化为力量。

入朝后,我们师的防御阵地是朝鲜东线的鱼隐山。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与10余名战友奉命运送炮弹到前线。在炮弹运送过程中,敌人的冷炮突然打来,我们来不及躲避,当场牺牲2人,我也被炸得满身是血,我的头部和手部至今还有细小弹片未取出。1952年2月,参战的环境异常恶劣,当时朝鲜天气异常寒冷,记得有一天晚上下了3公尺厚的雪,在这种环境下仍要挖战壕、打山洞,为了抵抗严寒,我们通过烧炭来取暖,然而在封闭的空间里烧炭也是非常危险的,在我旁边的一个地洞里就有3名同志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昏死过去,我第一时间发现他们的时候,呼吸已经越来越弱了,我奋力疾呼“快救人”,最终经过抢救只救活了一个人。1953年7月,我参加了金城反击战,是抗美援朝最后一次大的战役,志愿军集中四个军将南朝鲜4个师打垮,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当时我跟着营教导员向前冲锋,突然一颗炮弹落到我的后面,我当时被炸晕过去了,醒来后,发现我挂在水壶和弹匣都炸飞了,幸好水壶和弹匣帮我挡住了弹片,从此以后我的腰就经常犯疼。在那次战役中,我们连因表现突出被授予集体二等功。战争是残酷的,看着身边一个个战友相继牺牲,我们非常悲痛,但我们的意志和信念却更加坚定。我们没有考虑个人生死,当时只想着拼尽全力消灭敌人,保家卫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几年,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



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

回乡再出战,带头艰苦奋斗。

1956年8月23日,我响应国家号召复原回乡,9月份参加县农业技术培训班。靠着在部队培育的不怕困难的精神从头学起,12月份被推荐到宜都县农业局工作。1958年9月到华中农学院进修果树专业,进修结束后一直投身于县农业事业,扎根农村一干就是几十年,和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78年在百里洲区凤梁乡驻队期间,因帮助集体增产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91年,我从土地管理局退休后,依然坚持退休不褪志、离岗不离党,坚持不断学习,参加每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经常向身边人讲述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抗美援朝战场志愿军官兵们所展现出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贡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今天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让我想到1954年我佩戴“党徽”的时刻,非常激动、非常自豪,我为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而骄傲。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为枝江高质量发展发挥余热!

(胡天沿在2021年6月29日全市“两先一优”表彰大会上的发言实录)